



港人極需實行真普選選出特首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回顧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決議評析

中國加入全球金融資本遊戲的慘痛代價

菲德爾·卡斯特羅(1926-2016)：歷史翻過一頁

核災難後的福島

反對歐元區的新殖民主義整合

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二)



# 港人極需實行真普選選出特首

振言



新一屆香港特首將在2017年3月初選出，特首選戰已於最近展開，有意參選者各用不同形式表態。首先是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公開提出為參選人；其次為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他提出辭去財政司長職位，以便參選，但多時未獲中央政府批准。

第3位參選者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她公開表示參選，要在8·31基礎上重啟政改，為《基本法》23條立法愈快愈好；這顯示她意圖要討好北京，希望得到祝福。她認為2003年23條未獲通過，是由於自己態度不好。但當時港人非常踴躍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是因為這條立法剝奪了港人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而今天仍顯示她沒有接受失敗的歷史教訓，難怪她在民意調查5位可能參選特首者中都屈居末位，得支持票最少。

另一位可能參選者為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但他至本文撰寫時仍未正式表明參選。

現任特首梁振英則似有自知之明，已公開表示不競逐連任，反映出港人反對他連任的強大壓力。隨後，現任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改變主意，轉而會參選以圖延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出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

「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這比之上屆他提出的3個條件，增加「中央信任」一條條件，顯示中央要嚴格管控香港特首，一國兩制，更收緊「兩制」的寬鬆尺度。新的特首人選，將由中央內定，指示多數選委選出。

至於1200名小圈子選委會的組成方面，建制派和保守派依然共佔了絕大多數，他們將視中央的意見投票。民主派的選委今年在競選中，雖比目標的300名已多得23名，但仍屈居少數，難起重大作用，這再度表明現時的選委會祇是橡皮圖章，僅是替建制派蓋章服務。

因此，從始至今的立法會選舉都毫無民主的成份，必須完全撤掉這項制度，改為全港約300萬合資格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特首！這是港人普遍的願望和幸福所在，必需爭取到的！

22/12/2016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3卷第2/3期（總第241期）

2016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mailto: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 須即實行全民退保，延緩嚴重貧窮問題

## 軍行

根據《文滙報》報道：香港雖為富裕的國際都市，但貧窮問題嚴重，生活極其緊絀的市民多達百萬人。一項分析報告發現，本港去年貧窮家庭數目多達46萬戶，整體貧窮人口突破115萬人，當中逾半為在職貧窮家庭，逾30%為65歲或以上長者，在職貧窮家庭數目過去五年間升幅高達44%。有關機構批評最低工資加幅追不上通脹，預計日後貧窮數字會更「難看」。

樂施會檢視政府統計處在2011年至2015年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數據」，分析本港貧窮情況，並於本月11日發佈《香港貧窮狀況報告（2011-2015年）》。結果發現，去年全港最富裕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是最貧窮住戶的28.6%倍，後者需工作28個月才可得到等同前者一个月的入息。

去年的貧窮家庭數目多達46萬戶，較2011年上升6%，其中一人及二人家庭升幅較高，較2011年分別上升17.2%及11.3%。

分析又發現，115萬貧窮人口中，逾半為在職貧窮家庭，有逾62萬人；65歲或以上長者則佔32.5%，有逾33萬人，意味每3名長者便有一人活於貧窮之中。而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亦由2011年的3,400戶，急升至去年的4,900戶，升幅高。

樂施會香港項目經理黃碩紅表示，不少在職貧窮家庭中，15歲或以下及65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沒有工作能力，故在該類家庭中，在職人口不足22萬人，就業率僅35%，估計每名在職家庭成員平均需要供養近兩名非在職家庭成員，供養壓力沉重。

黃碩紅續說，逾半在職貧窮戶每月收入低於平均綜援水平。當中只有6.3%有申領低收入綜援，相信大部分家庭仍希望透過工作擺脫貧窮，惟最低工資加幅追不上通脹，令家庭百上加斤。

該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曾迦慧指，根據累積通脹升幅，現每小時32.5元的最低工資

水平購買力只相當2010年10月時的26元，批評最低工資升幅一直落後於通脹，相應購買力追不上，甚至落後於現時生活水平及需要。曾迦慧認為，政府過去雖推出多項扶貧措施，惟貧窮人口仍不跌反升，反映現行措施力度不足，當中仍有不少政策漏洞。

10月16日《蘋果日報》指出：特首梁振英上任4年，社福開支增加55%達662億元，本港去年貧窮人口卻突破134萬人，是2010年至今新高；即使現金福利介入後，貧窮人口也超過97萬。梁振英稱扶貧工作漸見成效，「貧窮人口連續第3年低於100萬」；政務司長兼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卻唱反調：「講得通俗一啲（點），就係擦住佢」，坦承貧窮數字再大幅改善空間有限，多了貧窮人口似乎是不爭的事實。

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指出，隨最低工資、交通津貼、長生津等措施落實時間越長，扶貧效果也慢慢消化，「扶委會成立以來可以做的已做了，看不到再有何具體措施，尤其是新一代向上流問題，根本沒有舒緩到」。

周又指，梁振英想連任特首，扶貧政績只是政治宣傳，「林鄭似乎做完今屆，將實況講出來」。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鐘劍華也指，二人昨發言重點及調子不同，梁貫徹其誇大自己政績及推卸責任的作風，將解決貧窮問題推卸於能否興建更多公屋，似在呼應橫洲建公屋爭議，「叫些人不好阻住（起公屋）」。林鄭則點出實際問題。

雖然兩年一檢的最低工資由去年的32.5元增至34.5元，但有調查發現市民仍要捱貴菜，做一頓飯的成本升幅隨時高於通脹。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昨日公佈最新一份18區「兩餸一湯指數」，今年9月份街市「兩餸一湯」平均價格為107.1元，按年升近10%，比「兩年一檢」的6.15%最低工資增幅還要高。在制定最低工資增幅的委員會中，代表資方的委員卻支持少加，代表勞方



的委員也很少能據理力爭，以致增幅遠低於實際需要。

工聯會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在過去11年本港GDP增加82%，但工人工資扣除通脹後則只得0.5%的增幅，幾乎沒升過。同日的《蘋果日報》跟著報道了一宗實例：88歲的黃婆婆每月領取的2,000多元長者生活津貼，只夠所住的公屋交租及電費水費等；在沒有積蓄下，惟有做兼職養活自己，每次花三個半小時來回車程，由九龍住所到機場亞洲博覽館做清潔工。

黃婆婆說，過去數天朝八晚八或朝八晚七開工，日做11至12小時，每晚只睡數小時，掃地、拖地、倒垃圾等做到無停手，兼職清潔收入有時一個月有1,000至2,000元，有時只有數百元，為了維持生計黃婆婆從不推掉工作。其他時間則去執紙皮及舊報紙去賣，或派傳單得些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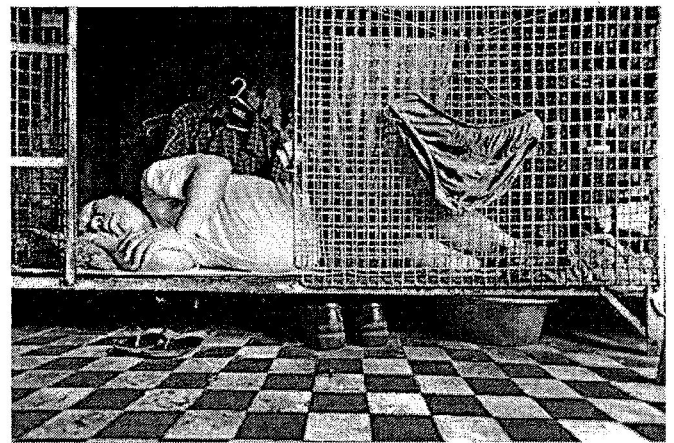
上引黃婆婆的實例，可見其他貧苦人們的情況一斑，如沒有兼職的，只靠當局的有限援助，將會比黃婆婆更苦。



由於香港樓價不斷飆升，一般沒有物業自住的市民，日益要捱貴租，租住的劏房「蟻房」又貴又細，很多的睡房比囚室還要細。擁有房地產售賣的地產大財團，其財富則暴升，成為富豪。幾個藉地產發達的港人，也獲選入世界極少數富豪之列。而廣大市民卻要捱居住難的痛苦。在香港彈丸之地，貧富懸殊日益加劇。

為要有效解決當前中下層港人的許多生活困難，當局必須實行全民退休保障措施。港府已從賣地和征收到過千億元的利得稅款等，擁有非常充裕的財力，能撥出一部份支付全民退保的資金，決不能諸多推搪，或以假塞責。全體市民需要起來全力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實現，現時比以前是更有利於爭取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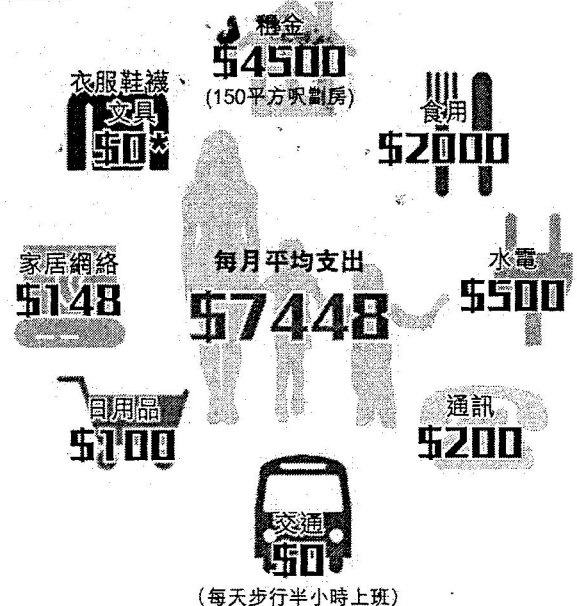
15/11/2016



### 三人貧窮住戶怎樣捱

阮家家 40歲 單親媽媽育有二女 做洗碗工 \$8000 / 月

\*社福機構提供



「我女兒什麼都不買，玩具有人送才要，從來不去餐廳吃飯，從來不看醫生，病了就去買些藥。」



## 「政變」始於人大釋法——《抗命》反抗梁振英政變(轉載)

### 社會民主陣線

繼成功褫奪青年新政二人的議員資格後，近日梁振英及律政司進一步針對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姚松炎），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四人的議員資格。各種政治打壓源起自11月5日人大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議員及官員宣誓條文的釋法決定而來。先不論是次人大釋法的合法性以及「釋法」變為「立法」的問題，單就其所引伸的惡果而言，是次釋法不只干預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制度，釋法內容更是無視《基本法》、意圖以言入罪的政治打壓行為。

人大常委「解釋」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必須「以真誠、莊重的方式宣誓維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且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把字句讀出」，但何謂「真誠」、「莊重」？這些模糊的字眼都涉及主觀性判斷，釋法後擁有極大權力的監誓人隨時可以無視民意基礎，因主觀地認為某人「不莊重」、「不真誠」而直接褫奪民選代表的議員資格；而以司法覆核來挑戰議員資格亦只是將同樣的主觀性判斷問題帶上法庭，更會破壞三權分立下法庭的不干預原則。

更甚，人大在釋法效終對象中加插「及其」二字，使基本法第104條變成要求所有公職人員不只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更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現況下，變相要求議員對中國共產黨效忠，有強加「愛國愛黨」條件之嫌。由早前的選舉確認書到今天的人大釋法，港共政權一直透過僭建不同的條件來限制公民參選要求，明顯就是一個政治篩選的過程，從中踢走不合心意或是危害中共政權的參選人，亦令《基本法》第二十六條中保障香港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形同虛設。

即使成功通過宣誓，及後若然任何一位議員參與六四集會大喊「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又或是聲援內地民運人士，已可被視為「違反誓言行為」而遭受司法挑戰，因為釋法第三點指出：「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意味議員尤其民主派的言論以及政治行為將受到極大的限制，無視《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下的言論自由，亦失去立法會議員制衡及監察政府的原意。

是次釋法就如同是中共向我們投下的宣戰書，目的就是要發動一場「政變」推翻選舉結果，踐踏選民決定。即使梁振英已宣佈不再連任特首，亦不代表中共的宣戰書將會告一段落，未來有關政治篩選、以言入罪的打壓必定接踵而來。面對強權，我們更需團結一致，走上街頭對抗暴政，1月1日元旦大遊行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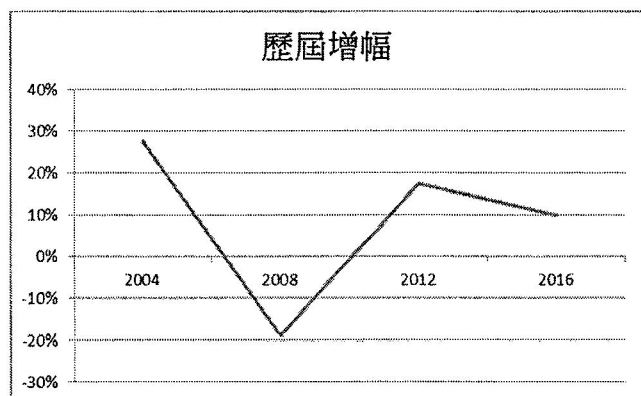




# 2016年立法會選舉回顧

劉山青

2016年立會選舉是視作雨傘運動和本土運動的測試儀。831令大量年輕人走上街頭抗爭。它鼓舞了香港市民，認為香港有希望。隨後，“傘運世代”成了選舉口號。



傳媒指，今屆投票率為歷屆新高，但這是錯覺，增幅才是最重要，今屆的增幅為10%，上屆增幅為17%，實際比以前的少，2004年在50萬人上街的增幅更是28%。

## 年輕因素

議會選舉本是政治立場、不同階層利益的角逐。因此，政治立場、政績、誠信及政黨背景本是選舉的重要因素。但不少香港人相信：“議會沒民主，議會工作沒意義”，這等於說民主沒意義。

例如，練乙錚、李怡等人鼓吹：「投下本土的一票，投下年輕的一票」，是香港的選舉文化劣質化的表現。因為，接班有一定過程的，這種拔苗助長的惡果在今屆表露無遺。

## 退選

今屆選舉前發生了自由黨候選人周永勤聲稱受到威嚇，在論壇上退選風波，禁止候選人在某一階段退選本是防止賄選的一種手段。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7及8條顯示，“任何人士賄賂，或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以誘使候選人退出競選，以及任何候選人因索取或收受賄賂而退出競選，即屬違法。”但《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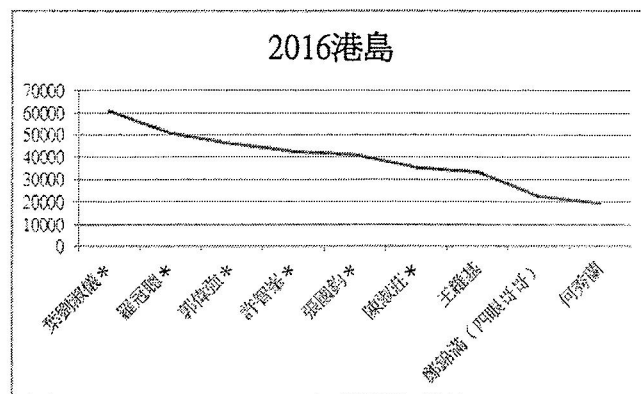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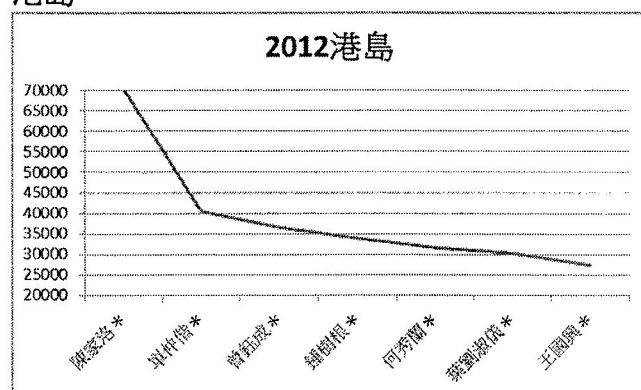
條例》主要是針對第三者，今次事件若是當事人自編自導，則可能成為無頭公案。

## 投票日隨筆

筆者在周六晚8時許收到一個電話，阿伯口音，通知筆者翌日不用幫長毛助選。由於事態嚴重，筆者立即知會長毛的團隊負責人。關於黑勢力滲透，筆者在2012年幫助陶君行立法會選舉時已領教過。他的觀塘總站的選舉工程差不多停頓，他的街站令他跌票。長毛的選舉工程被滲透。

鍾庭耀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已是目前最科學最可靠的了。它被共產黨打擊了，令泛民支持者無法配票。筆者在當天早上趕往票站途中發覺最大問題是棄選了泛民候選人仍然掛著招票的宣傳橫額。他們沒有利用其位置，提醒支持者不要浪費手中的選票。胡穗珊、司馬文等每人若得了2千多票，約為當區的0.7%。這是相當危險的作法，因為新東的長毛只贏了方國珊千多票。

## 港島



港島應是公民黨的發源地，它的總得票的跌幅很大，從2012年陳淑莊和陳淑莊70,475票跌至2016年陳淑莊的35,404票，跌幅為5成，遠遠超出泛民的平均跌幅。其中一個解讀是，公民黨從建黨時的精英主義，走向民粹主義，引起其傳統支持者不滿。

### 民主黨及公民黨

兩個傳統泛民主要政黨在今次選舉中似乎沒有受到本土及青年力量衝擊，公民黨保著6席，民主黨反升1席至7席。

2016年民主黨在港島的得票率為11%、九龍西為9%、九龍東為15%、新界西為7%、新界東為7%；同樣地它2012年分別為12%、16%、15%、5%+7%=12%、8%。它在2016的全港平均數為9%、2012為12%，跌幅為25%，相當大。

2016年公民黨在港島的得票率為9%、九龍西為12%、九龍東為14%、新界西為7%、新界東為9%；同樣地它2012年分別為21%、16%、15%、14%、7%。它在2016的全港平均數為10%，2012為14%，跌幅為29%，更大。

### 邊際理論

一個傳統政黨會因其定位及政黨工作而得到一般性認受，只要其推薦名單不太離譜，它會大致上在各區收到基本盤。他們的基本盤尚足以每區得一席，民主黨在2012年新西拆票令其失新西席位，今屆補回，因而新西跌5點，屬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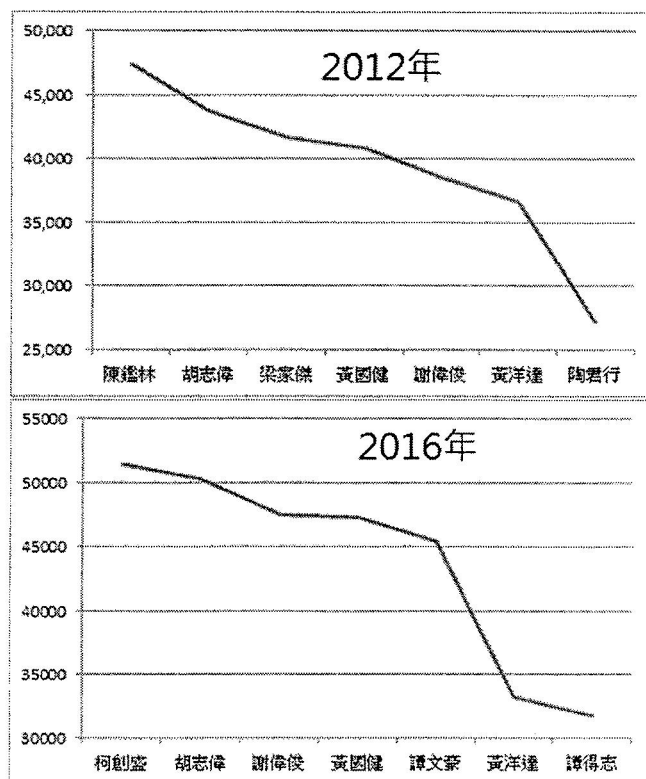
公民黨同是陳淑莊，在港島跌了12點，可以理解為公民黨在這4年來有本質的改變；另外公民黨的郭家麒跌幅也頗大，由14點跌至7；民主黨的黃碧雲由16跌至9，似乎沒有受惠於鉛水事件。

民主黨跌幅小於公民黨是因為它在民生政策等方面交了一些功課。正如筆者在選舉論壇的翌日聽到市民討論三跑與空域關係，市民最關心的還是一些已經政治化的重大民生議題，而這些議題是小黨、激進黨、青年新晉等較難處理的議題。

兩黨受惠於邊際理論，它們在4年後可以被其害死。在理論上，它們可以在下一屆同時跌出5區。民主和公民黨在下屆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他們在政策工作上的努力。

### 九龍東

今次選舉真正策略性投票的發生在九龍東。人民力量的快必打低了黃洋達，給熱普城致命的一擊。



在2012年，陶君行和黃洋達的票數加在一起，佔九東總票數的22%；在2016年快必與黃洋達的佔20%。兩個組織的選民基礎大致相同，兩者處於敵對，不可能過票。

當年黃洋達與陶君行是57對43之比。當年正值黃毓民分裂社民連，黃洋達越區以新人身份挑戰陶君行，雖則取得更高票，實質志在打跨陶君行。

同樣地，2016年的當選者也大致處於直線範圍。社民連人力與熱普城同樣處於敵對。

雖然雷動的九東建議為：“譚文豪及胡志偉的支持者要繼續支持他們。策略選民的選票集中投給譚得志。”但雷動的支持者傾向傳統泛民，對快必沒有好感。當中不少是敵視激進泛民，有些人認為：“其實社民連及人民力量不是泛民，他們一直不認為自己是泛民，並曾猛烈攻擊泛民。另熱血公民自以為是，與所有黨派為敵。”可見，雷動幫助不到快必。

如筆者在投票日隨筆所言，“我屬的東九的



末席的競爭者全是垃圾，好在有我們的快必頂著。他大概都會壯烈犧牲。二次大戰的片我們看得多，每次戰役都要有士兵死守橋頭堡的。”

快必是今次選舉中的表現佼佼者，十分勤力，街頭宣傳能力很高。他與黃洋達的票數為51比49。很大部份的票數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今次打殘黃洋達十分重要。熱普城失去兩位主力黃毓民和黃洋達。「國師」陳雲貼文準備“寂滅”，其他如中出羊子表示“淡出搞小生意”。鄭松泰未必能擔起這頭家。

陳雲根大敗的道理很簡單。現時的青年大多不看文字。他的所謂理論十分膚淺，任何人都可以取代。這和黑社會差不多，拳頭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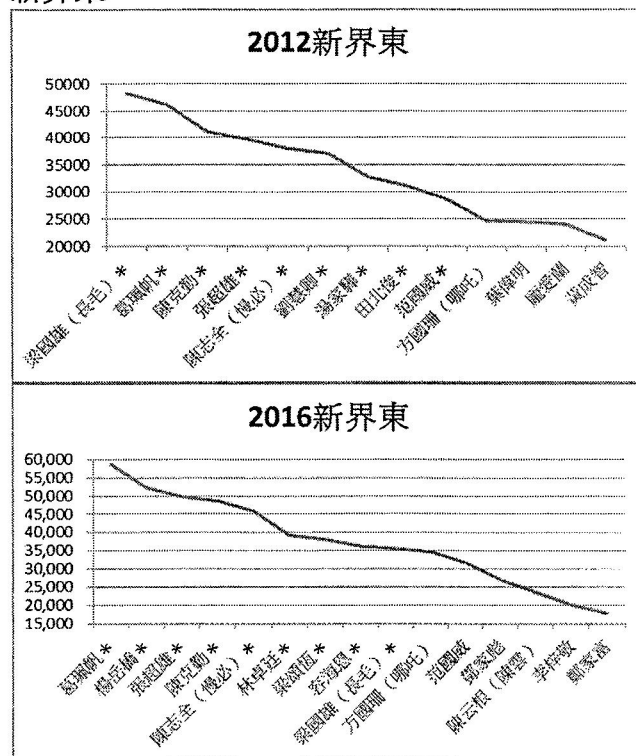
### 九龍西

九龍西似乎是在今屆轉變很大和最不穩定的選區，先不要說今屆它出了全女班。黃毓民的票源與游蕙禎的極之接近。黃毓民的跌幅為5成，說明他在這4年的工作不為選民認同。而黃游2人的總得票為九西的14.6%，是蔣麗芸的19%和梁美芬的18%之後，排行第三，反映該區的本土右翼的力量。

另一個為人注目的是劉小麗，得票14%。她是今屆唯一的真正依靠雨傘運動打出名堂的。在雨傘運動中，她長期駐紮旺角，成立小麗教室，建立了自己班底，又組織魚旦革命，屬於又有組織能力，又有動員能力的人。她應付傳媒的能力也很強。



### 新界東



新東的走勢較符合直線理論，即受不可知因素影響較少。若將各人名字以數字代之，再運用回歸法。其標準誤為1792票，離開假設性直線的最大誤差值為3358票。將其簡單地說，上帝之手可能要在兩者相差超出1800票之外，才有機會以科學方法預測。但這是事後分析，馬後炮，對職業鏢票者來說，其可估算誤差應遠遠超出此數。若以方國珊、長毛與容海恩作賽前預測，他們需要10%的相距，才有機會有較高可信性，但他們的實際相差只有1051和588，遠遠低於可估計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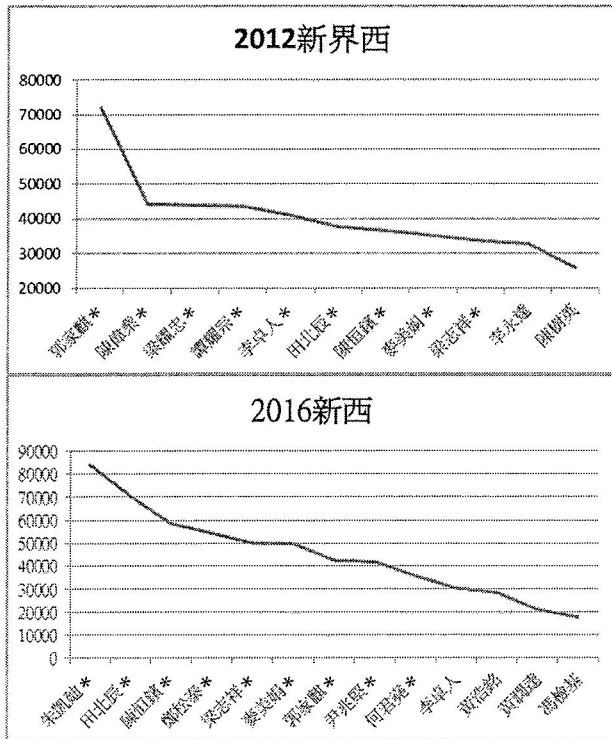
首先，長毛的選舉工程屬災難性，完全不符選舉原則。他的選舉工程越做得好，越有機會輸。慢必的票數比他高30%，而人力社民的選舉部署是救慢必，一票長毛，一票慢必的口號只對長毛的支持者有效。我的一位外國來的舊同學在選前2天與我聚會前的第一句話就是：他們做來好像不想贏。今次選舉工程實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長毛的選舉工程越做得好，他越大機會輸。但結果是贏了，故事變成俠義故事，沒有人注意這點。

鄭家富與范國威故事比想像中複雜，需要一些數學。兩人同屬票源，原來有師徒關係。范國威取5%選票，鄭家富取3%，末席之爭在長毛、

方國珊、容海恩都是6%，因此鄭家富若不出選，范國威穩勝。鄭家富的支持者較為保守，近基督教民主黨，不轉投范國威的餘下支持者應屬十分保守或非政治化，不會投給長毛的，可分給方國珊，甚至容海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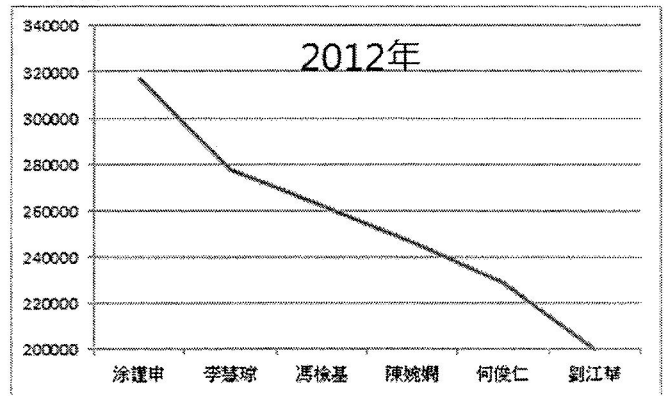
共產黨可能在這裡吸取了經驗——最有效的選舉工程是支持泛民內部的潛在競爭對手，不管他們是朋友的還是敵對的。

### 新界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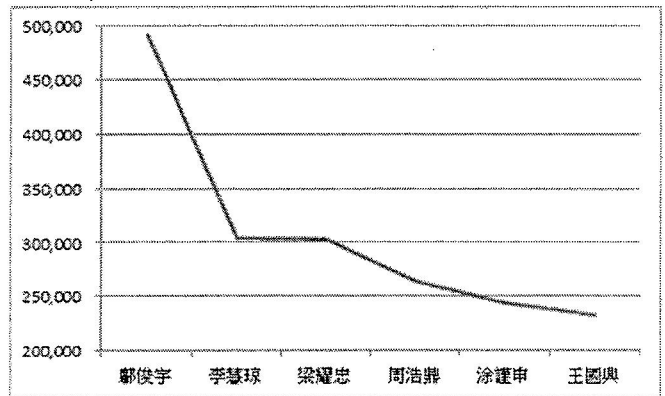


新西有朱凱迪現象，從沒有支持點到得票14%。值得注意的是公民黨的郭家麒從2012年的72,185票跌至2016年的42,224票，從14%跌至7%，與港島一樣，跌了一半。另外，李卓人落敗的直接原因是2012年功能組別的馮檢基到新西參選，兩人同屬票源。但李卓人有本身問題，他從2012年的40,967票跌至2016年的30,149票，從8%跌至5%，跌幅很大。

### 區議會二



### 2016年



2016年民主派的地區直選得票率為55%。筆者認為，計算香港的民主盤較可靠的方法是以區議會二作依據，因為選民的考慮較單一。以此計，2012年的民主盤為51%；2016年為58%，其增長率為14%，相當可觀。民主派在2012年和2016年分別取了3席。

民主黨的鄭俊宇的得票率比餘下4人的平均值高出76%，十分突出。李慧琼多出王國興23%，涂謹申贏王國興4%。

2016年的鄭俊宇現象是一特殊現象，不能以其本人的認受度來解釋。由於公民黨退選，民主派的強大增長不能爭取第四席。涂謹申從2012年的榜首跌至2016年的末席，主因應是民主黨的內部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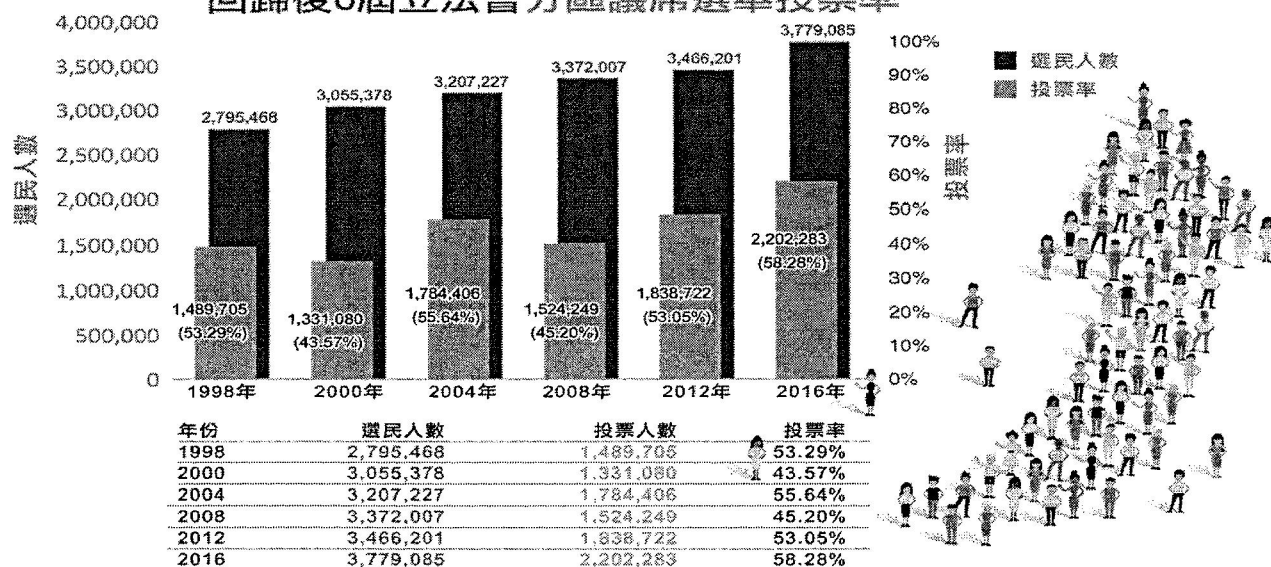
### 迴歸法分析

筆者將各選區走勢的直線部份進行迴歸法分析。標準誤是它偏離理想直線的值，大致可作為預測能力、準成度。系數是直線的斜度，大約可理解為配票的能力。標準誤/系數大約可看作其選區的特色。但這方法需要其他配合，目前它只是一個粗疏的嘗試。



| 總得票  | 2012年     | 標準誤  | 系數   | 標準誤/系數 | 今屆選民增加率 | 2016年     | 標準誤  | 系數   | 標準誤/系數 |
|------|-----------|------|------|--------|---------|-----------|------|------|--------|
| 港島   | 330,766   | 807  | 2490 | 32%    | 114%    | 376,577   | 1080 | 3200 | 34%    |
| 九龍西  | 232,081   | 392  | 1398 | 28%    | 120%    | 278,871   | 1780 | 3600 | 49%    |
| 九龍東  | 284,782   | 738  | 2015 | 37%    | 116%    | 328,993   | 740  | 1490 | 50%    |
| 新界東  | 464,745   | 1067 | 2469 | 43%    | 125%    | 580,524   | 1640 | 2600 | 63%    |
| 新界西  | 498,610   | 845  | 1620 | 52%    | 121%    | 603,446   | 1760 | 3900 | 45%    |
| 區議會二 | 1,591,872 |      |      |        | 120%    | 1,909,968 |      |      |        |

回歸後6屆立法會分區議席選舉投票率



## 工黨

何秀蘭跌5成，李卓人票數只及末席的85%，是選民很清楚的訊息。工黨成立於2011年，其主張是：民主、公義、永續和團結，但博愛才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水嶺。它的主要問題是工盟與工黨分家，其主要的資源在工盟，工盟缺乏參政經驗。例如英國，英國工黨的主要支持來自工會。工黨自成立以來，沒有共享資源，真正的工黨從來沒有成立。何秀蘭的立場近中產多於工人。

現在，工黨的立法會議員只餘下張超雄。他的支持度一直沒有變，他可能要考慮工黨以外的出路。

## 雷動

雷動計劃影響了今次選舉，其作用不明顯，引起很大爭議。雷動計劃由一些學者推動，但它

沒有真正地運用科學方法。

在今次選前，我的朋友已為雷動計劃爭持得不可開交。有人打圓場，說：“經過一役，大家都長知識。”我回應，“經過一役，是不會長知識的，只會更頑固。”戴耀廷在佔中佈署上已證明政治離地，他今次還堅持雷動。主要的參選者都對他不熱心，已說明計劃將會是皇帝不急太監急。



#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決議評析

## 張開

### 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

中共在今年10月25至27日召開了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

《準則》首先指稱：“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主要是：在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中，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鬆弛……拜金主義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任人唯親、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現象屢禁不止，濫用權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違法亂紀等現象滋生蔓延。特別是高級幹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夥夥，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這些問題，嚴重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嚴重破壞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嚴重影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強黨的建設，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因此，全會認為有必要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

全會制定的《準則》共有12條，分別為：一、堅定理想信念；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三、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四、嚴明黨的政治紀律；五、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六、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七、發揚黨內民主和保障黨員權利；八、堅持正確選人用人導向；九、嚴格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十一、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十二、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每條準則都詳細列出具體細節，應有盡有，巨細無遺，要求幹部黨員完全做到。

但中共的歷史經驗不斷表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敷衍塞責。這種抗拒不肯執

行中央政令的情況由來已久，普遍成風。由於中共在30多年前開始推行資本主義經濟路線，還美其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私有財產泛濫，引致黨員幹部都向錢看，唯利是圖，政治權力與金錢結合，更加相得益彰，幾乎無官不貪。要他們捨棄既得的利益，實在是難上加難的。

而且，古語說得好：後事不忘前事之師；我們應以史為鑑。中共過去的經驗教訓已作了証明：在這次《準則》開頭第3段，便已承認：在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三年，即一九八〇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深刻總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為撥亂反正、恢復和健全黨內政治生活、推進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則和規定今天依然適用，要繼續堅持。

這就表明了：同樣的主要原則和規定，雖然當時已經公佈實行了，但並不能防止後來有那麼多的「突出問題」，像《準則》開始所指出、並成為今天「必要」再制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的。

現在以《準則》的第一條「堅定理想信念」來說，其具體說明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必須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建設，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

「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

但在實際上，對這條理想信念動搖和滑坡的，正是中共的領導層自己。1978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路線，改革計劃經濟路線為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放給境外投資，其名句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即是讓資產階級在中國發展起來。其後，隨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也蓬勃發展，越來越佔優勢，而原有的國營（或公有制）經濟比重則日益



減少。據今年3月12日香港《文匯報》轉載3月11日的《南方日報》的評論文章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目前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數量已佔市場主體總數的90%以上，並創造了超過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社會就業，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67%的對外直接投資。」

上引的數字表明：中共過去所重視的公有制經濟，現在已不再是「主體」，即主要部分了，它只佔市場主體總數的10%以下，只創造了不到40%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35%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到20%的社會就業，這些都表明公有制經濟（或稱“國有”經濟）已不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部分，即中共所稱的「主體」地位了。（轉引自《十月評論》總240期拙作《中國資本主義復活證據明確》）。這種不利對比後來還會繼續擴大的，中共要繼續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稱也更難使人民信服了。

### 黨內監督條例

中共最高層當然會知道，各級領導人、幹部以至一般黨員都很少人會全心全意去落實上述《準則》的各項規定，而且，黨內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因此，全會同時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在《條例》第一條便指出：「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強化黨內監督，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條例》分為8章，共有47條，特別詳細地列出黨內各級領導機構、領導人、黨委、幹部、黨員等必須負責的監督任務。但它只限於黨內進行，卻排拒了公共輿論監督、公眾監督，嚴控報章、網絡曝光官員醜聞，不公示官員財產，就只會加劇官官相護的弊端。不能強化黨內監督，就不能保障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效。

《條例》第27條就承認了黨內存在的嚴重弊病：「紀律檢查機關必須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堅決糾正和查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欺騙組織、對抗組織等行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也指出：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管黨治黨寬鬆軟，不正之風和腐敗蔓延，嚴重威脅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安全。他透露：中共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00餘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00餘萬人。這樣多的處分，反映問題的普遍而嚴重。

### 習近平昇上「核心」權位

在這之前，習近平已擁有黨、政、軍、公安的全部最高領導權力，現在再加上「核心」的權位，顯示他要成為一切權力的中心，能起主導作用的領導中心。

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後，習大大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搞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了。這次的六中全會就為他鞏固權位，清除了一些可疑的異己高官，擢升了忠實的心腹親信。

全會雖然在文件中仍有「堅持集體領導」的提法，但已見不到36年前《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強調的“反對個人專斷”。這恰恰反映出個人專斷正大行其道。

10/12/2016



# 中國加入全球金融資本遊戲的慘痛代價

青岩

## 外儲急降、資本外流

中國2016年12月外匯儲備只剩下3.01萬億美元。要知道2014年二季度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曾經高達3.99萬億美元，佔到了全球外儲總量的三分之一。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國外儲下降近萬億美元。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分析是因為央行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美國大選後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貶值、債券價格也出現回檔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導致外匯儲備規模出現下降。而2016年12月份的下降則多與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有關。人民幣貶值加劇，央行拋售部分外匯儲備支撐人民幣。

無論是2016年12月下降的410億美元及11月下降的691億美元，還是2015年8月驟減的939.29億美元外儲，其最大動因還在於“美元強勢下的市場換匯需求和資本外流”。雖然業內專家普遍認為，“資本流出”始終都是決策層不可回避的痛點，但外匯局給出的外儲下降官方解釋中並未直接提及資本流出。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認為，若外儲跌破3萬億美元，會有較大風險。因為這會使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承壓，進入惡性循環，形成自我實現的貶值預期。

盤古智庫研究張明指出，中國經濟面臨資本淨外流。在2016年第3季度與第4季度進一步加劇。2016年第3季度國際收支表口徑的外匯儲備縮水規模要比央行口徑的外匯儲備縮水規模超過約1000億美元，目前似乎找不到令人滿意的解釋。近期，跨境人民幣資金發生了持續大規模的淨外流，這可能是國內主體規避央行監管的一種新模式。

張明詳細分析，自2014年第2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中國經濟已經連續10個季度面臨資本淨外流。非儲備性質的金融帳戶逆差在2016年第3季度更是達到了2073億美元的歷史峰值。據有資料顯示，資本淨外流在2016年第4季度更加猛烈。2016年各月的中央銀行外匯占款增量均為負值，且該指標在2016年11月達到559億美元（3827億人民幣）的年度峰值。2016年7月至11月，中國外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匯儲備連續5個月負增長，且增長規模不斷擴大，在11月達到691億美元。11月的外匯儲備縮水額大於央行外匯占款縮水額，其差距可用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升值的估值效應來解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第3季度中國國際收支表上外匯儲備縮水了1355億美元，而央行公佈的外匯儲備額僅縮水了388億美元。

張明又指出，自2015年10月至今，中國出現了持續的、大規模的跨境人民幣資金淨外流。2015年10月至2016年11月，中國出現了連續14個月的境內銀行代客涉外人民幣收付款逆差，這是非常不正常的跨境資金流動，累計規模達到3724億美元。但有趣的是，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香港市場上的人民幣存款餘額卻由8543億人民幣下降至6625億人民幣。

那麼，流出的人民幣最終去哪兒了呢？張明認為，由於中國央行從去年811匯改之後已經收緊了外幣資金淨外流，因此過去一年以來，有很多企業與個人先將人民幣資金挪出內地，再在香港等離岸市場上兌換美元。按理說，這會導致香港銀行體系的人民幣存款增加。但為了避免境外投機者能夠借到更多的人民幣來開展做空交易，中國央行很可能通過中銀香港等中資機構將離岸人民幣調轉至內地。

## 加入全球金融資本遊戲

蔣夢瑩引言，2012年至2016年，中國金融資產擴張的速率和幅度令人側目，以M2/GDP為代表的貨幣化程度從174%跳漲到203%，貨幣擴張速度較GDP擴張速度年均要高5.8個百分點。金融業占GDP的比例從2012年的6%上升至8%，而製造業增加值的比例從33%下降至30%。2014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開始貶值，2016年全年貶值幅度超過6%。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教授劉煜輝詳細分析，2012年開始，金融行業過於追求與經濟週期不匹配的高收益率，卻沒有能夠為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正確定價。金融過度自由化，金融部門的信用膨脹趨勢很明顯。為了對沖經濟的下行，決策者

的思路可能是企圖大力推動金融創新，來推動中國的經濟轉型，很遺憾的是在路徑上出了問題。於是看到的結果就是更多的金融信用資源流向了房地產行業和效率不高的國有經濟部門。國有經濟部門某種程度上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異化成了資金的掮客。國企、商業銀行乃至整個金融體系都在裡面套利，最後套的是和央行的對賭，最後賭的還是體制，賭的是中央財政的救助，賭的是國家背後對風險的一系列擔保。無論是借錢的人，還是出借的人，無論是需求方還是資金的供給方，都存在著很強的預算軟約束的扭曲的態勢。

劉煜輝批評，金融過度自由化造成的後果是樓市價格的失控、金融內部交易的亢奮，金融交易套利與中央的精神相背離，還包括人民幣匯率市場無序地釋放人民幣貶值的壓力等等，這些都有可能導致脫離可控的軌道。貨幣信用創造在理論上是無限的，這個能力在整個監管鬆弛和金融自由化思路的主導下，推動著商業金融體系自身創造貨幣信用的能力，可以說通過影子銀行、毫無監管的金融貨幣創造的過程，這種無限的能力完全被釋放出來了。

劉煜輝分析金融政策之變化。2013年銀監出臺了8號文，年中出現了錢荒，最後出臺了127號文，約束銀行表內資產的創造和同業資產的創造，但是這段時間不長，從2014年開始整個金融系統的信用創造逐漸開始從表內轉到表外。2014年開始，整個銀行體系和金融體系的信用擴張都主要體現在表外資產急劇地上升，通過同業搭橋，把表內的錢轉到表外，表外對接各種能夠加杠杆的非銀機構，包括互聯網、協力廠商等財富管理平臺，杠杆就是這樣加起來的。劉煜輝認為，2016年7月26日政治局會議以後，可以看到中國宏觀政策一個很重要的變化，眼前是要集中力量在接下來的12個月、甚至是18個月時間裡都要集中力量幹好一個事情，就是控制金融風險。例如，市場外繼續加強資本管制，限制資本流出，限制換匯需求，調整人民幣匯率一攬子貨幣比重，對黃金進出口管制，調查虛擬貨幣等等一系列場外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在2016年12月25日，發表了題為《8·11匯改後中國的匯率政策和匯率體制改革》的演講。余永定卻提出不應該保匯率的觀點，除了基於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影響、外匯儲備消耗等政策成本的考慮之外，他還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不怕匯率貶值的國家，因為中國是經常專案順差最大、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二，中國政府管理能力非常之強，這樣一個國家的匯率不可能一貶到底。他在其著作《最後的屏障》辯稱，資本管制是要逐步放鬆的，不能一下子放鬆。如果過快地開放資本項目，你就會犯顛覆性的錯。

不過，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盧荻一針見血地批判，在全球金融霸權下，中國陷入兩難之困局。在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和衰退期間，發展中國家更加受害於金融霸權和金融掠奪。自2008年以來，發達國家不斷推出的量化寬鬆導致天量“熱錢”流向發展中國家，這些貨幣流通量通過金融杠杆被進一步放大，造成發展中國家嚴重的資產泡沫。在2015年以後，“熱錢”又從發展中國家回流發達國家，再次通過杠杆效應，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泡沫破裂。全球金融霸權操作下的“熱錢”流進和流出嚴重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中國由於資本外逃流失外匯達6000至8000億美元，當年A股市場的股災和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都在很大程度上與“熱錢”的流動有關。好在中國迄今基本上仍然能夠管控資本帳戶的核心項目，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受到的損失還不算嚴重。

盧荻分析，現在中國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和放開國內金融市場讓“熱錢”流動更加方便，導致國內資產市場劇烈波動。更加糟糕的是，金融投機活動嚴重地擠壓了生產性投資，促使中國的實體企業也越來越投機化。中國面臨兩難選擇：如果現存的國際貨幣體系和經濟秩序不變，那麼人民幣國際化即使是最好的結果，也只是通過中國經濟的金融化從全球金融霸權中分得一杯羹，即是讓中國完全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更加可能的結果是中國被世界金融霸權所俘獲和劫掠。



## 反思霧霾現象 破謎

中國國務院在2013年發佈的“大氣十條”要求北京在2017年實現空氣品質大幅改善，PM2.5年均濃度達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但事與願違，2015年年均PM2.5濃度仍超過80微克/立方米。2016年12月16日，第一次拉響空氣污染紅色警報。

網上立馬流傳以下嘻笑怒罵的段子：（1）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見面的都是生死之交；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聽說北京今天能出來約會的都是真愛；聽說今天出門就算聚眾吸毒。（2）記者街頭採訪：「大媽，您覺得北京的霧霾給您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大媽說：「影響的太大了！首先就是你得看清楚，我是你大爺！」

除了北京，成都亦被霧霾重重包圍。張春和唐大旻分析，成都雙流機場因大霧和霧霾關閉跑道14個小時，取消上千航班，2萬名旅客滯留在機場；緊接著成都地區長達九天持續空氣污染。

張春和唐大旻指出，污染源於成都的現行經濟結構。2015年，成都市的空氣污染源解析明確顯示PM2.5排名前三的來源是交通排放、燃煤和揚塵，均超過20%。儘管工業直接排放僅占6%，但鑒於鋼鐵廠等重工業企業也同時是燃煤大戶，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直接和間接造成的空氣污染依然可觀。

張春和唐大旻批評，過度倚重房地產開發和基礎建設投資的地方經濟極大增加成都的環境負擔。國家統計局網站資料顯示，成都市2014年房地產開發企業施工房屋面積超過1.7億平米，超過了北京和上海。成都正在變成一座塵土飛揚的大工地，而揚塵是顆粒物的一大來源。

再者，成都的交通規劃更是直接造成污染。成都人買車完全沒有任何限制，該市從2013年起機動車擁有量就緊隨北京之後位居全國第二，且增速驚人，從2013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時間翻了一倍。目前成都有機動車464萬輛，據媒體報導，車輛氮氧化物排放占到全市排放的一半。高溫下氮氧化物產生臭氧，而高濃度臭氧可能導致呼吸道炎症、神經中毒、頭暈頭痛等。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專案主任董連賽批評，東部地區為治理環境將重污染企業，如燃煤電廠、化工

廠等，向外遷移，而急需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西部地區全盤接收這些企業：2015年中國批准建設的210座燃煤電廠中，四分之三都位於中部和西部地區。

解決霧霾的辦法眾說紛紜，大多討論如何治理污染企業及計算治理成本，比如北京大學教授汪丁丁在其文章《長期霧霾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效應》（2015年12月15日），引用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北京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70%）來自汽車尾氣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來自燃煤。據報導，京津冀地區完全停產的企業數目大約5000家。平均一家企業養活100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五口之家），那麼，50萬工人家庭總共有大約250萬人口。假如命令這些企業永遠停產，需要完全負擔250萬人口的生活費，假設每年每人4萬元，一共要支付的費用是1000億元。

老田在其文章《霧霾作證——我們怎樣失去了另一種工業化道路》（2016-12-20）辯稱要有想像力去改變工業化模式。他批評現行的工業模式是以犧牲農村工業化為代價，如果不是徹底剝奪農村工業化的前景，應該不至於那麼多的工業和人口密集地擁擠在城市，帶來工業和交通各種各樣的嚴重污染。

老田依據徐俊忠教授的文章——《中國農村集體經濟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指出在關於鄉村工業化的政策辯論中，始終要剝奪農民辦工業的權利。在農村集體經濟無法通過興辦工商業來增進收入的同時，工商業過度集中於城市，結果是城市的野蠻生長和鄉村的過度衰敗。

老田再指出，大城市人均上班距離急劇延長，與城市攤大餅的惡性膨脹趨勢有關，更是源於恢復雇傭勞動制的居住空間制度的變革——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居住在由單位提供住房的上班地附近。人均交通費用上升帶來的碳排放以及污染擴大，導致集中於城市的工業化帶來的污染難題，越加嚴峻。

換言之，徹底解決霧霾難題，必須從全局著眼，城鄉協作，改革現行工業模式及房地產政策。若眼睛只盯著霧霾，即看不見霧霾背後的凶手——城市產業資本集團與房地產利益集團。

## 中國是讓人哭笑不得的國家(轉載)

慕容雪村

這個國家有全世界最龐大的官僚隊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貪污或受賄，每一種權力都被污染，成為致富的法寶或傷人的利器。

根據公開的報導，每年有大量的財富用於這些官僚的吃喝、旅遊和公車消費（每年九千億人民幣）。

或許有人會問：納稅人為什麼不反對？

抱歉，在這個國家，沒有納稅人這個詞，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會說，這些事不足為奇，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任何一個國家都曾經有過。

我承認，但還是要說，如果腐敗可以分度數，那麼 5 度腐敗和 100 度腐敗的差別不僅是個數位，前者還可以算是瑕疵，而後者已經成了災難。我還要說，不能因為別的國家有腐敗，就認為中國人應該忍受這種腐敗。

在中國，有些官方發言人會說，因為中國人的素質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請你相信，說這話的人，他自己的素質就很低；還有些人說，因為中國的獨特國情，所以不能給民眾太多自由，請你相信，說這話的人，他自己就是國情；還有些人說，中國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權，而是穩定，在這裏，我請你相信，說這話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穩定的因素。

2009 年底，我混進了一個傳銷團夥，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傳銷團夥幾乎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一位中國學者曾經對此做過精準的論述，他把這種社會稱為「前現代社會」，主要有三種人構成：騙子、傻子和啞巴。

不過令人高興的是，中國已經發展到了後現代社會，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那就是：騙子越來越多，傻子和啞巴都快不夠用了。

如果說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那麼中國還是一個半開化的國家，一個大洪水之前的國家。

你們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國還是一個完全的身份主導型社會，在那個社會中，一個人

能做什麼，能做出什麼成績，不是取決於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質，而是取決於他爸爸是誰。

如果某人是個王八蛋，他的兒子也必是個王八蛋，很多年後，他的孫子、曾孫子依然是個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後，情況有了什麼變化？

我要說，有所進步，可是進步不大。

我們的社會依然是一個身份主導型社會，官員的兒子、孫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頭的兒子、孫子依然是巨頭，即使他什麼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個將軍。

在近十幾年中，這種情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一直在惡化，到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成了一個以身份為主導的板結型社會，每一種權力、每一門生意、每一項資源都被徹底壟斷，平民子弟幾乎沒有希望，他絕對沒機會能成為奧巴馬，更不可能成為比爾·蓋茨或約伯斯，即使他只想過正常的生活，那也將無比艱難。

事實上，在最近的幾年，中國市民階層的生活正日益艱難，沉重的稅負、昂貴的房價，日益上漲的物價和微薄的工資，人們就像風箱裏的老鼠，左右為難，舉步維艱。

計程車本是不錯的行當，可就在幾個月之前，有位司機親口告訴我：他已經有幾個月沒吃過肉了。

當我們經過一片豪華住宅區，他這樣感慨：這裏的大樓越建越多，為什麼我的日子卻一天比一天艱難？

有一首歌謠極為生動地描述了人們的憂慮：「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跟你；病不起，藥費讓人脫層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萬幾。」

你們知道，中國已經成了奢侈品消費大國，但更令人高興的是，在這個國家，連死亡本身都已經成了昂貴的奢侈品。

一個以身份為主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缺乏創造力的社會，所以我們看到，無論在工業、

農業、商業還是在文化藝術領域，中國人都絕少創新，有的只是抄襲和模仿。

近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向世界輸出價值觀，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學院，不知道它們是否改變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們全改成中餐館肯定更受歡迎。

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這糟糕的制度，在未來的幾十年間，中國仍將是一個缺乏創新與發明的國度，它或許會有很多錢，但一定不會有太多文化；或許會有強大的武力，但一定不會讓它的國民感覺平安；它或許能造出許多大房子，但可以斷定，在這大而無當的房中，每一個細節都代表一個遺憾。

談到中國的種種問題，人們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說是因為中國人的素質太低，有人說是倫理道德的缺失，還有人說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但在我看來，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有一個糟糕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權力不受約束，只能漸趨腐敗；法律形同虛設，它是權貴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鎖；警察和軍隊最大的作用是維護統治，只會讓人們感覺更加恐懼，而不是更加安全；在這種制度之下，沒人對歷史負責，所以也就沒人對現在負責，更不會有人對未來負責。

人們只關心利益，只關心眼前，不守規矩成了最大的規矩，不擇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場，在商場，大多數競爭其實都是底線的競爭，總是讓卑鄙的人勝出；在這種制度之下，每個人都會感覺屈辱，不管身邊有多少「和諧社會」的廣告，許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離開這裏，到平安的地方去。

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澤東主義和中國王朝政治的不倫之子，叢林法則、儒家權謀和共產主義的混血產品，經過幾十年的發育，已經成長為一個又大又醜的怪胎，它虛榮、蠻橫、自視甚高、從來不會認錯，它打倒一個人是因為正義，給這個人平反，還是因為正義。

一切好事都是它領導的，一切壞事都是因為背叛了它的領導。

它主宰一切，只允許一種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許一種感謝，那就是感謝它；它擁有每一份報紙、每一所學校、每一座寺廟，沒有它的允許，連花朵都不能隨便開放。

它既強壯又脆弱，身患重病，卻有著強大的殺傷力；它異常笨拙，卻有著無比敏感的神經，一點風吹草動就能讓它神經緊張，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讓它怒火中燒。

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個越來越大的毒瘤，毒害著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經，把君子變成惡棍，把美的變成醜的，並將最終把整個國家拖入可怕的災難之中。

在幾千年的戰爭和殺戮之後，人類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權力如同猛獸，必須把它關到籠子裏。

這是現代社會的共識，但在中國，一個大洪水之前的國家，大多數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們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卻不相信良好的制度，總希望有一隻不那麼殘暴的猛獸來統治他們。

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願望，因為猛獸正在身邊徘徊，野性尚存，隨時準備擇人而噬。

當權力的野獸在身邊咆哮，人們會變得格外謹慎，只要日子還能過得下去，他們就絕不會多說一句話。

他們漠視自己的權利，也漠視別人的權利，鄰居的房子被拆，他們若無其事地看著，等到他們自己的房子被拆，鄰居們也在旁邊若無其事地看著。

但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沒人可以置身事外。

一人不自由，則人人不自由。

一人不安全，則人人不安全。

這糟糕的制度能夠運行，是因為我們都曾經為之出過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是制度。制度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當我們端起飯碗，問題就在碗裏，當我們走在路上，問題就在腳下。

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國家的未來，也關係到每個人的命運。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底線的國家，這話不對，這國家並非沒有底線，它以你我為底線。當它越來越好，是因為我們都曾為之努力，當它越來越壞，也是因為我們的努力。（完）

——轉載自作者博客



## 社會的失序更要反思政府的公共政策問題 ——讀鄭永年《道德領域失序的根源是社會的經濟資料化》有感 (轉載)

鄭義

中國社會的問題，其實就是政府的社會管控問題！社會領域的失序的原因，一針見血地說：管理者違反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偏離了黨的群眾路線！

**第一、公共服務嚴重不足的問題**，中國是一個14億人口、幅員廣闊的勞動力大國！本來，政府的公共服務就嚴重不足，公共產品非常欠缺。另外，世界各國政府都以增加就業率作為國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強”的政策支柱。但我們這樣的公共服務嚴重欠缺的人口大國，前幾年竟然還提倡什麼“減員增效”，現在回過頭來反思：到底減了什麼員？增了什麼效？實際情況是：減員的都是誠實工作、含辛茹苦的普通勞動者，增效的都是各單位、各地區領導的皇親國戚！如此，在公共服務嚴重欠缺的情況下，還搞所謂的“減員增效”，更加造成我們的社會進一步陷入無政府狀態！

**第二、國家的所有資源(特別是財政資源)**，過分集中在政府公務員身上【享受極其優厚的待遇、遠超企業職工的退休保障(萬惡的雙軌制至今沒有破除)、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所謂“公費醫療”與“社會保障”統一，實際上還有極大的差距)等等.....】，很多公務員又懶政不作為(現在：社區工作、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工商巡查、環衛巡檢、市場監督、衛生監督、環保監察.....等等，在基層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很多都不是公務員，而是編制外臨聘的協理員，工作量大，待遇又低，缺乏行政管理的權威性，沒有行政執法權，公共服務自然大打折扣。在社區基層，我們極少看到公務員在第一線提供公共服務，反過來說，艱苦環境下的艱苦崗位，絕大部分不是公務員！那麼，公務員又憑什麼壟斷那麼多的社會優質資源呢？！)。

在全國經濟低迷情況下，黨政機關公務員卻一枝獨秀，成為了中國最穩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體，公務員根本就不用考慮自己的工作是否得到公民的認可，他們既是政策制定者、也是實施者，任憑市場經濟急風暴雨，都影響不了公務員隊伍，因為他們在體制內，無論調到什麼部門都帶著國家體制內的特權(即：工資關係、行政級別、醫療關係等等跟隨轉移)。目前在各大城市的黨政機關的公務員隊伍，按照五年晉升一級的潛規則，即使碌碌無為、無所作為混日子，但是，混十來年就**自然晉升**為科級、二十年後“自然晉升”為處級；或者，巧立名目設置編制安排幹部的；又或者，享受“高套”待遇，什麼處級科長、局級處長、局級調研員、顧問等等，這些沒有擔任實職卻“高套”享受相應待遇的非常普遍；這本身就是權利自肥的制度性腐敗！

甚至，相當部分人在黨政機關碌碌無為沒辦法安排職務的、或者臨近退休的，就到處找關係活動、削尖腦袋派到國企集團當任高管，享受高薪，這些人沒有企業管理能力與經驗，不瞭解企業歷史，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既敗壞國企的風氣，又打壓國企職工的上升空間.....

如此荒唐：

一方面，全社會優質資源都集中到只占全社會極少份額的公務員隊伍名下，導致我們社會的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人養尊處優、懶政不作為，對積累多年的社會問題、對群眾反映麻木不仁。

一方面，全國多年持續性經濟低迷；另一方面，政府機關及其事業單位卻大幅增加各項福利保障。

一方面，退休養老的雙軌制、公務員的公費醫療等等保障政策飽受詬病；另一方面，在輿論壓力之下，所謂的“統一退休保障”、“統一

社保”等等保障政策卻暗藏很多的貓膩。公務員繼續維持巨大的特權！

反過來，企業職工近幾年在經歷了政企分開、資產劃撥、企業重組、分流、下崗、輪崗、失業、退養等一系列“改革”新名詞的擺佈之後，過去辛勤勞動創造的積累付諸東流，被隨意宰割，因而對社會心灰意冷。

政府應該明白：如果，養老金並軌、統一醫保……等等的社會保障政策又搞出不同的標準，政府的法規就沒有權威，國家的統一就沒有基礎，國民就進一步分裂！

長期下去，必然導致國民的心態失衡，思想扭曲，社會進一步撕裂。

你要代表人民，就必須與人民打成一片，與群眾共呼吸、共患難。否則，就無資格代表人民。

第三、幹部政策的失誤，選拔幹部片面以年齡劃界，強調的是“團派、秘書幫”，為了給將來擔負重任的年輕幹部增加實踐經驗，又提出所謂的“機關幹部下放掛職鍛煉”，結果，這些下放幹部到基層時間太短，最多兩、三年，從事的往往都是次要工作；其次，打壓地方基層幹部的上升空間，基層對此類幹部極為反感；第三、下放幹部普遍打著下放鍍金的心態，外出混三五年、平安無事即可提升職位，因而下放掛職也是出去混日子、撈取政治資本、掌握下放的資源大肆進行利益輸送，大搞人身依附，互相團團夥夥、拉拉扯扯、拉幫結派……，根本談不上實際貢獻、群眾口碑等等……，因而，所謂的鍛煉就大打折扣！

國有企業同樣糟糕：企業領導人都是利用企業相對寬鬆的人事任免機制，網羅一批黨政領導秘書、親屬擔任企業高管，或者利用企業工作崗位網羅上級領導的皇親國戚為己所用，其實就是以“安排工作”為名變相行賄、權錢交易！！另一方面，對於高官來說，安排自己的皇親國戚到高薪崗位工作，比別人快地晉升職務，獲取高薪，這是一種隱匿的斂財方式！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更為荒唐、氣憤的問題：很多企業的幹部考察制度、民意測驗完全就是領導人欺騙上級組織部、玩弄幹部職工的騙局！都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面對面、肩並肩的狹窄空間內進行，誰也不敢提不同意見。這些幹部考察、民意測驗的結果從來就沒有向廣大職工通報、交代過，完全是領導人一言堂！

個別考察規則甚至為領導幹部的皇親國戚度身量做。完全就是欺騙！

如此這般，這些晉升職務的人往往都是既無群眾口碑、又沒有工作實際業績、更沒有工作閱歷的支撐。因而，其公信力就大打折扣。

第三，政府官員好高騖遠、貪大喜功，拼湊國企集團高度壟斷，壓榨下屬中小企業，導致經濟發展嚴重下滑。前幾年，政府推行國企改革，違反《行政許可法》第24、83條的原則，以“資產劃撥為主導、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為名，將原屬政府不同部門的企業“行政劃撥”給地方政府國資委屬下的國企集團（控股企業），各大型企業集團依靠政府的行政劃撥、不勞而獲地代替原來的不同政府部門，搖身一變成為“大股東”、“出資人”、“母公司”等等。本來，原國企的出資人是其各自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門，但“行政劃撥”後，各地方政府部門的“權益”、“股權”卻完全變更到這些企業集團旗下，造成極為荒誕的局面：這些唯利是圖的企業集團，不花一分錢就兼併眾多優質資產，不花一分錢就成為“大股東”、“出資人”？！並以政府管理者名義、以“出資人”（沒有一分錢的資產關係）名義，按照只要資產不要人的思路，將原企業職工掃地出門，欺行霸市，大肆掠奪下屬中小企業，用被整合企業的資產供養利益集團的皇親國戚，從而劫持了社會、綁架了政府，我們還是市場經濟嗎？！

如此荒唐的觀點：大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先進的？！但是事與願違，企業合併了，變成高度壟斷的權貴利益集團，肆意打壓下屬的中小企業，破壞經濟生態，社會失去了公平，沒

有競爭，沒有活力，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也改變不了，只是政府官員變相的權力再分配而已。這些國企集團對下屬中小企業的掠奪，形同明火執杖，入室搶劫，既是對“依法治國”、“法治社會”辛辣的諷刺，更與“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搶、抄是何其相似乃爾！

如此荒誕的資產重組必然導致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更加敗壞社會的經濟秩序！很多大型企業集團，不是真正依靠本事自身發展起來的，而是依靠地方政府無償劃撥並湊起來的，很大程度違反下屬企業職工的意志、實際上欺行霸市，更加弱肉強食，導致權力與資本結合，這些權貴利益集團壟斷社會話語權，導致我們的經濟形勢一潭死水，積重難返！

現在，很多國企的所謂董事會、監事會、理事會等等，相當大部分是假的！這些所謂的董事、監事、理事們與企業根本就沒有一分錢的關係！沒有絲毫的資產聯繫！這些國企集團的龐大資產幾乎都是依靠國資委的“行政劃撥”生拉硬拽搞出來的，這些國企的假董事、假監事、假理事們幾乎都是國企內部的關係戶，皇親國戚等等……

國資委、以及下屬的國企集團利用在內部推行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公然對抗《中央文件》（中辦發〔2002〕13號）精神！把我們的職工大會制度架空了！廣大職工含辛茹苦地為國企發展努力工作，同時將自己的生老病死的保障寄託在國企的發展上，絕對不會與自己的飯碗過意不去！國企的敗壞都是政府的貪官與國企高管狼狽為奸、裡外勾結、吃裡扒外導致的。

根據中央（中辦發〔2002〕13號）《關於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重大事項公開制度的通知》中“公開的總體要求”其中第3條明確載明：未經職工大會審議通過的可視為無效決定！但在很多地區、很多企業卻被現在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而且還是假的）破壞了。

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政府存在兩個方面的嚴重錯誤：

一方面，違反《行政許可法》第24、83條，把原來政府行使的職能與權力劃撥給了國企集團，導致國企集團肆意打壓掠奪下屬中小企業，弱肉強食加速壟斷；

另一方面，又以虛假的“現代企業制度”抵消了黨中央《關於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重大事項公開制度的通知》（中辦發〔2002〕13號）中“公開的總體要求”，其中第3條明確載明：未經職工大會審議通過的可視為無效決定！鑒於政府的違規，導致現在很多企業的職工大會審議制度形同虛設。

當今的國資委、以及下屬國企集團，已經變成權力與資本結合的邪惡壟斷寡頭，面對職工質疑，企業集團官員們擺出一副地痞流氓惡霸嘴臉：一方面，裝模作樣地學習“三嚴三實”、“兩學一做”、建立所謂的領導幹部學習群、微信群、黨課、宣傳欄、網上學習考試等等，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樣樣不拉，無所不用其極玩弄“高大上”的新概念（包養那麼多高官的皇親國戚來做表面文章）！（實事求是地說：組織宣傳完全正確！宣傳政治學習很有必要）！但糟糕在於另一方面，上述的“學習”故意掩蓋本地區、本單位、以及個人的實際問題，完全違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嚴重違反黨的群眾路線，違反科學發展觀，傷害群眾利益，大肆以權謀私，不僅掠奪下屬基層企業的資產，還漠視基層職工的貢獻，藐視職工訴求，以“解放思想”、“轉變思路”為名進行掠奪，特別是搬出鄧小平同志的名言“不爭論”壓制職工意見、威脅“不換思想就換人”，以“創業”、“轉型”為名，將原來為企業奉獻幾十年的職工掃地出門，趕出去養豬、種地、植樹、賣肉、自謀出路等等等等……

利益集團盲目追求GDP指標，導致極其荒唐的悖論：過去幾代人辛勤工作積累的國有資產越是優質、創造的積累越豐厚、貢獻越大，反



過來，在經濟低迷情況下，更加成為弱肉強食的目標？！更加成為強制性兜售資產、殺雞取卵的目標？更加成為滅頂之災？！反過來，那些吃光分光的企業，由於沒有資產，憑藉極其低迷的營業額（甚至搶奪下屬企業的經營專案）堂而皇之享受高薪待遇！極其荒唐無恥！

政府肆意違反執政黨的意志、違反國家的法規，企業管理違反正義原則，利益集團打壓下屬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加速壟斷，經濟發展嚴重下滑，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經濟秩序更加混亂、道德領域的失序更加不可避免。

我們一針見血地說：振興經濟關鍵要建立公平正義的經濟秩序，打破利益集團的寡頭壟斷，調動廣大中小企業的積極性！集中優勢辦大事更要依法辦事！這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而不是“去庫存”、“去產能”……，“庫存”“產能”的原因恰好就是利益集團盲目衝擊GDP指標造成的，僅僅是壟斷導致經濟低迷的表面形式而已，絕對不是核心問題！

打破國企集團的壟斷、嚴格規範國資委、國企集團的管理、嚴厲制止國企集團對下屬企業的掠奪、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與做大做强國有企業並不矛盾！

國有企業，國有資產、國有資金，屬於國家、政府、以及為該企業發展壯大的廣大職工，如果，政府直接管理，我們毫無保留、無言無悔！我們相信政府！

但是：國有企業絕對不能被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自身經營不善，空手套白狼、不勞而獲的利益集團掠奪強姦！

第五、服務業（第三產業）的淪陷：我國是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勞動力大國，在各級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經常看到要大力發展服務業，把服務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2010年，政府為了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保障勞動者權益、維護穩定而制定最低工資保障，本意是為了改善民生，但是，政府沒有配套措施，不是通過減稅、免稅等等措施來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扶持

我們的實體企業，而是一毛不拔，加重企業成本，更加將遵紀守法的中小企業、尤其勞動密集型企業推向深淵！結果，珠三角、長三角不少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唯有關門、跑路……

第六、城鄉失衡的問題：在城市工作缺乏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稀缺情況下，政府又過分提倡發展城鎮化，在某種程度上放棄鄉村工作，城鄉進一步失衡。一方面，城市更加擁堵不堪，空氣污染加重，治安惡化、社會矛盾更加惡化；另一方面，鄉村的人才流失特別嚴重，為了節省經費，很多地方紛紛撤村並校，現在的鄉村，幾乎都是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土地污染荒蕪，水土流失……

政府的公共政策失誤，一方面公共服務嚴重不足；另一方面懶政不作為，某些方面又違規亂作為……

於是乎，我們的社會更加失序……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堅持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建立了獨立自主、部門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全球華人為之自豪！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國情懷，深深愛著自己的國家，但我們不能夠忽視自身所面臨的危機重重，特別是在內部公共政策問題上，多年來的“不爭論”政治導致很多重大的公共話題被擱置，各種社會疾患積重難返……，我們必須擦亮眼睛，認真審視存在的問題。

黨中央提出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群眾路線、確保公平與正義，我們認為：公共政策的實施，無論是贊成、或者反對，都值得各級政府尊重以及思考。因此，各級政府要認真反思自己的公共政策，完善我們的改革措施，使我們的改革少走彎路，讓政府和人民共同進步！

# 菲德爾·卡斯特羅(1926-2016)：歷史翻過一頁

法蘭西域·沙巴多

我們必須如此想像當時的世界：全面展開的冷戰和史達林主義凍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古巴革命想要打破這種情況，創建一個新希望。

## 國際主義革命動力的重新燃起

一個“游擊隊”，起初不過幾十個人，然後有幾百名戰士，竟然鼓動起全民，推翻巴蒂斯塔的血腥獨裁統治，這是如何做到的？面對美帝國主義，一個只不過一千萬人的民族成功地站起來，並使世界形勢兩極分化，我們能做什麼解釋？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承認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袖素質。他保持了反對北美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驅何塞·馬蒂的古巴革命傳統。但我們必須注意古巴革命的雙重特性：當時，雖然與民族資產階級結盟的戰略主導著工人運動，但是，菲德爾和他的戰友們制定了武裝鬥爭戰略，把遊擊行動同群眾運動、示威遊行和起義罷工結合起來。第二個特點，通過反對“美國佬帝國主義”，古巴領導層確保了國家主權。為此，它把主要的資本主義控股公司，特別是北美公司收歸國有，開始使國家，特別是在教育和健康領域，擺脫不發達狀況。

儘管古巴是一個小國，菲德爾仍然在西半球本身內推進革命進程。菲德爾和切·格瓦拉之間的奇妙合作，恢復了工人運動的最佳國際主義傳統。從一開始，尋求戰鬥人民支持的行動就成倍的增加，起先是對越南人民的支持。一九六六年一月，古巴人又舉辦了國際會議，被稱為“三大洲會議”，彙集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國主義力量。自從20世紀20年代召開過重大國際會議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一政策體現在切·格瓦拉在拉丁美洲（玻利維亞）和非洲（剛果）進行的武裝鬥爭中。還有，20世紀70年代派遣數千古巴士兵幫助安哥拉人民擊退南非軍隊的攻擊，也是這個政策的體現。

我們可以並且必須討論古巴戰略裡的某些戰鬥偏差，但是，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國際主義革命動力燃而復起。

## 蘇聯壓力和官僚變形

20世紀60年代末，古巴革命面對力量關係和全球市場的現實。它為一個教訓付出了血肉代價，這個教訓就是俄國革命以來給革命運動的警告：“社會主義不能僅建立在一個國家中”……

由於封鎖和北美禁運造成的孤立禁錮，古巴領導層執行自己政策的餘地越來越少。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同蘇聯的戰術協議是必要的，可是它變成了政治從屬品。1968年8月，菲德爾·卡斯特羅支持俄羅斯干預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方面，選擇加強糖的單一種植生產，大大削弱了該國，導致1970年“薩夫拉”——糖收穫——的失敗。特別在北美封鎖變得更加嚴厲的情況下，這增加了古巴對蘇聯的依賴。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模式越來越多地被用作為參考模式。深入古巴政治裡的古巴戰鬥主義的縱向概念，加上蘇聯模式，加劇了古巴國家官僚的變形：民主自由的限制、政治多元化的缺乏、給對手的壓制、一黨制度的鞏固、古巴人民的社會或政治結構的缺乏……。

## 現在呢？

許多人預測，在這些條件下，像蘇聯和東歐集團那樣，古巴的革命會崩潰。但是，儘管有以蘇聯援助的終結為標誌的“特殊時期”，加上北美的禁運，遭遇這樣可怕的时代，可是古巴挺住了！因為，儘管它有錯誤，但其革命從來就不是從俄羅斯進口的。它是古巴人所特有的歷史運動。其“反美國佬”的動力，其革命成果——即便脆弱——及其強烈的主權意志則更強。

會到什麼時候？力量的平衡非常不利。北美當局會做什麼：用貨物壓倒古巴還是繼續封鎖它？菲德爾過世後，共產黨內部的勢力和古巴人民會如何重組？中國或越南道路的支持者會得勝嗎？再一次，古巴人民會發現繼續進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嗎？我們希望如此，並在這場鬥爭中支持他們。

這篇文章是為反資本主義新黨（NPA）週刊“反資本主義”361期（l'Anticapitaliste N° 361，2016年12月1日）所寫的。

# 核災難後的福島

智惠松本

有些人說，時間會治癒一切。然而，對於世界上最嚴重核災難的受害人來說，前景看來很暗淡。

自從福島第一核電站三重危機以來的五年，至少有10萬人流離失所；由於家庭財產的喪失以及對未來的絕望，有80人孤獨地在福島自殺（根據重建部和內閣辦公室的資料，截至2015年12月）；輻射污染繼續蔓延；每週五，來自日本內外的人們仍然聚集在東京的首相官邸外，高喊反核口號。

日本政府似乎忘掉了重要的核清理工作，而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中，每天需要3000名工人在距東京約100公里的東京電力公司(TEPCO)的工廠工作。

政府也已重新啟動在南部鹿兒島省的暫停運作的工廠，並計畫重啟北部福井縣的另一個核電站。

災難發生後僅六個月，政府當局就變換，日本隨即開始向約旦、越南、土耳其和南非等國家推銷核技術，所有這一切都遭到國內的強烈抗議。然而，次年，印度欲成為災難發生以來首個同日本簽署核協定的國家。但日本在1976年批准了《聯合國核不擴散條約》。

## 內部抗議

災難以來，人們加入其同行，發聲反對日本的核出口交易，尋求零核電並轉向可再生能源。

他們聚集在負責核電業的經濟、貿易和產業省 (METI)，舉行抗議活動。在這些抗議活動中，母親們生平第一次發聲；年輕人絕食，呼籲消除核工廠。

他們在日本經貿產業省靜坐，豎立於2011年9月的帳篷，立即成為日本和世界反核運動的中心。人們在帳篷裡睡覺，從帳篷出去工作，在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帳篷前上演整年的反核音樂會，針對意圖破壞集會的右翼打手，捍衛自身。

雖不如佔領華爾街運動知名，但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帳篷已成為世界上最長的佔領行動之一，另一個是反對沖繩美軍基地的運動。

現在帳篷佔領者同經濟產業省打官司，後者聲稱對佔領地有所有權，並要求佔領者為過去的五年做賠償。人民已在初級法院敗訴，而高等法院駁回了其上訴。帳篷現在遭受拆除。

## 傾聽工人的聲音

在我們推動運動向前以消除核電時，一些工廠的工人覺得他們的聲音未被傾聽。

柳佑梅田說："我沒有看到任何工人出現在運動中，"今年80歲的前工廠工人，呼籲反核抗議者瞭解核電站不安全的、放射性的工作條件。

"我希望人們質疑是否給工人提供了正確的健康和安全教育，質疑他們被迫工作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梅田說。"知道這些，會讓你感覺更有決心從地球消除所有核電站。為此，我將用我短暫的餘生，讓人們相信，那些東西對我們有多糟糕。"

梅田提起了訴訟，要求對工人做賠償。他聲稱，由於在1979年在核電站工作43天，使他罹患了心肌梗塞和其他疾病。因為很多工廠的工人最終會陷入嚴重的健康惡化狀況，他們常常無法再工作，面臨著沉重的醫療費用。梅田也是其一，靠政府補貼過活。

梅田的案例是第一宗由工廠工人提出的訴訟，要求賠償他的心臟疾病。對於原子彈受害者，同樣的情況是獲得國家承認的。

另一個人是弘升元，他最終賣掉他的房子來彌補他的醫療費，依靠政府補貼而生活。這位82歲的，土生土長的日本南部北九州市人，必須



依靠氧氣罐來呼吸。升元曾在幾個核工廠管理工人所受輻射的水準，他也提起訴訟，為工人爭取賠償的資格。

東京電力公司稱，每一天進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工人超過6000人。另有300人繼續淨化無人區，用黑色軟袋裝填放射性土壤，為受害者返回家園做準備。這些黑色袋數以千計，堆積如山，無處可去。

總承建商、其子公司和東京電力公司的工人正在快速消失。最近有報章報導說，正在徵集外國人清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裡面和外面。

我還採訪了一名孟加拉男子，他在中神奈川，曾經被巴西的招聘人員雇用，在工廠工作。他說，他與其他幾個外國人跳上了賊車。薪酬只比他後來的建築工作薪酬多30%左右。

然而幾天後，43歲男子離開了這份工作，因為輻射對他健康狀況的影響，把他"嚇壞"了。不過，他說，如果他需要這筆錢，他可以再來一次。

## 一名倖存者的總結

我記得2011年3月16日遇見渡邊朋也，地點在福島縣二本松市一所學校體育館轉用作的臨時避難處。我走到白雪皚皚的農村，去獲取工廠工人的災後證詞。

沒有東京電力工人願意與我們交談，因為他們擔心遭受譴責。渡邊是少數幾個外包工人之一，他同意告訴我們他在地震來襲時的經驗。

他在收容所，在那裡幫廚，服務數百個像他一樣的奈美惠居民，後者從他們離福島第一核電站僅十公里的鎮撤離而來。

渡邊結束了他在福島第二核電站的工作任務後、開始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監督工人，轉移至柏崎核電站，在那裡工作，直到它有了定期的檢查。

他向我講述這場災難的那一天。作為一位主管，直到他把其他工人送到安全處，證實了反應堆附近大樓內損害的規模後，他才最後離開該

處。他意識到，他幸運地活著，他發誓絕不再回到那種工作去。

半年後，當我再次去採訪他和其他在福島的工人，渡邊告訴我，他開辦了一家小公司。我感到高興，興奮地知道，災難沒有使他氣餒。但當我聽到他的公司招募和分配人去核電站工作，震驚不已。

"這就是生活，"他告訴我，在其臨時住處，他與其家人就住在裡。"我需要工作"。渡邊不是唯一在核電站找到終身職業的人。許多住在核電站主機所在城鎮的人，認識到了這種相互依賴關係。

去年，他在 Facebook 上發現我，同我講了他從事福島核電站附近公司的去污染工作。至少他的生意是成功的。

自從數千人開始返回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以來，勞工部到目前為止僅核准一例工人賠償案件。這發生在去年；一位40多歲的男子，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一年半後，被確診為患有白血病。

## 需要組織工會

雖然福島災難仍在進行中，需要數千名工人做清理工作，我們應要求適當的健康和安全措施，提高關於工人，尤其是散工權利的覺悟。

福島工會和東京一天勞動者聯盟的勞工活動人士一直在試圖組織散工。不幸的是，他們的努力沒有多大的成效，但是一些去污染工人組織在為他們未支付的風險津貼作洽談。

我們需要繼續組織，同時也要與我們在日本以外的同志一起，為一個無核化社會而工作。在今年3月，我們計畫在東京舉行五天的 '2016年世界社會論壇'，紀念福島核災難五周年，口號是"走向一個沒有核爆危險的世界。"

疤痕可能太深，恐怕時間的推移也難以治癒，但記住福島，對於我們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中流砥柱。

## 反對歐元區的新殖民主義整合 ——希臘給一個社會民主權利之歐洲帶來的教訓 凱薩琳·薩馬利

在歐洲聯盟（歐盟）成員國內外，從我們譴責的，必須稱之為“金融佔領希臘”的這個情況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教訓[1]？正如 斯塔替斯·庫韋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有力指出的，否決（OXI），希臘公投這一巨大的“不”，“並沒有被擊敗”。[2]

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的策略——不對抗歐盟，希望達成一個妥協方案，對每個人都“有益”——是失敗的。同激進左翼聯盟的“突然變臉贊同備忘錄”將要產生的氣餒相比，這算不了什麼——某種並非不可避免的東西，在今後幾周和幾個月將被決定下來。在這個層面上，真正的問題不是希臘脫歐或不脫歐，而是以誰的力量（有或沒有歐元），做什麼？

接下來的反思，是關於部分關於地位的推論，這個地位在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合作的，題為“歐洲的做法：拒絕重建”的著作中得到全面的表達[3]：一場在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鬥爭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只是需要經受分裂和危機。希臘債務危機是否改變了這種判斷呢？我們如何能準備分裂呢？

在希臘發生的事件，要求我們後退一步，擴大辯論——同時，作為緊急聲援活動。我們必須查明和譴責仍在運行的新殖民主義機制，不接受這樣的說法，即：他們是不可避免的，遠未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歷史核心”合併的威脅性計畫走在一起，自稱擁有充分的權力，反對其所有被剝奪了權利的週邊國家。但在危機中，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老歐洲的心臟裡，週邊邊緣在哪裡？

對與歐盟領導機構的談判結果，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顯然持樂觀看法，除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層以外，來自迪·林科（Die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Linke）[4] 最近的文章確認，歐洲左派內部對歐盟存在“正面”的看法，這意味著對激進左翼聯盟左派地位的接近態度。亞曆克西斯·庫可（Alexis Cukier）（“失敗後的反思”）關於這整個階段的最近撰稿[5]，追溯了這些看法及其演變。

但對於不可避免的對抗，歐盟有一個現實的關鍵辦法。對於我們所說的財政緊縮政策的敵意，是進行重組的基礎。同歐盟領導機構決裂的邏輯過去包括，現在仍然包括，希臘和其他地方的激進左派內的各種地位，其中至關重要的是不作簡單化處理。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的口號“不為歐元作犧牲”，獲得同意，意味著為可能的脫歐做準備。但對一些激進的派別而言，任何談判都是一種背叛，或者充其量是虛幻的，更不用說其反作用了：放棄在歐盟內部“為了另一個歐洲”的戰鬥，然後，贊成退歐的總路線，成了一個大方向。

派對激進左翼聯盟政府所作選擇的大部分批評，是“混亂”與似是而非，其目的是讓激進左翼聯盟能夠獲勝：承諾在歐盟內部反對緊縮政策。這就要接受這種想法，即讓激進左翼聯盟領導層執行雙重路線，不準備作對抗，這是唯一可能的選擇——而激進左翼聯盟內部對此的辯論還沒有結束。但一般認為，“清晰”的選擇只有留在歐元區順從歐洲集團，或者退出歐盟（即退歐的總路線）。鑒於第一個選項的政治表演特性，很難看出，為何不選擇第二個。但這種二元選擇有問題，而且危險。它趨於鞏固這樣的路線，這條路線的連貫性應該建議整個歐洲的反緊縮左派爭取離開歐盟——和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而無需在歐盟內部進行戰鬥，斷言它們是不可能的。

對於弗雷德里克·洛頓(Frédéric Lordon)[6]，

“左派的未來是在這四個命題之間做選擇”：

1. 歐元從根本上禁止任何可能的進步政治。
2. 如果任何進一步的證明是必要的，那麼希臘受到六個多月的殘暴罪惡對待（“談判”的重新洗禮），就證明“轉換歐元”的企業，或“另一個歐元是可能的”假設，是怪誕的，帶來的是連續的幻滅，只會導致走投無路以及政治上的絕望。
3. 為了棄而投向極右（順便提一下，極右派，它什麼都做不了），任何政治觀點，只要想結束歐元及其規章，就是一個政治錯誤，無限上綱地歸咎於歐洲左派。
4. 除非它想要繼續追求不會發生的事——“另一種歐元”和及其伴隨而來的“社會化歐洲”——重新武裝的歐洲左派會因此而勢在必行地呼籲我們想像一下歐元之後的生活。

艾蒂安·巴厘巴(Etienne Balibar)和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7]之間的辯論，轉錄在‘備忘錄’中，裡面概述了一個選擇，該選擇針對的是民族主義回落的陷阱和對歐盟的屈從。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的悲觀理論，在他合作的著作和‘歐洲的終結(En finir avec l'Europe)’[8]的序言裡有清楚的論述——在那裡，他主張“把歐洲放在括弧之間”。正如我在質疑他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所寫的——“終結與歐盟的關係，並不與歐洲分手”，有關這個問題，我將做進一步闡述——在其演講辯論中，他省略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鬥爭的現有狀態，塞進了它必將挑起這個聯盟的危機（如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所描述的那些狀態）的觀念。

這種定位在上面提到的阿塔克(Attac)和哥白尼(Copernicus)的合著中做了清楚表達。例如：“認為我們可以走出歐洲各國人民正在忍受的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而不會經歷一個歐洲的政治危機，那是虛幻的。一旦這場危機開啟，這裡所說的左派政府就會採取一些單方面行動，

解釋說，他們打算擴展到歐洲層面。”

“採取單方面的合作措施會成為一個問題，解釋是，面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他們不針對任何其他國家，而是針對寡頭的經濟政治利益，而且越多的國家採用他們，他們就會越加有效。所以它是以另一種歐洲的名義，即一個社會轉型的政府將不得不打破聯盟的現行規則。違背條約，將會以所有歐洲人民利益的名義開啟同歐盟規章的對抗。”

然而，對抗歐盟的路（或在歐洲聯盟內部反對“過渡邏輯”的鬥爭）第一次在歐洲由激進左翼聯盟作了概述。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它似乎在全民投票中逐漸成形。洛頓只是動了動嘴，寫了上面引述的文章，然後就迅速跳過它：因為他想要灌輸的觀念是，這是一個“幻想”，要回到上面定義的二擇一選項，那麼討論如何發展這種做法，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二擇一選法正在與齊普拉斯(Tsipras)目前的進程一起得以鞏固，把任何方向的爭取“另一個歐洲”的鬥爭認同為一個單純的“歐洲主義”，對歐盟具有“積極”的態度，並相信其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健康和有效的辯論意味著充分整合所有現存的立場。

這裡捍衛的立場——歐盟內部針對歐盟的鬥爭——是激進左翼聯盟捍衛的“無人要為歐元作犧牲”的邏輯。因此，它根本不同於任何對歐洲當局要求的屈從（這意味著對接受與否的協調作判斷，避免跨越“紅線”）——因此，也不同於權力的問題（最好放棄而不是執行右派的政策）。這種觀點同退歐陣線的支持者，對於改革歐盟而不正面挑戰其規章和條約的可能性的任何幻想，持批評態度。所以我們絕不能害怕這種對抗（正如比利時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CR)的決議中所制定的“在希臘的強力審判：關於左派的戰略辯論的迫切性”[9]，關於這點，我要談一般的方法——稍後我會回頭肯定其假設），但要盡可能以最好的條件做準備。

這樣的目標，使得有必要把某些提案結合起



來（不能反對或不理會），這些提案或者已經做過討論，或者部分地做過實踐，以便鞏固談判背後的勢力關係：這裡的辯護角度，希臘脫歐，應按照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的想法[10]，作為“最後手段”而做設計，首先要強烈譴責“不合法的，非法的和令人厭惡的”債務，同時應用激進左翼聯盟的“無人要為歐元作犧牲”口號，保護自己免受來自歐元集團施行單邊措施的訛詐，正如埃裡克·杜桑[11]所建議的，或者如一定程度上的瓦魯法克斯（Varoufakis）部長的做法（控制資本運動，國有化銀行，包括恢復對中央銀行的控制，準備一種並行的貨幣，暫停支付債務）。可以想像，湯瑪斯·科特若（Thomas Coutrot）[12]也捍衛的“財政貨幣”，也可以整合面向農業和服務業（保健、教育...）的聲援網路：在這些領域中，現有形式的自行組織和聲援，可能進一步插入在幾條戰線上的一項全民抵抗戰略裡：反對來自歐元集團和全球市場的外部壓力，反對內部寡頭及其武裝力量，反對金色黎明（Golden Dawn）所宣導的聲援“善良希臘人”的政策。

置身事外而指手畫腳很容易，聲稱此處有現成的解決辦法也沒有問題，但重要的是專心聆聽希臘自己設計的解決方案。除了必須拒絕不可接受的備忘錄和新殖民主義的訛詐之外，關於左派的辯論是合法和必要的，正如艾蒂安·巴厘巴（Etienne Balibar）、桑德羅·梅紮德拉（Sandro Mezzadra）和費裡德·奧托·沃爾夫（Frieder Otto Wolf）在給我們的邀請信中所說的，“布魯塞爾的苛刻條件與激進左翼聯盟的困境”。在總體困難的情況下，聲言有一個明顯占上風的“好”選項，是不負責任的，--- 就像蜜雪兒·哈森在Mediapar（“歐元區或希臘”）組織的辯論中所強調的，當時他針對的是塞德里克·杜蘭德[13]所宣導的退歐“美好”假設。在退歐的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對此做“計量經濟學”的評估是不可能的：正如激進左翼聯盟的左翼希臘脫歐論者最有人氣和卓越的提倡者之一，科斯塔斯·拉

帕維斯塔斯（Costas Lapavistas），充分強調的那樣，“建立模型”的嘗試採用了穩定的假設，而周遭環境是內在不穩定的。除非他使用這一論點反對那些預測會有最糟糕的混亂情況的人。它也適用於其他的假說。

我們必須持續開放辯論，因為有一些人關閉得太快：首先，希臘方案並沒有窮盡其所有的可能性。也沒有能夠讓我們測試退歐支持者所申明的確定性 --- 而且對不確定的恐懼無疑施加了影響。但我們必須清楚地接受這個事實，即不正面挑戰歐盟，就沒有替代性的進步政策可以在歐洲得以穩定和擴大。當力量的關係不適當時，破裂會如何發生，遠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過，正如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和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特別在許多文章中肯定的，雖然退出歐元區不是一個令人信服的鬥爭主軸，也不是一個總體的解決方案，但把它排除是一個錯誤，因為面對來自債權人的風險或新的金融和貨幣勒令，脫歐並不能使希臘堅定不移。

但在局面錯綜交雜的辯論之外，退歐是歐盟內部反對歐盟的進步鬥爭的總體優先主軸嗎？難道正如上述的比利時共產主義革命聯盟（LCR）提出的決議，它是一個“所有週邊的國家”的極明顯選擇嗎？答案是，遠非明顯，因為你只要問，週邊國家算到哪裡為止？這就顯而易見了。西班牙國家已經比希臘更不算“週邊”了。義大利怎麼樣？東方的週邊國家.....以及“中央”的心臟地區呢？

雖然我們不應該比排除區域重組所共有的策略更加排除全民脫歐，我們必須堅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退一步，尤其是要選擇“我們的平臺”而作鬥爭。

超越我們必須避免的論戰，很顯然，需要考慮為獲得希臘人民支持而進行動員的弱點。某些分析（如弗雷德里克·洛頓和塞德里克·杜蘭德）展示了一般的不可能性，用他們眼界確認（“如果這是必要的”）在歐盟內爭取“社會性歐洲”的方向的僵局。對他們來說，這一問題的根本原

因並非（僅有）各勢力間的不利政治關係 ---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放棄？事實上，有一個得以動員的所謂非關鍵的，更“原始”的論點：“缺乏一個歐洲人民”或缺乏一個“歐洲政治空間”。

在任何情況下，你可以嘗試單單擺脫這個束縛。但它是虛幻的，在外國直接投資和整個歐洲經濟、金融和商業關係密切重疊的背景下，難以想像，你可以避開已經整合的力量，而無須在它的老巢攻擊它。

為了團結，也為了準備其他國家的“脫離（Oxi）”歐洲，我們必須關心希臘經驗和這場危機在歐洲左派內部的心理影響。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加深辯論。

### 反思/行動主軸之概述 —— 從希臘危機……到烏克蘭危機

上世紀 80 年代之交，出現了世界資本主義化的全球社會化戰爭，對這個問題的反應，是對這場戰爭進行抵抗的一部分。但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使新自由主義的攻勢激進化，自 1989 年以來，給“新[歐洲]舊世界”（佩里·安德森的說法 [14]）一個特別的社會暴力和一些規章形式。

但自2009年以來，新的重大變化在醞釀：幾年前歐盟就可能分裂。在歐洲的主導國家和其他國家中，顯現相反的選擇 —— 利用所謂“主權債務危機”，試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給偽“黃金法則”（pseudo-"golden rules"）以制度性力量，排除政治和民主辯論 —— 包括在國民議會內 --- 排除在經濟政策中作出的選擇：甚至薩洛尼卡緊急方案，以及由“脫歐”所表示的民眾的民主選擇，都是根本上與這種邏輯相矛盾的。

在未作穩定化及合法化的情況下，所做的是鞏固歐元集團的一個歐洲“硬核心”，把其規範強加於別人 —— 成員國、正式候選人或歐盟的“夥伴” —— 如烏克蘭。

所以，留在歐盟內部而反對歐盟的戰鬥很重要，不是因為這會是“進步的”，而是因為出於

各種原因，它是既危險又有吸引力的，但並非沒有弱點：有這樣的假說，它將更糟糕，是完全的“邊緣化”，而且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為爭取聯盟成員的權利而鬥爭，這個假說仍然可信。對新殖民主義行為的不服從運動仍將保持強勁。這種結構的主要弱點是其最廣義的“政治”維度 —— 不僅需要贏得合法性和參加選舉…而且也把其“文明”的擴大合法化，這理應帶來社會凝聚力與和平。

因此對戰略軸心 —— 和特定的鬥爭 —— 做反省或行動。

1. 統一的戰略軸心 —— 必然會出現社會-政治上的“支配集團以爭取另一個歐洲”；它必須建立在歐盟內或外，反對歐盟和它的政策，在歐洲層面維護全民社會權利，無論有無歐元，反對一切形式的仇外心理，反對其所有的“文明化”戰爭，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和外部的。

岌岌可危的是大陸的重組，及其國際地緣政治面（我不能在這裡涉及這個問題 [15]）。在詳細分析了不民主的反社會的歐洲規章的確切內容後，痛斥了把歐盟作為“進步”價值而進行的“歐洲式”宣傳，他針對一個歐盟危機設想了各種方案。最不可能的，是一些國家做了最多協調的那些方案，這時，他制定了更現實的方案 —— 在一個成員國裡發起社會政治運動……

“面對歐洲聯盟的規章，” ‘必要知道，如何在政治上和綱領上準備’ 把一個‘進攻安裝在一個歐盟成員國裡’ 以便“‘在兩個層面上做回應’：在國家層面上，一個替代性政策必須形成，在‘整個歐洲前面’戲劇性地和明顯地扭轉優先關注，使其有利於工人階級，婦女和青年，從而立即採取一系列有利的社會措施及相應的措施來保護這政治經驗。

本質上，它應該回復這樣疑慮，即面對歐盟的敵意，在一個開放的和歐洲式的經濟中，組織起這樣一個國家斷裂的可能性。銘記兩個目標；在國內尋求支持，把它的人民和群眾運動告訴給

歐洲，第二，--- 在歐盟的層面上，比如‘與歐盟分離’的政府，不應離開歐盟，或譴責其條約。目標是放大歐盟危機，使用條約的體制規則許可的最大時間和空間，以便在歐洲產生支持和動員，引爆其他歐盟政府身上的壓力’。因此，‘重新談判條約的要求’將在危機情況下發揮真正的有力作用，服從兩個條件的：1. 給它精確的具體內容，從而事實上拆除條約；2. 配合這一民主的建議，把決策過程從政府手中轉移到人民的手中。”

他繼續分析後來會興起的挑戰（什麼建議？），著重指出歐盟危機的危機也可以來自“資產階級”。“在這兩種情況下——來自左翼的危機或來自右翼的危機，”他補充說，“民主問題作為一種有效的決定手段而啟用，並立即在歐洲一級啟用。（.....）按這種觀點，一個一般的宣傳口號似乎有用，即召開一個歐洲各國人民的民主代表大會。它將會是在每個想要與會的國家選出的議會。其目標是進行辯論，並定義一部憲法的一個或多個項目.....”

如果這是戰略地平線，任何人——無論是否是日前歐盟或歐洲貨幣聯盟（EMU）的成員——都可能涉及；在這個民主社會方案的框架內，從大眾願望和要求開始，回頭修改與歐盟條約有關的東西；每個國家有關人民的動員，顯然是決定性的，反對所有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或同性戀排斥。沒有方案，沒有區域集團或人民專題會議（捍衛普通貨物——健康、教育、水）應該被排除在外.....

但是無論那種方案，只要在議案中有所設置，包括從一個國家開始的一場危機爆發，所採取的單方面措施應該總是轉向“歐洲”——亞歷克西斯·普拉斯（Alexis Tsipras）關於歐洲民主的演講，以及堅持對涉及所有歐洲人民的緊縮計畫舉行全民投票，都是這些要求的良好表達。但在希臘和歐洲，對這些目標的支援，預期應該來自人民，而不是來自官方和歐盟統治階級。

在這裡我想總結這些一般性意見，拒絕任何歐洲民族國家的單一化和集中化模型，因為它無

視民族的歷史多樣性和每個民族的自決權利。

也就是說，並不存在“歐洲人民”，這個事實，絕不是反對歐洲戰略方案（政治和體制的計畫，不只作為社會鬥爭的並行物）的理由。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有關專案，結合不同層次的決策、融資和由主權國家人民決定的民主控制的選擇——遵循重新審查的“主從”原則，根據出現的問題，也根據政治和社會的背景，尋求適度的有效管理。我不會在這裡展開已在別處論述過的一些想法[16]。

葡萄牙左翼集團（Portuguese Left Bloc 上述決議中提到過的）的同志記得，歐洲左派（他們是其中的一部分）近幾年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意在改變歐盟規章。上面引述的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文章，部分是對這個方法的批判，因為該方法針對的是沒有危機的歐盟“民主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所制定的建議沒有意義。他們有助於把辯論具體化，而無需幻想歐盟當局由於其存在，可以簡單地通過“談判”而修改聯盟的規章。

在迫切需要建立的“歐洲公共空間”裡，所有這些建議都可以討論。但第一和最緊迫的事情是具體 --- 而且必須“圍繞”希臘人而制定，具體聲援其戰鬥，反對新殖民主義的歐洲結構。2) 降低圍繞特定軸心的這些戰略問題，提出團結的邏輯，提出達成和保護權利的方法。

a) 反對歐洲債務，也反對利用這些債務的規章變革，因為它們具有不合法的、非法的、可憎的特點.....：反對備忘錄，也反對債權人強加的任何退場辦法。

歐盟最近所經歷的改革全景，在很大程度上，並不為其人民——甚至活動分子所瞭解。在法國，大規模的群眾教育運動曾經轉化為反對歐洲條約的抗爭行動，這個傳統，必須再度興起、更新和擴展。單單譴責德國，這個做法雖然容易簡單，但也是錯誤的，因為它無視法德兩國領導人在歐洲一體化的主要階段的關鍵作用，忽略在歐盟最近的轉型中德國統一所代表的重大轉變。



人們可以大致同意法邊·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在其新聞網站(Médiapart)[17]的概述中的分析:“在歐洲貨幣聯盟(EMU)裡,德國享有‘霸權’,它源於其經濟實力,其在體制上的地位,則源于其把歐元集團不同意見聯繫起來的能力。其不妥協態度深為北歐和東歐的國家接受,因為這些國家或者有與其相同的商業模式,或者被整合進了其出口系統。德國政府不否認其強硬的立場,它已經在國內實施倍受爭議的緊縮政策。而且其他國家,包括法國,同意其做法,對於他們,維護歐洲的邊界勢在必行,在地緣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都是這樣。安格拉·默克爾對這些國家的說法,就像她在其聯邦議會裡演講一樣,宣佈歐元是歐盟“命運共同體的象徵”。希臘危機有助於揭示它爆發之前的狀況:內置於2009年以來的各項條約和協定的新規章機制的實質內容。我同意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和拉茲米·庫車沿(Razmig Keucheyan)關於危機導致“歐洲專制”的分析[18]。但對它必須加以精確定義。歐盟規章必須變革,必須引入新的機制,以便繞過(面對市場投機)體制的某些禁忌和弱點,既不必質疑資本的自由流動也無須質疑歐洲央行的自治性,尤其是不必召開制憲大會:理論上(根據條約),歐盟規章和國家的規則法規的任何變動,必需召開這種大會。

實現一個具有偉大“競爭力的歐洲”是目的。但缺乏以團結為基礎的程式條約,讓自己面臨投機危機。在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後,引入了特設機制,從而“援助”——危機中國家所要求的——可以大幅度地習慣那樣一些規則,這些規則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他地方強推的那些陰險的“結構調整政策”。上文所述的法邊·厄斯卡隆那(Fabien Escalona)的文章(“面臨歐洲‘勒令’的左派方案”),列出了各種壓制性立法措施——“六套規則條約(Six-Pack)”,“兩套規則條約(Two-Pack)”,“財政條約,其中包括關於穩定、治理與合作(TSCG)條約”——其本質是“修改議會的預算自主權”。

歐洲“聯邦制”正得到鞏固,作為“邁向”“大歐洲”的步伐正受到一些人的歡迎,但它應定為“非法的”、“不合法的”和“令人作嘔的”——要使用同描述我們所關心的債務一樣的用詞。

這個類比不是偶然的:難道我們不因該堅持所有新殖民主義過程的違法性——根據本身並不是很民主的歐洲條約——嗎?這些過程不僅在希臘,先前還在賽普勒斯和其他地方實行。我們可以從希臘債務的審計中汲取靈感[19],可以從反對自由貿易條約的全球正義運動的行動或從氣候大會(很多鬥爭的誘因,來自拿俄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書“這會改變一切:資本主義與氣候”,這些鬥爭也給人啟發靈感)中獲取靈感,打造歐洲層面一級的反對勢力和抵抗行動,建立專門知識反駁中心,給論爭和替代方案提供幫助。

b) 提出無處不在的問題:貨幣(在其特定的背景中)、金融、稅收——要做什麼?為了什麼樣的權利和“大眾商品”?

我們必須弄清楚,對於人民岌岌可危的是什麼,反對取捷徑:貨幣不是“中性”的——歐元不比英鎊或美元更中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並不只是仲介交流物。但回歸本國貨幣並不是離開資本主義的一條出路——因此,也並非離開控制貨幣和資金背後的階級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的任何規章,這是真的。對於歐元,它明顯尤其是這樣的。但具體地說,是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EMU(使用歐元的經濟貨幣聯盟),包括所有一系列的規章和管理當局,以及其“標準”,使歐元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個工具。

同歐盟和歐洲貨幣聯盟競爭。具體地說,就意味著不“離開歐元”,但宣導另一項政策,提倡其他的權利,使用其他的貨幣。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歐元——或者德拉克馬、或者英鎊……要做什麼?面對這個問題,政治會轉而反對“活動分子”和社會需要及權利,對貨幣和金

融進行公眾、社會、多元的控制，這個問題，同改變貨幣的口號相比，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和破壞性的。

基於單一貨幣的統一市場空間，幾乎沒有預算作對應，這種結構的片面特性，從一開始就受到質疑。但它不是一個理論的“錯誤”。也不只是“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計畫實行的結果（英國，是非常新自由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但總是抗爭質疑它。……）。它是歷史妥協的結果，在具體經濟和歷史因素的十字路口出現的妥協 --- 德國統一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這裡，我們把這個辯論放在一邊。本質的東西在於方法和建議：

無論我們是否離開歐元區，我們一定不能放棄思考和準備“平行貨幣”，把它作為抵抗的手段，還要把它當作一個多元貨幣空間的更寬廣構想：我們必須在歐洲層面上，在一個把專家和社會運動聯接起來的永久集體的基礎上，進行這種思考和設計工作，推廣以團結為基礎的非牟利資助專案的現有經驗。[20]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必須把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和凱恩斯對後者的批評，融入其不同時期（從金本位制到佈雷頓森林體系）；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力量，針對圍繞替代性貨幣及融資而進行的全球力量關係的結構重組，我們必須進一步激勵反思和行動建議。

在每種情況下，在所有層面上，在資本自由流動的背景下，不能有公共控制的貨幣政策：這是一個中心的，主要的問題；比如禁止對基本需求 —— 農業，還有社會服務，因而公共預算，作投機性私人市場化的籌資。基礎深厚和長期持續的運動，其部署應該顧及這些問題 —— 面向行動的大眾教育。

歐洲各國必須得到幫助，掌握自己過去和現在的反對所有統治關係的抵抗行動 —— 並且在這樣做時，完全理解它並使它成為“共同的歐洲利益”和歐洲公共空間的熔爐。

c) 歐盟的自我維護詞彙，經常進入那些批評它的人的話語裡：我們一定要小心，永遠不要把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組織，歐洲聯盟，稱為“歐洲”，以便以精確的方式對其作批評。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歐洲”種族主義，這個種族主義選定那些“值得”的人為歐洲人，而詆毀其他人，詆毀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歷史…… —— 在這方面，我已有論述，特別論及巴爾幹人民[21] 反對占主導地位的“歐洲”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只承認遵守其規則加入聯盟的人是“文明的”。希臘人民正遭受這種侮辱的全力蹂躪。

更廣泛地說，80年代初，發生了大規模破壞性的社會戰爭，在2008年-09年後，這個戰爭反彈，在這個情況下，有關思想、政治和壓制程度，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把過去和現在的抵抗行為定為刑事罪。因此，二十世紀革命已經退化為古拉格群島和一黨制國家，無視反資本主義和反官僚的鬥爭所取得的社會成果；無視過去和現在的，反殖民主義起義和反奴隸制鬥爭的那些成果，而這些成果，應該完全融入我們必須建立的“歐洲公共空間”；在必須進行的另一種支配權的鬥爭中，我們必須這樣做。

因為歐盟構建的連續擴大，對人民的看法有影響，所以要按照不同人民的眼光，對歐盟構建的主要階段做深入的具體分析，這意味著我們要回到在南方國家（擺脫了獨裁統治的國家）的擴展中占主導地位的不同具體條件，然後回到東方的國家。這樣做，是要瞭解人民的期望 --- 以及他們目前的幻想；但也要設法把握此幻滅，把它轉向反對歐盟，反對它不兌現其平等、社會和民主的承諾。這意味著要清楚地揭露，什麼是不同的制度間冷戰的產物，最終，對於任何替代制度，揭示什麼是它想要結束的。這意味著把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歐洲放在議程上 --- 反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d) 把憤怒的槍口轉而對準那些有錢人，因為這些有錢人根據種族主義對我們實行分而治之。我

們不應該偏離這個目標。

希臘鬥爭的激進化，全民投票中的“不”的深化，不應該轉化為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的利益，或讓希臘的寡頭受益，以及讓德國和法國的銀行，從歐洲的偽-“援助”受益。

我們必須“掉轉憤怒的槍口”，正如讓約翰·齊格勒（Jean Ziegler）所說的[22]，反對各個地方的那些從統治社會的戰爭中受益的人。

特別是在德國，雖然有反對新殖民主義行為和一個歐盟“中心”權力的必要鬥爭，但“週邊國家”也是主導國家的一部分：德國工人遭受可怕的哈茲（Hartz）法律之苦，這個法律擴大了工作不安全感，擴大了“一塊歐元的工作”和對外包工作的依賴；東德人還受苦於強迫的私有化和新殖民主義的做法，心有餘悸。同時，東歐國家的人民已被用於建立激進歐洲社會和財政傾銷（為資本的利益），並實行緊縮“紀律”，拆除社會服務。

各個孤立和被封口的百姓，看不到所有這些剝奪，置身於與他人的競爭中。不正視所有歐洲人民遇到的事——不對抗造成整個歐洲大陸的社會破壞的這個機制和意識形態，我們就不能理解和加強對希臘人民的脆弱聲援，或不能同“反希臘”種族主義作鬥爭，統治階級散佈這個種族主義以便合法化他們自己的政策。

這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由所有有關人民達成，而平等可以是另一個歐洲專案的基礎。就個人而言，我會高興地稱它為“社會主義專案”。但這並不是必不可少的，言詞協定的使用並不是一起發明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歐洲的先決條件。

## 註

[1] 這些條款引用於葡萄牙左翼集團全國領導層通過的決議，“關於希臘教訓的決議：反對金融殖民主義的民主”。<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 斯塔提斯·庫韋拉基斯（Stathis Kouvelakis），“希臘：不，還沒輸，繼續”：<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3] 這本書的撰稿人是維偉訥·安格裡（Verveine Angeli），湯瑪斯·庫特羅特（Thomas Coutrot）、紀堯姆·厄鐵萬特（Guillaume Etiévant）、蜜雪兒·哈森（Michel Husson）、皮埃爾·卡爾法（Pierre Khalfa）、丹尼爾·拉勒特（Daniel Rallet）、雅克·裡戈迪亞（Jacques Rigaudiat）、凱薩琳·薩馬利（Catherine Samary）、奧裡列·圖偉（Aurélie Trouvé）。

[4] 妮可·郭爾克（Nicole Gohlke），簡妮·威斯克勒（Janine WISSLER）“從德國看希臘的經驗教訓：逃離歐元的夢想——爭論的條款”。<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亞曆克西斯·庫可爾（Alexis Cukier），“什麼是歐洲激進左派的戰略？希臘失敗後的集體反思”：<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6] <http://blog.mondediplo.net/2015-07-...>

[7] <http://www.regards.fr/politique/eur...> 7753

[8] 塞德里克·杜蘭德（Cédric Durand），“這是歐洲嗎？——‘歐洲的終結’一書的介紹”：<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9] “對實力的希臘考驗以及關於左派的一個戰略辯論的緊迫性”：<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0] 蜜雪兒·哈森，“好的德拉克馬？對辯論的淺見”：<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

[11] 埃裡克·杜桑，“希臘：替代投降書的另外選項——一些應急措施”：<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2] <http://cadtm.org/Lettre-ouverte-a-Y...>

[13] 哈森，引自前書。

[14]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新的舊世界、Verso出版社、倫敦和紐約，2011年

[15] 有必要回溯 1989 年的歧義，以及在與俄羅斯的新“涼戰（lukewarm war）”中危在旦夕的事。關於這個題目的這些文章，參見 <http://csamary.free.fr> — 關於烏克蘭和“新世界秩序”的最近文章。])。事實上，鬥爭的空間和“歐洲的政治空間”的建設，必須設想于在歐盟內外/反對這個歐盟，並爭取另一種歐洲；而且其建設不應受制於任何“舞臺秀（stageism）”，或回到陽光高地（同時撤退到國家框架和他們之間的簡單“經典”協調）的視覺。另一



種歐洲的問題，不應局限于歐盟的邊界，更不只是歐洲貨幣聯盟的國家——事實上，歐洲論壇和反峰會（Counter-summits）並未淪落為會員國。這並不妨礙區域或專題分組、也不妨礙特定的戰鬥和戰術是可以一起開發調整（想法）的。

必須在工會和協會的層面，在政治層面上，迫切地開發這種方法，不歧視挑戰歐盟的整體方案，不引發其危機，也不歧視各個國家（或加入歐盟者，或採用歐元者，或兩者俱否）的特定方案，這些方案必須從具體情況和戰術選擇中系統性地衍生出來，同時保持相同的關鍵戰略軸。

一定會把這些反對力量統一起來並鍛造出另一個“支配集團”的，是對主導政策的徹底批判，無論他們使用的是英鎊（在歐盟內部或外部），匈牙利福林還是歐元。這種做法，並不阻止其國情方面的固定阻力，也不妨礙系統地尋求使它是同歐盟競爭的工具，只是其方式有限而已。這種定位不會使選擇“贊成還是反對歐元”（或歐盟）成為一個戰略選擇：然而在反體制左派內部產生分歧是可能的，但是不會防止尋求共同的鬥爭平臺，包括在全民公投期間聯合戰鬥的可能性：我們不願見到，在英國激進左派內部的“脫歐（yes）”和“留歐（no）”的支持者都有其充足的選擇理由，同其惡劣的右派對手並肩同行...分享他們的選擇。為什麼不爭取對歐盟和所有仇外的民族主義者進行共同的批評，捍衛整個歐洲的基本權利，讓選民在戰術方案之間作選擇，而在這些方案中，利與弊會老老實實地展現出來。（可以做這樣的夢想嗎？）。我們可以推進（天真？）這樣的想法，即我們面臨著幾個致命危險：所有的歐洲左派可能遭受“希臘式崩潰（Pasokisation）”，或者債權人和歐元集團強行推動擴大化的“希臘脫歐”——而表面上是它自願選擇促成的。至於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特別是“歐拉比亞（Eurabia）”的論調，或歐洲遭受到伊斯蘭教的“入侵”）的興起，在所有方案中都有不同程度地顯現：瓦爾斯（Valls）和薩科齊（Sarkozy）的歐洲主義，同勒龐（Le Pen）的主張相比，幾乎一樣排斥；還有，它退回到民族主義（不能與捍衛國家權利相混淆）同騎在人民背上的歐洲一體化一樣充滿戲劇性。

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成功，同她的反歐洲話語相比，更多得益於其仇外心理——特別是譴責伊斯蘭教對法國的入侵，據其稱，這種入侵威脅政教分離、婦女、猶太人和同性戀者（這有助於在左派的場地重新配置勒龐主義（Lepenist）“軟體”）。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把民族問題（民主自決和主權在民）和歐盟內部反對新殖民主義行徑的鬥爭，留給極右派。不管我們正在談論的是反種族主義鬥爭，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還是捍衛民族權利的鬥爭，在歐洲層面上，在歐盟內部/反對歐盟比在封閉狀態下，他們的一致性都會更加廣泛和更加有效（針對所有多種多樣形式的虛偽工具化）。他們可以採取一般和有原則的意義（無處不在地捍衛所有人民的權利）並在同一時間具體化：什麼樣的聯盟，有什麼樣的地位和現實權利的平等性？

當我們談論這一問題時，向我們懷念的後來的同志和朋友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表示敬意，並讓我們引用他過去的文章之一，該文寫於1999年，長期臥病以前 [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çois Vercammen），“面對歐盟規章——歐盟國家規章問題的要害”]：<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6] 一些供討論的構想，在安東莞·阿賈伊（Antoine Artous），多明尼克·米茲（Dominique Mezzi）和我本人的2003年的著作（重新發佈與2012年）中提出，該書是“評估另一個歐洲的出現”：<http://www.contretemps.eu/intervent...>

[17] “挑戰歐洲‘勒令’的左翼替代方案”

[18] 塞德里克·杜蘭（Cédric Durand），拉茲米·庫車沿（Razmig Keucheyan）“走向歐洲的專制——因危機而中止民主”：<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9] 參見 CADTM [www.cadtm.org](http://www.cadtm.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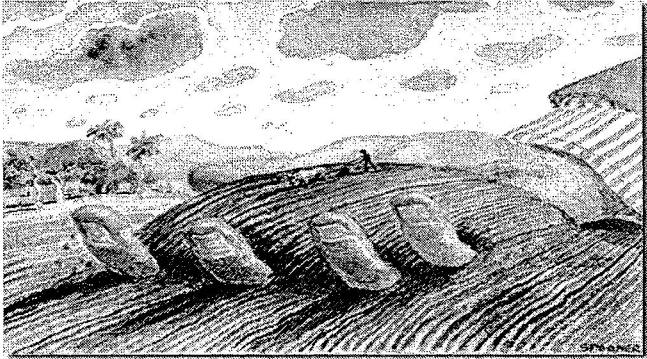
[20] 這一主題，特別參見湯瑪斯·庫特羅特（Thomas Coutrot）和布魯諾·特雷特（Bruno Théret）：<http://www.liberation.fr/monde/2015...> / [l-euro-drachma-ball-and-oxygen-for-grece\\_1221089](http://www.l-euro-drachma-ball-and-oxygen-for-grece_1221089)

[21] 凱薩琳·薩馬利（Catherine Samary）“巴爾幹社會論壇，另一個歐洲的機會，”：<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2] <http://www.politis.fr/Jean-Ziegler-...>

# 掠地和歐盟

## 格奧爾基·梅達羅夫



在過去的幾年，特別是2007-2008年的世界糧食價格危機之後，農地大規模收購的全球擴張，或通常所稱的掠地，引起了很多的關注。從跨國公司及上層個人投資者到政府，是投資者的分佈範圍。

國際非政府組織“GRAIN”（糧食），對於掠地做了有影響的研究，其所建立的一個資料庫，記載了400多例大規模掠地案件，涵蓋60多個國家近3500萬公頃的農田，發生的時間從2006年到2012年[1]。掠地的問題在於，他們並沒有兌現諾言，沒有推動當地社區的發展。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投資並沒有提供就業機會，而是大肆破壞環境。此外，就像2008年至2014年聯合國人類食物權特別報告員奧利維爾·德舒特所斷言的，掠地對全球糧食安全造成破壞性影響。

人們常常錯誤地預先假定，掠地這樣的事情同歐洲無關。但確實有關，一方面是因為歐盟的政策刺激這類投資，而且歐洲公司直接參與其中，一方面是因為歐洲範圍內，特別是在東歐，也在掠地。在最近的一項由歐洲議會農業農村發展委員會（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委託的研究[2]裡，我們發現“顯著的證據表明，在歐盟中搶掠農田正在進行”，在一些東歐成員國中此情形尤甚。例如，同一研究表明，在愛沙尼亞農業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03年至2008年期間漲了五倍。在羅馬尼亞，總部在阿姆斯特丹的進步智囊團‘跨國研究所’（TNI）公佈的2013年征歐洲地研究顯示，約700,000 – 800,000公頃的農田，估計落在大型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跨國公司的手中。

保加利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明歐盟境內的極端掠地情形，4%的農業生產者控制著85%耕地的使用，在文章的末尾我會再次回到這個問題。但瞭解歐盟在这一切事情上的作用，是首要的。

### 歐盟的作用

正如‘跨國研究所’（TNI）的研究所表明的[3]，歐盟是全球搶征土地的主要角色。在該領域最大的投資者中，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總部設在歐洲。例如，2008年和2009年英國的Landkom公司在烏克蘭租賃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土地。此外，歐盟的政策最終會刺激土地的掠奪。2009年通過的可再生能源指導（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要求歐盟內部使用的能源的20%，以及各個成員國的運輸燃料的10%，來自於所謂的“可再生”的來源。這導致農業燃料行業的加強，創造穩定的投資環境，以便有利於如玉米這類可轉換為燃料的現金作物：對全球搶掠土地是一大刺激。同一份TNI報告顯示，其實有一些類似歐盟的政策，如對外投資和貿易政策或其內部的農業政策，積極地促進了掠地的全球擴張。已經有歐盟官員發出了個人的批評聲音。例如，2009年，歐洲援助和發展委員會總幹事斯特凡諾·曼塞爾維西指出，“這是另一種剝削發展中國家的方式……，一個有力的新殖民主義例子。”但歐盟整體政策仍未受到質疑。

歐盟在2001年通過‘進口一切，唯除武器’（EBA）的計畫，旨在促進歐盟從最不發達國家進口一切，除了武器，從而把後者融入全球經濟。然而，在實踐中，它已經促成了掠地行為的發展。例如，在柬埔寨，EBA計畫促進把柬埔寨食糖進口到歐盟的關稅廢除。這項措施本來是要創造就業機會，但在現實中，它刺激了柬埔寨政府推動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以便把農田租賃給大型國際投資者。這導致400戶農家在倫敦高等法院發起對涉事跨國公司的訴訟。[4]

在歐盟成員國的掠地涉及直接的政治暴力時，類似的個別案例會出現。荷蘭銀行公司Rabobank在羅馬尼亞收購超過2.1萬公頃的農田。紮蘭德，一個羅馬尼亞村莊，有超過2500人居住，其所在的區域就是荷蘭巨人的子公司所掠地的地區之一。村民們紛紛指責這些公司搶掠他們的土地而沒有獲得任何正式的同意。村長已由國家反腐敗機構定罪，因為他參與偽造證件以及竊取當地居民的農田。[5]

### 搶掠土地之定義

當涉及直接的政治脅迫時，對土地搶掠的確認當然是比較容易的，如前面所提到的柬埔寨和羅馬尼亞情況。不過，更多的時候，也有更微妙的方式，迫使小農戶和農民社區離開他們的土地，這對掠地程度的理解是關鍵性的，特別是在歐盟內部。

例如，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AP），約占一半的歐盟預算，促進對農業大戶投資者的補貼。因此，它創造不平等的市場激勵機制，激發農業大投資者而邊緣化小型投資者，與歐洲其他土地相關的政策一道，推動歐盟範圍內的農田集中化。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評估掠地的含義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僅僅把其定義縮小於有暴力出現的案例，也不是局限於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專案。

主流媒體通常看問題的視角是狹窄的（側重於政治脅迫和外商投資）。甚至一些主要的非政府組織都採用了這種觀點。然後，狹隘的看法，可能仍然無視這一事實，即如果投資導致就業減少和小農的土地被剝奪，如果其利潤無法讓農田所在的當地社區受益，對於當地社區來說，國家的投資者可能同跨國公司一樣，都是“外來”的。

### 東歐的掠地：保加利亞案例

在保加利亞，一幫全國性農業投資者已經能夠有效地壟斷保加利亞農業，因為他們同國家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利用歐盟種植的補貼，資助大投資者。此外，這些保加利亞的投資者已經非常有效的把他們的業務整合進了國際農業生產市場。

地球之友的保加利亞會員，紮·珍米阿塔（Za Zemiata）上個月出版了對保加利亞土地集中的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研究 [6]，表明在過去的15 - 20年中，農業生產者的數量持續下降。在2003年，有超過650,000名註冊的農業生產者，在2013年，這個人數下降至約25萬。合作農場的數目也一直在下降。2003年至2010年間，他們的人數和他們使用的土地兩者都下降了約50%，但是，與此同時，私人農業投資者在兩方面都有較高的增長水準。

儘管仍然有許多小生產者，但他們的土地非常有限。4%的農業生產者卻控制85%的農田。在畜牧養殖業方面，情況也是相同的，該的行業生產者的1.5%，據有土地的66%。小生產者仍然主導市場，但只是在絕對數量的意義上，而不是在佔據使用土地的意義上。超過80%的農民使用的土地不到2公頃。這個數字使絕大多數保加利亞農民的處境，同他們在歐洲島國馬爾他的大多數同行一樣，80%的馬爾他農民的土地都小於2公頃。

主流媒體和政客們稱讚保加利亞農業部門的增長“令人印象深刻”。無視土地使用的極端集中，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所有保加利亞政府的實際做法都是促進幾個農業大公司作土地整合。目前的農業部長，曾經是一個最有影響力的保加利亞農業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不斷聲稱，政府的最大挑戰是加快土地整合。

在這幅慘澹景象中，為了要以一個積極的音符來結尾，已有東歐的農民，農業工人，以及食品和環保活動分子，開始組織起來，反對這種極度不公正的土地政策。下一屆歐洲尼也勒尼（Nyeleni）食物主權論壇，聯合了在土地和農業政治領域的進步組織，將於今年秋季在羅馬尼亞召開[7]。也許可以希望，這是反對農業方面的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破壞性影響的潛在政治化指南，那個破壞性影響在東歐造成的痛苦有目共睹。

### 註

[1] 參見“GRAIN”。

[2] 參見“歐洲議會”。

[3] 參見TNI

[4] <http://www.dw.com/en/eu-to-blame-fo...>。

[5] <https://euobserver.com/investigatio...>。

[6] 參見紮·珍米阿塔（Za Zemiata）。

[7] 參見YouTube。



# 巴西政變

邁克爾·洛伊

讓我們實話實說。剛剛發生在巴西的事情，即解除當選總統羅塞夫的職務，是一場政變。這個政變是貌似合法的，所謂符合“憲法”的，所謂符合“制度”的，議會制的，是任何你認為的東西，然而都一樣，政變就是政變。

議員 —— 眾議員和參議員 —— 這些人捲入了大規模腐敗（引用的數字是60%），卻制訂了對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的彈劾程式，其藉口是採取會計的違規調整行為，以填補公共帳戶的赤字 —— 而這只是所有以前巴西政府的常規做法！當然，工人黨（PT）的幾位高管都參與了國有公司巴西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的腐敗醜聞，但與迪爾瑪並沒有干係。

事實上，領導這場反對總統運動的右翼代表，是陷入腐敗醜聞最深者，首當其衝的是議會的議長，愛德華多·孔哈（Eduardo Cunha）（最近已停職），他被控貪污，洗錢，巴拿馬逃稅等等。

採取合法政變的做法，似乎是拉美寡頭的新戰略。在洪都拉斯和巴拉圭——新聞媒體經常把這些國家當作“香蕉共和國”——所做的測試，已證明該法可以有效地消除左翼（輕度左翼）總統。現在該法被應用到美洲大陸的國家。

一個人可以對迪爾瑪做很多批評：她沒有信守其競選承諾，對銀行家，實業家和大地主（latifundistas）做了巨大讓步。在去年，政治和社會左翼一直要求進行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改變。但是巴西的神聖寡頭——金融，工業和農業的資本主義精英——並不滿足於更多的讓步：他們想要的是全部權力。他們不再願意進行談判，而是要通過他們信任的人進行直接統治，並取消近年來為數不多的社會成果。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引用黑格爾的話寫道，歷史事件重複上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這話完全適用於巴西。1964年4月的軍事政變是一個悲劇，它使巴西陷入二十多年的軍事獨裁統治，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遭酷刑的代價。2016年5月的議會政變則是一場鬧劇，一個可悲可笑的事件，我們看

到的，是一幫反動腐敗和臭名昭著的議員，推翻了5千4百萬巴西人民選出來的總統，採用的理由是“會計違規”。這個右派政黨聯盟的主要成分，是一種稱為“三個B”的議會集團：“Bullets 子彈”（成員是軍事員警，敢死隊和其他私人民兵）- “Beef 牛肉”（大地主養的牛）- 與“Bible 聖經”（即新原教旨主義的靈恩派 Pentecostals，厭惡同性戀者和厭惡女人者）。在最熱心彈劾迪爾瑪的支持者中，有加羅·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他的投票獻給軍事獨裁的軍官們，特別是科龍納爾·雍斯特拉（Colonel Unstra），一個著名的虐待狂。迪爾瑪·羅塞夫是雍斯特拉的受害者之一，當時（在70年代初）她是一個武裝抵抗組織的成員，還有我的朋友，記者和革命者，路易士·愛德華·梅林奧（Luis Eduardo Merlino），他在1971年21歲時死於酷刑。

新總統蜜雪兒·特梅爾，通過他助手的引導，親自參與了一些事情，但至今未受任何審查。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巴西人被問及是否會投票贊成特梅爾當總統：只有2%的人投贊同票。

1964年，大示威“與上帝同在和自由之家”作了充分準備，發動了反對總統若昂·古拉特的政變；這次，新的“愛國”群眾受到媒體的煽動，動員起來，要求推翻迪爾瑪，在某些情況下，召回軍方政權。這些族群主要由來自中產階級的白人（多數的巴西人是黑色或混色者）組成，受到媒體的作用，堅信這是“反腐敗鬥爭”。

1964年悲劇和2016鬧劇的共同特點，是對民主的仇恨。這兩幕劇揭示著巴西統治階級對民主和民意的深刻蔑視。會同洪都拉斯和巴拉圭一樣，“合法”的政變將以最小的麻煩前行嗎？這並不是很確定的——大眾階級，社會運動和反叛青年都還沒有說過其最後一句話呢。

[邁克爾·洛伊，巴西出生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是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和第四國際的成員。阿姆斯特丹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研究員和法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CNRS）的前研究主管。]

# 危機中的俄羅斯：石油帝國的痛苦

伊利亞·布德雷茨基斯



每個人都明白，未來的一年俄羅斯會沉浸在一場經濟危機中，這幾乎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一場社會政治危機。一年多以前，普京在他最喜歡參加的電視節目“與人民直接對話”中，向觀眾保證，說這場危機是暫時的，困難問題將在一兩年內成功地得以克服。這些斷言不僅僅是一個宣傳伎倆，而且是俄羅斯統治精英意識裡的根深蒂固因素的體現，當他們從戰略轉向戰術，應對出現的挑戰時，習慣如此做法。這種意識，是油價連續上升的十年期間，整個國內經濟緊緊依賴自然資源出口的結果。

石油銷售的暴利，造成了這樣的感覺，即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肌肉過去一直得到加強，而且保證了政府支出的不斷上升。軍隊，官僚機構和政府的黑箱採購系統因此獲得了大量利益。然而，社會領域上開支的增加，只不過是殘羹剩飯而已，教育和醫藥則一直被視為缺錢時的第一犧牲品。

石油繁榮的年代，培養發展了一個醜陋的社會模式，基於投機的能源資源價格的通脹補償了生產的下降，造成了一個驚人水準的社會不平

等，腐敗和日益系統化的獨裁政權，保護著精英的利益。普京的聲望依賴於（就目前而言，仍然依賴於）這個不確定的基礎。這聲望的關鍵，就是許多人認為的，是他的堅忍無情，普京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能夠保證“穩定”，保護國家經濟增長的持久軌跡，避開任何動盪的風險。

在此，對於廣大俄羅斯的居民，最有價值的領悟，是知道了“普京式穩定”現在肯定是已經過去的事情，還有，俄羅斯精英並沒有挽救局勢的備案。截至去年，已經很清楚，政府的反危機做法變為地方的各種緊縮措施，其無情程度，甚至勝過歐盟各國政府的當前做法。它包括大幅削減社會支出，強迫養老金改革（擬議增加退休年齡至65歲），原則上拒絕將工資與通脹（去年12.9%）的速度掛鉤，提高向人民徵收的稅費。對於盧布的削弱，通過引入市場的貨幣儲備以及增加中央銀行的利率，以進行抑制，使得小中小型企業無法獲得貸款，從而進一步促使經濟的崩潰。

2016年的國家預算，依照這一危機，是基於設定石油價格平均為每桶50美元而計算出來的，但它已經跌破30美元。儘管政府尚未公開考慮修改它，但財政部已建議所有其他部門減少10%的開支。

這種情況，由於莫斯科和地區之間的稅收分配的現行制度而惡化，這種制度將所有稅收歸為聯邦預算的一部分，然後才算入地方預算。其結果是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因為地方當局必須在人民面前承擔這些“緊縮措施”的責任。與此同時，為了努力保持自己的人氣，總統公開要求他們顯示“社會責任”，把他們置於一個不可能的情勢裡。

政府收入的急劇下降，暴露了普京“垂直權力”的脆弱性，即，地方政權對中央的完全政治依賴與其經濟的“自治”（即履行預算責任的職責）相結合。因為緊縮政策而發生的政治損失，必須由德米特裡·梅德韋傑夫為首的聯邦政府或地方長官來負責，可以讓任何人承擔責任，唯獨總統除外，在任何情況下，他的支援度都不應該因為其支持者生活品質的下降而遭受損害。

在大多數人眼中，普京作為“民族領袖”這個形象，是當權者合法性的主要依據。局勢的諷刺意味在於，人們相信他們的總統，但不相信他所代表的政府。在這些災難性的條件下，普京政治機器為議會選舉做準備，選舉安排在2016年9月。像所有以往的選舉一樣，它們必須符合克里姆林宮所寫的腳本。目前，似乎要讓“統一俄羅斯黨”為議會多數，而讓梅德韋傑夫作為日益不滿情緒的代罪羊。“獨立”候選人，還有持續反對黨（包括共產黨和日里諾夫斯基的黨）會抨擊政府反社會的緊縮措施，但總統仍將不在批評的範圍內。

這一指導腳本可能失控，並引發一波公共躁動（如在2011年12月前議會選舉後發生的情況）。今天，主要的區別可能變成的是一個結合，一個針對反民主制度的政治抗議和針對貧困及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抗議的結合。2015年出現了地區抗議活動的嚴重上揚，所涉及的，是薪金的延遲支付，裁員和不必要的新增稅。12月，卡車司機對超高的新過路費極為憤慨，在近一半的全國各地區舉行了示威。在一些城市，有抗議行動，反對加在國家醫療保障上的嚴格限制。總體上，專家估計，在過去的一年已經有409抗議，關係到對工人權利的侵犯（其中168起採取了停工的形式）。這比2008-2013年期間的平均值高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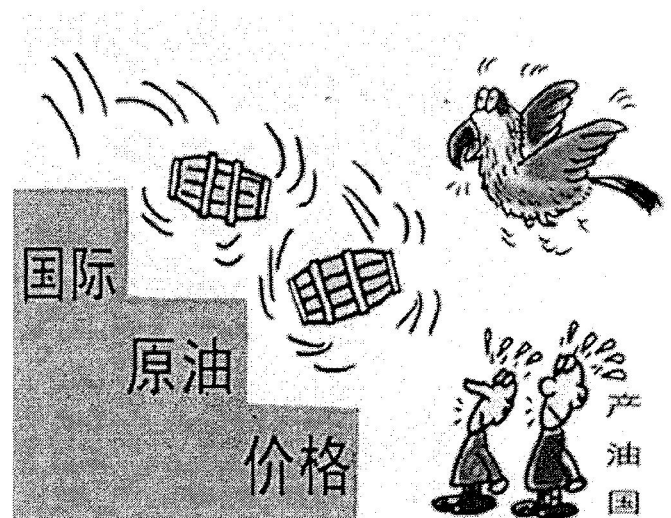
經濟危機以及常規政治週期（2016年議會選舉和2018年總統選舉），難免會招來並強化精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英內部的分裂。已經可以依稀看到可能的戰線：莫斯科和地區勢力之間；政府財政專家和軍隊說客之間，因為軍方會堅持面對“外部威脅”要增加國防預算，還有國有企業之間，這些企業要求從國家預算中獲得所有的新補貼以便資助其巨額債務。

為努力保持現有勢力的平衡，當局必須重新審視過去兩年的外交政策，包括仍在烏克蘭進行的戰爭，同西方的衝突以及在敘利亞的軍事捲入。為了去除美國和歐盟的制裁，莫斯科已經做出了積極的行動。自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那一刻以來，這是首次就頓巴斯的命運，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和俄羅斯代表席格雷茲洛夫（普京的內部“朋友”圈成員）在基輔開始直接談判。接著這次會議後，克里姆林宮烏克蘭事務的主要“推動者”和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努蘭進行了一個小時之久的協商。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於俄羅斯政府，取消制裁獲得大規模的外國貸款，增加已經枯竭的國家財政資源，是必要的。對石油價格的依賴，可能很快被另一個依賴完全取代，這次依賴的是國際債權人。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俄羅斯處在嚴重變化的關口，簡而言之，顯示“普京主義”作為一個制度的結束——至少，就像我們在這些“虛胖”年代裡所認識到的那樣。





# 科雷亞的總統任期帶給左派的教訓

派翠克·圭洛達、皮埃爾·牟特德



2016年4月16日發生在厄瓜多爾太平洋海岸的地震造成了一些沉重的傷痕，不只涉及人員損失（近700人死亡，6000人受傷和30,000人受到影響）或物質損失（重建需要30億至40億美元），而且涉及到社會和政治方面。這次地震對國家管理的巨大影響，讓我們可以理解拉斐爾·科雷亞總統政府目前政策裡的緊張和矛盾。

因此，即使政府能夠迅速動員起來，為受影響的人們提供急救和援助，它仍然有義務實施一系列稅收措施，加強業已執行的應對危機影響的措施，導致這場危機的原因是油價下跌[1]，預計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會超過4%。這些措施包括提高增值稅，從12%增至14%，即每月收入超過1000元者，扣除一天的工資（收入超過2000和3,000美元者，扣除2天和3天的工資，等等），還有，對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人加征0.9%的稅。更不用提的是，為了獲得新的信貸額度而要開啟與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其進展微乎其微，還有，可能要出售公共資產。

採取的這些措施，有其深刻的經濟衰退背景，在這些措施的實際範圍之外，許多批評者指出，它們幾乎沒有影響到最富有者以及大公司[2]，負擔主要加在中間消費者的身上，因為對新自由主義措施開門，造成中長期後果，例如背負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國有資產的出售。在這些決定中，沒有什麼是真正原創性的，其效用可疑，這與拉斐爾·科雷亞在其第一任期內熱情宣佈的“公民革命”的最初願望形成強烈對比[參見“制憲”公投後，“贊同”陣營獲得勝利，科雷亞在2008年9月28日的講話：“今天厄瓜多爾已經決定成為一個新的國家。舊的結構遭受挫敗。它肯定了公民革命。”]。

## 科雷亞是如何獲得政權的？

為了瞭解科雷亞厄瓜多爾發生的情況，瞭解所發生的社會經濟變化的性質，以及左派所發揮或仍然發揮的作用，我們的眼光必須遠超在極其緊急情況下採取的這幾個措施。我們必須審查這個國家的歷史，並評估從1990年代以來使安第斯國家發生深刻變化的巨大經濟、社會和政治動盪。正是在這個時候，該國的土著人民組織——‘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合會’（CONAIE）——驟然出現在社會政治舞臺。與城市社會運動（CMS）協會聯盟，並於1996年聯合了一個政治力量，新國家帕恰庫蒂克運動（Pachakutik Nuevo Pais）[3]。因此，他採取了一條與胡戈·查韋斯和埃沃·莫拉萊斯路線平行的路線，並作為最進步國家陣營的一員出現在拉丁美洲。但是，儘管如此，他的基本計畫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而不是真正朝向左翼計畫的一個政治社會轉型。尤其是，他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民眾和土著運動的選舉支持，他自己的‘國家聯盟’（Alianza Pais）賴以形成的政治基礎，並沒有與左翼計畫有機地聯繫在一起，而是置於其外，有時直接反對其一些最活躍行業的要求和願望。從越來越多採用的經濟模式，從詆毀者或捍衛者加諸其上的多不嚴格的矛盾標籤（民粹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些基本歧義。

## “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

應該認識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在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後，科雷亞政府見證了該國真正的經濟復蘇，因高油價而大量流入的外匯被用以建設道路和大規模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機場，電車，地鐵等）。此外，特別是在科雷亞第二任期內，“改變生產環境”的經濟計畫，無疑刺激了該國大多數經濟行業，特別是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的生產。推進能源自主（通過建設水力發電大壩），同時通過推進合作，尋求私營和公共部門之間的原創第三條路。

但同委內瑞拉一樣，合作行業發現自己與傳統的資本主義行業在做直接競爭，導致一個矛盾的結果：雖然公共投資從2007年不斷增長，甚至在2013年和2014年超過私人投資，但私有行業在關鍵的經濟領域，如電信，超市，汽車，飲料等的集中投資卻持續增加。此外，大公司的收入占GDP的份額日益顯著，2011年100最大公司的GDP份額達57.74%，2014年則達到71.36%[4]。

這種現象在農業中尤其明顯，儘管小型畜牧生產得到官方支持，但是因為追求出口農業的發展（例如花卉和西蘭花生產），有利於大規模的對環境不良的單一種植（例如，過度使用水，化學製品等），促使這些行業的工作條件處在中世紀水準，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婦女，她們每天工作（而且是非法的），不會有社會保障或受工會的保護 [5]。

如果石油價格沒有崩潰，在一段時間內，這種類型的發展可能給人以成功的幻覺，可是石油價格的崩潰，導致2016年經濟增長預計將縮水，而2015年的增長是0.4%（但人均下降1.1%），但是2011年以來則增長 7.9%[6]。布倫特原油（占世界石油交易量的2/3）價格從2011年2月的每桶110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平均每桶50美元，然後是2016年1月的30.69美元和2016年3月的38.32美元。對厄瓜多爾顯然有不可避免的後果 [7]；政府收入削減，額外活動加快，特別是像鐵一類的礦產初級品的開發加快。 [8]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 不挑戰資本主義！

事實上，這種國家推動的經濟發展，決不會挑戰厄瓜多爾社會的不平等及資本主義本質。同美洲大陸的其他地區進行比較，看看厄瓜多爾弱勢階層的生活條件的變化，是有用的。國家統計和人口普查局（INEC）的統計數字顯示，貧困率從2008年的35.09%到2014年的22.49%有顯著的下降，到2015年再次上升至23.28%，但城市和農村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2015年的貧困率分別為15.7%和39.3%。

然而，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比較，並不會讓我們清楚地說明，這種失敗僅僅是由於政府的社會政策所致。在2000-2014年期間，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對於新自由主義政府和進步政府，情況都是一樣的。此外，拉美經委會在其‘2013年拉丁美洲社會全貌’中，明確指出，貧困的這種下降，影響到所有國家[9]。

在20世紀80年代的黑暗歲月之後，到20世紀90年代，程度有所緩和，在生活水準的驚人下降以及不平等性的大規模增長之後，社會資料的重新平衡是完全“正常的”，特別是在恢復增長的背景下。所謂的進步政權，如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之間的顯著區別，在於使用石油或天然氣租金。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委內瑞拉，它被用來制定社會政策，特別是衛生和教育領域的政策。

但基本上這些援助政策不會違背制度的資本主義邏輯。它們不僅在不改變其基本結構的情況下對現有制度體系進行投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原材料價格，最重要的是，它們依賴於政府的社會政策。它們根本不解決就業問題，這個問題仍然由私人雇主包辦，在較小程度上靠政府。

關於厄瓜多爾的可支配性平均收入，INEC指出，在2000年至2015年期間，“生產部門資本家”的收入增加了6倍，而“工薪生產工人”的收入增加了4倍，“採礦業公司中的工人”收入只增加了3倍。因此，關於財富分配的趨勢並沒有真正

的逆轉。至於社會不平等，世界銀行說，自2006年以來，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由於貧窮的嚴重下降而經歷了不平等的下降。最不平等的國家仍然是中美洲國家，但也有由工人黨（PT）統治的巴西，還有哥倫比亞。在安第斯區，按照這一時期不平等的減少來計算，秘魯和厄瓜多爾是平等的。

最後，還有一個重大現象需要注意：存在大量外債，表明拉丁美洲經濟體對北方巨大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在厄瓜多爾，公共債務從2009年的102350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27520億美元。然而，從2007年開始，科雷亞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聯盟發生衝突。他成功地重啟債務談判，並只須歸還以總額款的四分之一。因此，厄瓜多爾中央銀行（BCE）表明，如果2009年用於債務（折舊和利息）的款項為38.7億美元（其中0.35是利息），那麼2010年只有9.5億元。2015年，再次上升到31.6億美元，其中10.7億是利息。由於石油危機，銀行資源枯竭，厄瓜多爾不再能獲得國際銀行的貸款，只有中國願貸款給它，利率比平均值高2~3倍[10]。然而，警覺到該國局勢的脆弱性，在2016年4月16日的地震發生一周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現在啟動與厄瓜多爾就一項貸款進行談判。

## 新依賴

在2006年科雷亞第一次勝利之後的十年，在公民革命理想中強烈地體現出來的期待改變的願望還剩多少呢？不可否認，有一套相當重要的社會措施，一個加強公共服務的網路，特別是在司法、衛生和教育方面[11]。例如，在2013-2017年預算方案中，相當於11.6億歐元將用於創建新的大學。但該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包括經濟依賴機制，並沒有根本改變。私人銀行業的利潤大幅增長，而工業和農業繼續集中起來，為少數大公司謀利益。厄瓜多爾（Guayaquil）資產階級，在小一些的程度，首都基多（Quito）繼續掌握國家的大部分經濟杠杆。如果第一資源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取得者，石油部門，不可否認地下降，特別是自2014/2015以來，政府已做了一切，代之以原材料開採，把亞馬孫古陸的石油特許經營作最大範圍的領土延伸，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環境破壞。

政府的資源開採政策並未質疑外國跨國公司的作用。它滿足於自己 --- 當然，不可忽略 --- 要求比過去更高的特許權使用費，但是讓他們在這個區域自由地開採資源，允許他們繞過生活在這片令人垂涎之土地上的人民（通常是土著人民）的固有權利，這要歸功於採用“憲法”中一個“國家的更高利益”的條款。而這個憲法，業已明載要更好地保護厄瓜多爾土著民族的權利。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跨國公司毫不猶豫地污染環境，持久地以最低成本採取珍貴的礦物。尤其是在厄瓜多爾南部採取鐵礦，大量地使用氰化物並將其排放到水供應源，或在地下水層中擴散。這種開採模式大體上類似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做法。主要區別在於給地方政府的補償金額，這比以前更高。但基本面仍然相同：剝奪祖傳的土地，系統性污染，疏散常住人口，讓外國公司發財，生態系統的持續退化，更不用說加諸於勞動力的惡劣工作條件。

因此，依賴關係具有雙重性：依賴與原材料價格有關的國際投機活動，因為厄瓜多爾無法控制原材料的價格，而它急需經常性收入來購買必需品；此外還要依賴強大的外國公司對所謂的國家底層土地徵用的管理 [參見西方國家的例證，根據其與厄瓜多爾國家簽訂的合同條款，西方國家不能出售其特許權給協力廠商（加拿大）公司。然而，在帕拉西奧斯總統時（2005-2006年），它這樣做卻完全不受懲罰，得到了世界銀行仲裁法院的全力支持，後者的仲裁有利於它。厄瓜多爾國家因此必須向西方國家支付15億美元的罰款。]

除了這種雙重依賴的後果之外，還有一組典當經紀人的問題，這些人的上頭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他們準備當局面變得不利時，騎劫這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目前遭受2014/2015



以來的暴烈經濟收縮。歐洲聯盟正在準備與厄瓜多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作為與哥倫比亞和秘魯簽約的一個附件，其中某些條款將允許歐洲跨國公司在極其有利的條件下投資該國，並迫使該國把其公眾服務開放給市場。

因此，科雷亞的厄瓜多爾沒有經歷真正的結構性變化。當然，公共投資（特別是運輸和教育的基礎設施）的增加以及跨國公司要求開採底土須付的特許權使用費，可以暫時減少對該制度不滿的部分最危險原因。然而，它們不能改變其性質，也不能打擊使厄瓜多爾受害的最悲慘形式的依賴。此外，這一說法大體上得到了科雷亞本人的證實。“積累的模式，我們還沒有能夠大幅度改變它。在積累模式改變之前，我們用相同的積累模式，改良事情。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不傷害富人，而是創造一個比較公正和公平的社會”[12]。很明顯，我們所擁有的既不是激進的社會變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而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中的“後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多，也不少！在2016年5月3日，為處理地震的災難性影響，科雷亞發表了關於公共資產私有化列表的聲明：“我們必須將這種財富改變為流動的”，這不就是解釋嗎？

## 緊張的社會局勢

自從2013年2月17日，科雷亞上次連任總統以來，反對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變得更加廣泛。政府“偏向開採”的取向加劇了土著居民同安置於其領土上的跨國公司的鬥爭。也許有幾個土著領導人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政府的政策（卡洛斯·維特利[Carlos Viteri]，李嘉圖·烏爾倉度[Ricardo Ulcuango]等），但對於那些直接面臨礦業開採的村莊居民，情形不同，他們處於同政府的公開衝突中。一個典型的案例出現在2014年9月，是印塔各（Intag）地區圍繞利古裡亞瓜（Llurimagua）銅礦開採項目的暴力對抗。抗議者反對把一部分谷地讓給智利公司Codelco，阻礙後者進入谷地，導致政府派軍隊佔領該地，然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後逮捕土著活動家。

在社會的其他層面，問題是勞動的監管正使得不滿在凝聚。自2012年以來，工廠受訓人員的工資劃分為三，以及讓公司在遇到困難時減少工作時間同時降低工資的可能性，把FUT工會聯合會動員了起來。更何況，因為接著這最初的改革之後還有其它幾個，尤其是2015年的勞動彈性制的推廣[13]，由國家支付的那部分養老金壓縮40%，以及工會權利和罷工權的限制。

2015年8月，幾個工會，土著和學生組織制定了一個13點要求平臺；科雷亞拒絕討論它們，理由是它們是局部的利益要求。然而，這些要求包括土地改革，包括一條保護水免於私有化和被跨國公司佔有的法律，還要求拒絕增加公共交通運輸價格等。運動是強烈的，像2015年8月13日的遊行，引來近10萬人走在基多的街道上。全國都有罷工和示威，持續一個多星期。

儘管有政府的鎮壓，特別是通過2013年12月4日的第16號法令，將佔領工作場所和道路封鎖這一類行為定為刑事罪。發生於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這種破裂，是政治轉向的結果，自2012年年底以來，這個轉向加劇，轉向不惜代價地實現經濟增長，將“公民革命”蛻變為僅對議會機構的強制效忠，其所根據的，就是我們在西方國家發現的議會民主模式。



## 左派的碎片化

在這種對比鮮明的盤算之前，厄瓜多爾左派最初支持“公民革命”社會變革的願望，現在一點一點地同後者疏遠和分手。阿爾伯托·阿科斯塔的例子就是明證。他是制憲議會的主席和祖國聯盟（Alianza Pais）內部的一個左派領導人：2008年，他辭職了，因為關於制憲大會的任期，他同科雷亞的意見不同，隨後他試圖著手新左派勢力的另一個真正重組。但是到現在為止，尚無多大的成功，他仍然相當孤立，至少在選舉方面[14]。

土著運動和工會及城市運動的重要部門也是如此，他們很快面臨著科雷亞從政風格的限制和禁令，特別是在他的第二任期。這是“公民革命”的另一個問題層面，即其有關更具侵入性控制的社會運動的發展，通過創建親政府的社會組織來同現存組織（例如2014年11月創建的工人聯合會[CUT]）競爭，或直接在最貧困階層中間發展庇護關係[15]。

因此，厄瓜多爾現在展現了一個奇怪的政治全景，其中並未出現任何清楚的東西。右派正在恢復其力量，考慮為2017年總統選舉推出統一候選人的可能性，比如瓜亞基爾銀行家吉列爾莫·拉索，祖國聯盟（Alianza Pais）仍然在尋找一個激情候選人，因為法院已經裁定科雷亞不能再參選（他只能到2022年再參選）[16]。兩名候選人似乎已準備好了：列寧·莫雷諾（Lenin Moreno），2009年至2013年的前副總統，他發出的語調較為一致，還有喬治·格拉茨（Jorge Glatz，現任副總統），他更多地與瓜亞基爾商界有聯繫，雖然目前難以辨別誰的機會更高。

對於非政府的反對派左翼，還沒有什麼明確決定，即便“翻轉世界-新建國運動”（Pachakutik Nuevo Pais）剛剛任命了一個更左翼的新組織者（Marion Santi），而恩裡克·阿亞拉·摩拉（Enrique Ayala Mora），前安德列·西蒙·玻利瓦爾省大學校長的名字，和前將軍和基多前市長帕多·蒙托亞（Paco Montoya）的名字，是最經常領先者，

被認為可能比在2013年的阿爾韋托·阿科斯塔（Alberto Acosta）做得更好。

然而，一切都還不確定，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即左派力量仍然陷於深刻的分裂和碎片化。有些人 --- 因為受到更激進右翼進攻的刺激 --- 激烈地捍衛政府的成果，沒有任何保留，也無任何名副其實的批評。其他人 --- 與政府在這點或那點上有分歧 --- 傾向於“妖魔化”其管理，反動地和不分青紅皂白地說明他們無法提供具體和建設性的改革建議，更沒有長期替代性的思維[因此，科雷亞政府試圖通過新聞和媒體法，他們指責大媒體的壟斷，左翼被動地強烈反對，但沒有努力去把積極面表露出來和修改較有問題的條款。]。

## 左派的教訓？

面對來自傲慢而仇恨右派的全面進攻，特別是在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巴西，那麼厄瓜多爾左派，更廣泛地，還有拉丁美洲的左翼，應該得到什麼教訓？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記得其背景，就像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省革命和玻利維亞的土著革命，厄瓜多爾的“公民革命”開始於過去十年的中期，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希望。因此，就政治經驗（在柏林牆倒塌之後）而論，這相當於有希望取得社會變革的集體和創新經驗，這些變革能夠超越過去的所謂社會主義經驗，結束拉丁美洲所遵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壞性影響，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厄瓜多爾導致了真正的體制危機。因此，這是對土著條件或參與性管理的經驗及其必要的民主要求的新關注。所以，在承擔新權利（包括對於自然的權利）和產生一個社會契約的組成過程中，這種不可否認的利益可以得到完全的延續。所以，最終，隨著民眾的動員和不可預見的選舉或重選，這些經驗中的每一個實際採取的是意想不到的道路，在新自由主義占上風的時代，提供希望和不可否認的政治更新的跡象。

儘管如此，厄瓜多爾的公民革命 --- 像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的其他社會變革進程一樣 --- 在某些基本問題上陷入僵局，這些問題構成了左翼的歷史遺產。這其中，要考慮到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核心問題，及其隱含的佔有類型和它們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衝突[17]。如果我們站在左翼，當然必須考慮到處在持久變革的歷史中出現的新現實，如果這意味著關注力量的新關係，並參與新的和動態的社會運動（女權主義，生態，土著等等）激起的鬥爭，那麼我們不能忘記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決定性份量，這些關係繼續存在，並以奇怪的方式重塑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和傳自過去的統治（殖民主義，宗法制度等等）。

然而，忘記它們，是拉丁美洲政府左派一旦權力在手就要做的事，把這些難以和解的問題淪為無關緊要的小事，並最終進入最傳統的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死胡同。這不就是科雷亞的厄瓜多爾的現況嗎？這不就是左派 --- 當它喚起“迴圈的結束”或“社會經濟發展專案的耗盡”時 --- 正在思考的嗎？

## 註

[1]現有的計畫，包括增加香煙，酒精，甜碳酸飲料，以及固定電話和行動電話的稅收

[2]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從2006年以來推出的大型工程中獲益的人。

[3]從字面上看，“回到美好時光，新的國家。”，他們從事大規模的鬥爭，反對結構調整和美元化的政策，還要求承認他們作為土著人民或民族，是具有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利的行動者。

對於一個40%人口為土著人的小國，這是一種社會和政治地震，這反映在七次大規模起義（1990,1992,1994,1997,1998,2000,2001）中，兩次成功推翻政府的嘗試（1997年2月推翻阿夫達拉·布卡拉姆（Abdala Bucaram）和2000年1月推翻加米爾·馬瓦德（Jamil Mahuad）），以及盧西奧·古鐵雷斯總統（2003-2005）政府的悲慘結局，似乎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是對這種願望確認的最高點。這個政府不是兌現其在結構改革方案中對土著盟者的承諾，而是殘忍地與華盛頓結盟，玩弄政治伎倆，極為不受歡迎，以至於它的許多對手組成的聯盟迫使他在24個月的混亂後辭職。

然後，在持續的制度危機背景下，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 左翼和中左政黨祖國聯盟（Alianza Pais）的總統候選人 --- 在土著人民的支持下，參加競選，得了56.8%的選票，戰勝了香蕉巨頭，代表右翼的候選人，阿爾弗熱多·諾寶（Alfredo Noboa）。然而，從那時起，我們可以注意到，困擾祖國聯盟（Alianza Pais）項目的模糊性，在科雷亞總統（2006-2013年和2013-2017年）的兩個任期內，越來越明顯。首先，如果自從1990年代它們就被放在厄瓜多爾巨大變革的願景中，這不僅導致起義的態度，還質疑 --- 以土著概念的“美好生活”和左翼平等主義理想的名義 --- 新自由主義秩序以及繼續影響厄瓜多爾社會的殖民，資本主義和父權的社會關係。

拉斐爾·科雷亞將自己定義為一個人道主義者和一個左派基督徒，是區域一體化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同時反對美元化，非法債務和與美國的自由貿易條約。此外，他希望建立一個“公民革命”，幫助該國最被剝奪的階層，建立一個選民大會來加強集體權利（包括自然的集體權利）和國家的多民族性質（2008年）[超越某些具體的局限，但是不可否認，這一新的憲法代表基本權利的進步。] 問題在於是否有政治意願以便具體運用這些原則。

[4]阿爾貝托·阿科斯塔根據厄瓜多爾中央銀行（BCE）和Superintendencia公司的成果所收集的資料

[5]關於這個，參見弗朗索瓦·候塔德（François Houtart）有關兩個厄瓜多爾公司（Brownville Investment和Corola NV）的縝密偵查，科雷亞政府把它們作為“新的生產佈陣”模式展現出來，分別專業于西蘭花生產，以及把其加工出口到美國，歐洲，日本和以色列。所提



及的國家已經自己生產西蘭花，兩個厄瓜多爾公司的總部位於巴拿馬和荷屬安替列斯。

[6]來自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經濟委員會（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的經濟資料。

[7]在厄瓜多爾提取的油被認為是低品質的，價格跌至每桶14美元。

[8]在2015年12月9日接受世界報的採訪時，科雷亞明確表示：“我們已經明確表示，我們將使用到的最後一滴石油，以便更迅速地脫離貧窮”。

[9]這句話適用於其他統計來源，像美洲開發銀行。失業率的下降也是如此。

[10]中國已經成為厄瓜多爾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但不是按你想像的方式。因此，中國購買了60%的厄瓜多爾石油，但這並不到達中國 --- 一旦購買，石油被轉售給厄瓜多爾離岸公司，條件是對後者非常有利（2%的特許權使用費加5美元/桶），然後再賣給美國石油公司。通過這種銷售獲得的美元，被中國用來買伊朗石油，這比把石油從厄瓜多爾運往中國便宜得多。

[11]公共教育系統的參與提高到80%，而私有制教育則下降到20%。教育投資增加了三倍。小學註冊率已增至97%。在中等教育中，註冊率從2006年的40%上升到今天的65%。即使三分之一的人口無法接受中等教育，而且土著和非裔厄瓜多爾人民存在顯著差異，但總體來看，有了良好的改善。

[12] 電訊報，2012年1月15日。

[13] 前勞動部長法蘭西斯科·巴卡斯2016年2月21日接受商報記者採訪時說過，“靈活性使企業得以雇人”。一個熟悉的論據。

[14] 2013年阿科斯塔同拉斐爾·科雷亞競選總統，其立場顯然位於左翼，強調強大的生態問題。然而，他只得到了3%的選票。

[15]特別是2015年8月的總罷工期間，大示威遭到科雷亞政府的嚴重鎮壓。但在2015年12

月18日，也有土著領導人卡洛斯·佩雷斯·瓜特本爾被逮捕，以及在當局不續他的同伴曼努艾拉·皮克的簽證後，她被驅逐出境。另見2013年12月“大地之母基金會（Fundacion Pachamama）”的關閉，該組織專門捍衛土著人民，以及2014年底威脅通過單方面撤銷1991年訂立的使用合同貸款將CONAIE從其歷史總部驅逐出境，此事遭到450名拉美裔知識份子的公開反對。

[16]他剛剛正式宣佈，他將不會成為候選人，即使大家的“拉斐爾仍與你同在”，玩弄地震之後飆升的民族團結願望，在爭取改變憲法法院的最後判決，從而允許他參選。

[17]在這方面參見奧拉西奧·岡薩雷斯2015年12月9日的題為“國家和花園”的文章，第12頁，提供了明智的歷史概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批評，是在這麼多的激情中，如此多的動員，這麼多的熱情在街道上表達，甚至沒有觸及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銀行的利益，它仍在正常運作。如此多的路障，卻沒有徵收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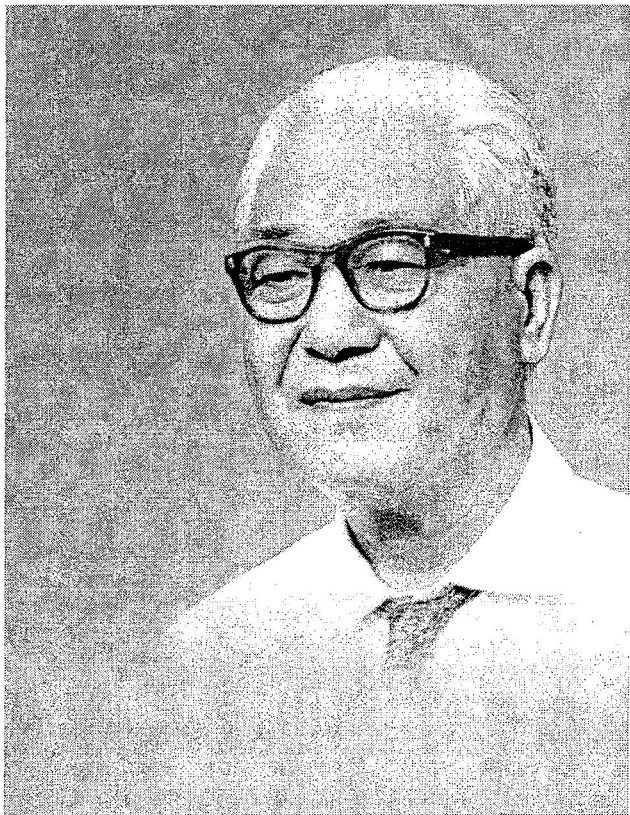
## 作者簡介：

派翠克·圭洛達（Patrick Guillaudat），是拉丁美洲專家，在2016年夏天從厄瓜多爾回來

皮埃爾·牟特德（Pierre Mouterde）是一位社會學家。他出版了“智利的社會運動 Les mouvements sociaux au Chili（1973-1993）”（與派翠克·圭洛達合著），巴黎，L'Harmattan，1995年，和“危機中的左派，明日的反對戰略 La gauche en temps de crise, Contre-stratégies pour demain”，蒙特利爾，Liber，2011年。他是博客“轉向左翼 Presse-toi à gauche”的合作者。

## 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二）

（訪問者：鄭致祥）



### （八）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

這是我親身經歷，也感覺很深刻的。人們對革命的熱心冷下來了。由此可以知道後來蘇聯的官僚主義為什麼抬頭，托洛茨基那個反對派為什麼支持的人不多。因為對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開始的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是由《真理報》一篇文章引發的。

在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見，尤其是關於工業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問題、工業與農業的問題。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間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開始，就爆發出來，非常的激烈。因為我同時是蘇共黨員，那時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國共產黨黨員的資格，同時是中國支

部的負責人，所以我有權責去參加各種爭論會。那時俄國還沒有像後來那樣，黨內提出的不同意見還是可以討論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見，關於工業問題、農業問題，有一些是關於黨的民主問題，尤其是後一問題，爭論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場合簡直打起上來。在那時候、那種情形，我的感覺是為什麼會這樣子？我們還不完全瞭解內幕，就我個人說，因為有許多事情，從前都是掩藏，不讓一般黨員知道的，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所以，我們就感覺到這種情形，俄國人不同，尤其是年輕的人更激動。那時我們感覺到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關於老人的，所謂保守派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對托洛茨基的一種崇拜，我們從中國到莫斯科的，腦海只認識列寧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們的，到了俄國就更是如此。無論什麼地方，掛的照片都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後來我們知道他們的意見，知道他們在革命中的貢獻，當然對他們有更深刻的認識了。所以，對托洛茨基、列寧是一樣的，對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會上，對他認識不深。尤其是我聽他的演說，都要打瞌睡的。聽托洛茨基演說就興奮得很。這是年青人的一種印象。

對於他們的鬥爭，我們覺得斯大林不對，但是還不能夠辨別。很難，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這些老人都是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幹革命，崇老，所以我們對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時看到年輕人很活躍，精神很好。所以，這個問題，年青人就很難瞭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線》，我也看了。他說，老的人會墮落，在那時候看，很難懂。當然後來懂了。那時候，我們對這些，也沒有擬好一個綱領。別人也不能幫助我們。我覺得這種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為什麼會這樣？關

於托洛茨基的意見，關於農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過老的人要腐化，變成反動，這對我是個新鮮問題。不能夠瞭解和太難瞭解。當然，現在瞭解了。

1924年1月列寧逝世，這對俄國是很大一個衝擊。因為列寧的死，這個反對派的爭論就停止了。從那時候，斯大林對付托洛茨基的各種各樣壓迫手段開始了，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第五次代表大會，1924年6月到7月召開，托洛茨基沒在大會上演說，沒有說話。大會上討論最激烈的問題是德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跟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會上並不公開說，所以與會代表不能瞭解這個問題。因斯大林一個人演說，托洛茨基沒有演說，就可以看出，我們已經感覺到托洛茨基受壓迫。討論德國問題最重要的是路特·費舍爾，一個女的，那是他們所謂的左派。就我看來，當時我們感覺到的，他們這幫人支持斯大林。因為布蘭德萊總書記也被撤，當作一個代罪羔羊。所以這次會議沒有把德國1923年失敗的責任弄清楚。就是斯大林一貫的做法，他失敗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個失敗的教訓。

至於中國問題、東方問題，我感覺到他們不願意講。東方的委員會由布哈林率領，我們有中國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釗、彭述之等。我對這次大會沒有感覺得到什麼東西。不過那時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國工作。

現在要談一般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從托洛茨基主義開始到現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政治主張。

### （九）回國組織左派反對派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主要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少數的人像陳獨秀和我覺得這失敗完全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錯誤。我們檢討教訓，還沒有看到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們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已經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了。例如，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對

的對方打壓住，我們就覺得，這個共產國際沒有希望，不能改變，所以我們拒絕開會，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隨後看到托洛茨基的兩個重要文件：一是關於整個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過去政策的基本錯誤，這個文件就是中國革命的總政策。另一個是第六次大會以後，有一個中國的革命問題。當時要提供一條路線，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種冒險主義，就是在反革命時代採行的政策問題。我和陳獨秀看了這兩個文件，我們沒有猶疑就認同托洛茨基所說的，無論對過去對未來都是對的。所以決定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一個左派反對派。1929年4月間，那時另外還有一個小組，就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中山大學學生。他們已經開始組織托派，但是，這批學生有個嚴重的缺點，這批學生從前在革命之中，沒有人做過負責任工作和領導的，在1925年孫中山大學開辦以後，才把他們送到莫斯科。他們沒有革命經驗，直接從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認識，從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長處受到影響，所以贊成托洛茨基思想。他們回來後，在黨內沒有地位和不能到黨工作。就外找少數的人組織一個團體，出版《我們的話》。這樣的組織沒有影響力，尤其在黨內沒人知道。在外也沒人知道，所以我們也不知道，那時我們還在黨內的，就可見他們沒有影響力。到了我們組織左派反對派時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陳獨秀和我組織反對派是在過去黨內擔當最高責任的領袖，黨員差不多全是幹部，他們當中有省委書記、中央委員。上海有批工人，曾參加黨和幹部組織起來的五卅運動的。像這樣一個左派反對派在世界上是第一個，在當時社會上的規模大和人數眾多，是最高的領導層。像美國是有加農，沙赫特曼，阿伯恩，他們曾是中央委員，但他們人數少，且從地位上來說，他們在黨內沒我們那樣高層的地位，在社會上沒我們那麼大影響力，陳獨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沒人不認識。領導上千萬工人運動，社會影響力是不同的。我們第一次簽名的，就是我們的意見書，我們共有



81個人，81人都是黨的幹部，像陳碧蘭，她是上海區委的委員，也是婦女運動的領袖。所以組織了左派反對派，使整個黨都震動，全中國社會上都認為是大事件，共產黨分裂了。像中國著名的胡適之、大學教授們都發表了意見，我們的宣言公佈後，上海《每日新聞》日本報章翻譯了。日本寫的中國歷史還提到此事。新聞發佈後，中共翻譯俄文和其它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內——第三國際，我們建立反對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關注。開始就呈現出與以前完全的不同。至於後來《我們的話》分裂成兩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劉仁靜，他們另出版一小刊物沒有影響力。他們在黨內也沒影響。最後他們離開黨，沒有在黨內去影響群眾。我們使整個黨震動了。我們的組織是左派反對派《無產者》，《無產者》出版《我們的話》和《十月》刊物，從《我們的話》分裂出來的劉仁靜辦《十月》。另外還有幾個從莫斯科回來。很少人想加入我們。他們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們行列還提出條件，劉淵要做中央委員。組織還沒成立，談什麼中央委員？他們另外成立組織和出版《戰鬥》小刊物。我們主要是在黨內爭取幹部、黨內革命分子。宣言發表後，引致黨內震動，三個組織召集聯席會議，中央、江蘇省委、地方組織和我談話。準備開除我們。不過沒莫斯科命令，他們不敢單獨開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許。後來莫斯科的命令開除我們，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義是根據地方的關係，地區、省份和個人的，我們在黨內領導革命運動多年，有成千幹部和我們接觸。革命失敗後，很多幹部還留在黨工作，他們跟我們有接觸，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組織左派反對派。因我在黨內同幹部接觸最多，陳獨秀比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區經常出席上海區委的會，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我常作報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動分子和我接觸最廣泛。在莫斯科幾年，當時的幹部和學生，後來在黨內都變成幹部領

袖，我和他們關係密切。開始，我和一些老幹部接觸，跟他們談托洛茨基的意見，談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一兩個月後，開始組織了幾個約三四十人的小組。我們集結起來，成立一個正式組織，反對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尹寬和我。所有成員分成小組還在黨內部工作，在黨內也有小組，小組有鬥爭，說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說黨的政策不對，批判各種機會主義鬥爭。還在黨內的幹部，還不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組織的人，我們都接觸了。陳碧蘭在中學教書，她接觸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這些人都在黨內擔任重要的工作，由於她接觸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對派。組織就擴大了，因此，我們辦了《無產者》刊物。送給黨內人看，當然外間人也看，這是秘密的，因在國民黨統治底下不能公開。

隨後，我們出版了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問題，除了那最初看到的兩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書送給黨內人看，對社會的影響更大，我們自己的組織生活正式開始。

1929年3、4月至12月，黨內要開除我們。陳獨秀寫了政治意見書。我也寫了政治意見書。尹寬也寫了，還有其他的同志。他們組織特別的批判會批判我們。12月陳獨秀寫了最著名的《告中共黨員書》。陳的檔案還保存著，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幾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丟掉。後來我們合寫《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實是三人合寫的，陳獨秀、尹寬和我。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蘇聯以外的一個最有系統的文件、最詳細的文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文件，德國、蘇聯都沒有。我們是有系統的攻擊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攻擊斯大林의思想和主義、官僚主義。這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一個基礎，應該從這開始，因為很有系統。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斷革命論》，斯大林主義是一種階段論，違反了不斷革命論，就是我們理論上比較最高的理論基礎。

1930年夏天，開始形成一些小組。事

實上除了《我們的話》在工人有地區關係如香港。上海有少數的人是黨外的，都是莫斯科回來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委員會和組織，不過他們沒有影響力，除了香港有少數的工人，一二工廠或船務工廠沒有多大的影響。北京有些學生後來分裂了成兩部分，這兩部分又互相鬥爭，最攻擊的是《無產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劉仁靜和王凡西說，陳獨秀是過去的機會主義者，執行了機會主義路線，寫了文章攻擊陳獨秀。後來托洛茨基說：

“你們應該好好向陳獨秀學習”。陳獨秀做反對派是執行斯大林路線的一個歷史重要事件，整個共產國際內部都很重視。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內外是第一號人物，因為中國有個大革命，中國的黨最大。從前一個黨的領袖，加入托洛茨基運動是最偉大的一件事，證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這班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這個機會主義不是陳獨秀，而是斯大林，陳獨秀只是執行者。他是沒有辦法和必須執行，後來托洛茨基告訴他們，參加我們托派運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們應跟他學習。所以，托洛茨基說這個爭論，這個攻擊《無產者》是被黨的領導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斯大林主義者利用了，在他們的幹部中說：你看，托派內某些人說陳獨秀是機會主義者，去宣傳，去蒙蔽他們的幹部。所以有許多老幹部不滿黨和不滿國際的鬥爭，像胡夢雄，羅章龍等，以前是在我們領導下工作的，我們的態度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後來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義的，對黨員壓迫得很厲害，不能說話，不能批評。所以，覺得陳獨秀和彭述之現在組織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並參考了我們的文章後，更覺有道理，包括劉少奇等。他們稱自己‘調和派’。但是托派內另一小組織攻擊我們，黨的領導拿去宣傳，調和派便失望，給托派很大的打擊，他們寫信給托洛茨基，攻擊「無產者」、攻擊陳獨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寫一封正式信給他們，說你們應該統一起來的。同時，我們的中文宣言《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翻譯成了

俄文，寄給了托洛茨基。當時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對他們說，政治意見書跟托氏的意見是一樣，所以你們要跟他們統一起來。由於托洛茨基這樣說，這些人才放棄了他們反對「無產者」社和反對我們，才能統一。浪費了時間，同時放棄了很好的一個機會——在黨內影響所謂‘調和派’。在統一當中，最壞是王凡西的一個陰謀。他想利用這個統一操縱將來的領導機關，他幹了許多壞事情，陳碧蘭的回憶錄都批評了和鬥爭過。

### (十) 統一大會後的工作和被鎮壓

1931年5月開統一大會。我對統一的態度有點不同意見，統一是應該的，是托洛茨基主張的。如果不詳細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將來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張跟陳獨秀有點不同。我主張有一個時間討論政治和組織問題，有了基礎才統一。不過大家要統一，我不反對。所以，王凡西後來說我是反對統一的，這話不對。因這統一並不是經過認真的討論，其實反對派內有些人是要不得的，應該淘汰的。後來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幹喬，他是《我們的話》的領袖、黃埔軍校的學生，他沒有要求統一，托洛茨基的信沒有來之前，他是反對統一的。托的信到來，他就不敢反對了。他想在統一內做一個領袖。但統一大會後沒有被選出來做成中央委員，於是統一大會後，他跑到南京去見蔣介石。梁幹喬是右傾主義的具體例子，還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統一會議後，所有的領導幹部均被捕了。陳獨秀和我也應該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發。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機緣巧合下得到訊息知會我，才即時離開，所有文件統統丟掉，還想方法告訴陳獨秀，要陳戒嚴在家，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所以陳也沒有被捕。但新選的委員會成員幾乎都被捕了。那時我們是非常狼狽的！什麼都丟掉了，另一方面，又要想辦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錢和關係。所以非常痛苦，陳獨秀不能出門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因為被捕，其他的，特別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害怕，便離開了，故此很混亂，一直到1931年8月，我們幾個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佔領了東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佔領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國爆發了廣大的民族運動——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人已經少，陳獨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員又臨時組織起來，成立臨時機關，我們想辦法弄錢，出版週刊《熱潮》，又把所有組織和黨員重新組織起來，到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因有公開的刊物，可以公開辦，主張言論自由，要武裝抗戰，支持二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本。我們的刊物有很大的影響。一般的群眾和共黨內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對日帝的侵略採取最荒唐的錯誤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衛紅軍，擁護蘇聯，連二十九路軍都不支持，這就是王明時代的政策。

我們編輯托洛茨基的《中國問題》和《無產者》給他們看。在戰爭時期，上海有幾個中共支部，這個領導層看到我們的刊物了，是透過我們的同志，他們亦曾說托洛茨基的理論是對的！**他們反對對托洛茨基派造謠。**這時期，我個人忙得不得了，要寫文，又要出席會議、支部會議、跟他們談話，跟黨的人談話，因陳獨秀不方便。他年歲大了，沒有太大活力。經過很多次的談話，把上海黨部和幾個淮南區的支部、滬東的和滬西的支部十幾個幹部，全部說服過來，變成托洛茨基派的幹部。他們底下有很多工人支部，像浦東有十幾二十個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爭取過來。像郵政局、煙廠、電廠等都爭取過來。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義就代替了斯大林主義。我們托派成功地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罷工遊行。1932年10月15日我們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陳獨秀不舒服，我代陳獨秀主持會議，會議到中段，大批警員包圍了，把我們六人拘捕。我們有一印刷機關，有兩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約十人。陳獨秀的秘書被捕了，此人叛變，被捕就供出陳獨秀的地址。淮南

區支部和滬東區支部的幹部被捕，楊樹浦區是最大的工業區，在上海東面，滬東區整個委員會被捕了。從北京來的一批托洛茨基主義者如劉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們被捕到1937年戰爭爆發，是托洛茨基運動差不多停頓的時期。所有幹部統統被捕，被捕幹部有30人以上，這個打擊最狠最大。在南京審判，不過審判是做宣傳，所有的報章刊登我們被捕了。托派的一個工業基礎，從黨爭取過來的，但是我們被捕了，那些幹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聯繫。在法庭上我很嚴厲的公開反對國民黨。我的演說，報章摘要登出來。就是公開反對國民黨，用共產主義來改變中國問題。這是一個最廣大的宣傳。在監獄組織了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常常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 （十一）抗戰爆發後恢復工作

從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沒有中心思想情況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戰爭爆發，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政治犯，共產黨已經投向國民黨。不能不釋放托派，所以我們從監獄釋放出來。我是最後釋放的。因國民黨一個領導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擊國民黨太厲害，想把我處死。不過監獄長向司法部請示，司法部長認為不釋放是不能的，最後把我釋放了。我從南京監獄出來就到上海，開始要恢復組織，恢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組織，剛好有其他監獄釋放來的同志，就集合討論要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又通過抗日政綱，選出執行委員會領導機關。繼續出版刊物，還是秘密的，因抗日後情形稍微變化。國民黨不能完全控制我們，1939年，出版公開刊物《動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書，我們有一批朋友，由陳碧蘭介紹我到南京結交一批朋友，這批朋友後來變成我們的同情者。有一位曾是國民黨轄下當官，很有錢的，思想左傾，到日本讀書，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又一



朋友是我們的老共產黨員，經這朋友，他變成我們很好的同情者。另一關係，一銀行家曾參加五卅運動的，他們都很同情和幫助我們。所以得到這三位朋友的幫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 Revolution 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名《蘇聯的現狀與前途》）。後來又出版《俄國革命史》三大卷，是幾本厚厚的巨著，還有很多小冊子，也是托洛茨基寫的。沒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因要翻譯和校譯，出版又花費很大的金錢，大出版商不願出版沒有經濟效益的書籍，沒有前人的經驗，革命的書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這幾位朋友籌集資金，我們找鄭超麟和王凡西翻譯，給他們生活費負責翻譯。翻譯好就出版，很快，時間約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幫助。

我在革命前，接觸的人非常廣泛，在革命失敗後，有許多教授、知識份子最先離開，對這些知識份子很反感，他們從前要見我們都是見不到的，要入黨不容易的，革命失敗，他們最先離開。所以，革命失敗後，走到另一極端，我們很孤立。被捕的時候，陳碧蘭很苦，得不到幫助，只有幾個老的黨內的，也離開了，被捕時有第一個女兒和懷有三、四個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別人不同的，我們是政治犯。我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書，全是譯文，有俄文的書，托洛茨基、列寧寫的都有。監獄長不敢干涉我們，別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時間讀書，在監獄五年，整日讀書研究。什麼都看，朋友來看我，問我要什麼，就是書，所以朋友把各樣的書送給我，我的牢房就是一個小型圖書館。我看列寧、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尤其看他們的通信，他們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們就利用來幫助運動。有些人跟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寧通信的並不是革命者。我覺得我們有點過分幼稚了，覺得我們孤立不對。所以要改變我的態度，不要走極端。釋放後，陳碧蘭介紹的朋友都跟他們見面，亦接受訪問，得了一批朋友來幫助我們的運動。從這批書的發表，

刊物的發表，是運動中的又一發展，從1938-1941年日本戰爭，珍珠港事件開始，我們的運動有新的發展，在各地方，北京、重慶、浙江、廣西、把舊有關係恢復過來，有新的發展。事實上，出版一大批的書有利發展影響，我也寫了一批小冊子，寫關於抗日的小冊子，西班牙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奧地利革命失敗的小冊子，對托洛茨基和蘇聯的情況有廣泛的影響，也公開出版了。

日本戰爭後完全變了。日本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從前在租界上活動比較方便，租借是壞，但日本更壞，進入上海後，恐怖和隨便捕人殺人，像希特勒進入歐洲。因此我們領導中心同各地方的關係統統斷了，不能通信。隨後，日本進入北京、山東、廣東、廣西、武漢，大半個中國都被佔領了。我們的組織受到同樣的壓迫，加上我們在上海有五個幹部被捕了，他們擔任重要工作。於是，上海的組織就完全被破壞了。他們被捕，還要營救他們，我們對同志有責任的。所以，非常狼狽，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給他們一點錢。中國的監獄人員可以賄賂，可以找關係，所以我很狼狽，剩下的覺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劉家良跑到溫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幾個人、陳碧蘭和我，同志要求我離開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個年輕人，我把他們組織起來，開一個訓練班教育他們。

這時候，大夏大學和之江大學的教授朋友，他們不大反對共產黨，在革命時代是有一點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紹認識，到大夏教學，之江大學原來在浙江，後來遷到上海。因我沒有教育證書是不能教學的，和美國一樣。我現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沒人請的。不提出哪國的學位來，是不能教學的。雖然我做過教學工作和有質素，但是不能提出來的。他說：沒關係，改一個名字。我就改名陳松濤。他說，陳松濤在北京大學當過教授，不過現在不願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統治有危險。校長聽了後說，用真名危險，隨使用什麼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陳松

濤教學。

教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有時教西洋的文學發展，又講哲學。事實上，是講歷史唯物論。不用馬克思主義名義，因為有各種學生，我是用那個意思講馬克思主義，講中國通史、哲學、西洋文學史，有些普通學生不懂，覺得我很有學問，有左傾分子，聽懂我的話，說陳教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下課後，學生來教授休息客廳找我。“陳教授，能到你家訪問嗎？”我說：好的。就這樣一批左傾的學生到家裏來，就跟他們談，後來爭取了一大批學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後來轉變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結果。

1941、42年開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開同情網，結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紹的，又跟他們講馬克思主義，他們是聯合的和激進的，所以我結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國做生意的商人。這時期的我，活動範圍不能到廠區，而是學生、大學生、一批自由派的、激進派的商人。這對後來很有用處，和平後，1945年8月戰爭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問，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險的。當時，寫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學術上、哲學、歷史的文章用‘歐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歐伯”，現在還是這樣。他們問：“歐伯，現在和平了，戰爭沒有了，你要做什麼？想做什麼？”我說，第一要出版雜誌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錢，他們說，事情大家商量，並籌集了十條金條，大約五、六千元。他們說，要辦就辦最好的。我們很快恢復組織，重新建立領導機關。因做教授，有一批學生，通過學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組織發展很順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監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內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樣的好。他做經理，把刊物辦得最漂亮的。那時我忙得要命，寫文和組織，還有劉家良（他後來死在越南）的幫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丟了。我們的雜誌一開始就暢銷，因為水準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陳人白。我們

的文章有水準！我們宣傳托洛茨基思想，並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內容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所以雜誌影響很大，初期約4、5千份，報攤和書店可以買到，所以影響就大。隨後，陳碧蘭辦《青年與婦女》，是她私房錢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幫助，主要對青年人談婦女問題，所以是有另外一種影響的。我們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組織，孤立的、個別同志，他們看《求真》，全國到處有賣，知道是老歐辦的。所以他們就寫信來，把全國各地方的孤立組織串連起來。個別的人寫信來，也串連起來，所以很快恢復了全國組織。1948年，我們的黨員團員約四十人，不過我們有很多同情者，使我們的影響更大，因《求真》是戰後有名的最好雜誌，連蘇聯大使館也要。國民黨有許多所謂左派也要雜誌。所以，是托派新的發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到了高點。我寫了《黨綱》草案，劉家良起草了《組織原則和方法》草案，在會前發給各地組織討論，在大會上都通過了。大會通過將原來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名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以下簡稱「革共黨」）。1948年，毛澤東的中共跟蔣介石的內戰展開了。這時，國內局勢，對托派來說，危險是一天較一天高。



## （十二）被迫南下再出國

到了1948年12月毛澤東的軍隊已經攻打到長江的北岸，要進攻南京了，離上海很近，我們非常受威脅。毛澤東的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如果不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沒有問題，我們合作好了！斯大林主義的黨特別仇視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動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樣。故此我們考慮到這個問題，改變政策，否則我們全部要被毀滅或監禁，像蘇聯的托洛茨基運動一樣，蘇聯沒有托派存在，全部被關在集中營，所以我們開緊急會議應付時局。

中共一定勝利，因蔣介石太腐化，對中國大陸，我們採取什麼立場？我們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們批判他們機會主義的政策，是我們的態度。另外，我們的黨員、團員要加入共青團，加入青年團，加入工會，不能獨立工作。在上海成立臨時委員會，同黨員聯繫，政治局則轉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許多人認識的托派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調到上海，這是我們的安排。我和陳碧蘭、劉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員，還有尹寬，他不願意離開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現在還在監獄。我們到了香港，是我們不能不離開，我們一定被毀滅。毛澤東要是得到我，不會放監獄內而是要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給斯大林作為一個禮物。

1948年12月，我們離開上海。在廣州住了個短時期，當時廣州組織還有幾十個人，中共的軍隊向廣州進攻，我們只好離開廣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中國大陸差不多20年。同時是在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底下，托洛茨基運動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從廣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合起來，大約還有近一百人，我們把香港的組織推動起來，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國際》，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開始不錯的，我們黨員團員有學生和工人，我們幫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來有發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來了。兩個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著，有一位姓

謝的同情者是銀行工作的，一個很好的人，是我們在上海影響的，他大學畢業，很有知識，英文也很好，他沒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調到上海一間銀行做會計主任，很高的地位。我們要接收國外報刊，我們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說：我來給你們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國際》及其它的郵件。托派中央機關到了香港，當局有偵探，也可能是斯大林黨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厭惡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領導罷工，例如在船廠、大紗廠等，托派在領導，我們的同志是領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們來了，就想方法要對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檢查我們接收的外國郵件。有兩個人被拘捕，十幾人被捕了，有些釋放，有些被遞解出境到澳門或內地，跟著這事情發生後，他們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們用盡方法找我。他們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但是根據接收報刊的同情者，有時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蹤他。警員有技術的知道他去這個地方，當局要來搜查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趕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兩天後，那間房子被搜查了，兩同志也拘捕了。過一、兩個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蹤，那便衣偵探來包圍，來調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說，在香港是危險，連我們組織也是一個負擔，所以大家建議離開香港到越南。我們的同情者是陳碧蘭的親戚，幫助籌旅費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國殖民地，非常反動。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沒問題，碧蘭和我教學，我們的女兒也教學，教中學語文、中學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組織要到胡志明佔領的越南區域去開會，劉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獄中。我們又有危險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訴上海的同情者，說毛派知道我們在越南，要我們當心！因在越南要對付我們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槍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們又要離開越南。香港同志給我們籌旅費，買船票到法國。到法國的時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過，我們



希望國際上會有幫助。我們到了法國，正是第四國際召開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前，我們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開世界第三次大會。我是第一次直接參加國際會議，也參加了國際的領導機關。我們二十四人到歐洲，我們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國。

### （十三）參與國際的領導工作

我參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組織領導層會議，初期還沒有分裂。後來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們參加美國加農所領導的反巴布洛的鬥爭，我們捲進去了，因為我參加國際委員會的，在國際委員會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這時期，我是主張統一的，我還存有文件和信件。不過那時候，巴布洛派也不願統一，英國希利也不願統一。我在這方面跟他們鬥爭，要統一。到了1962年，約瑟·韓生(Joseph Hansen)來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亞·斯道娃(Natalia 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見到韓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給加農的，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給加農，有時候是給杜勃士。我就統一的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加農，我認為要統一。在1963年韓生同勞斯·道遜(Ross Dowson加拿人)，到我住處直接談。這中間有很多的障礙，不過我是堅決要統一，後來是統一了，1963年6月在羅馬開了統一會議。我是代表中國的革共黨(RCP)的。陳碧蘭都是國際上前線人，參加國際的領導機關工作，而且干預了國際上很大的是非問題，我們有意見，是代表中國支部的。我們對古巴，我有兩個文件，還有一個是原草案。我對阿爾及利亞，寫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時我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一些意見。在隨後關於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爭，我是單獨一個人反對國際執委會的，在1968年，我們代表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干預國際托洛茨基運動。

當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組織已受了很大的打擊，多位同志幾次被捕，驅逐出境。

不過，他們還繼續工作，繼續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見還要靠我們幫助，我們寫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他們出版了，作為我們革共黨的立場，此後他們對於農業集體化，也有他們出版的文章評論。1957年有一個‘大鳴大放運動’，他們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們的立場。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有他們的意見，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關於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黨兩個領導人，史瓦貝克和佛蘭克·格拉蘇斯(中國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們，也批判中國的蘇達同志，他們都想反駁我，因此，我在1960年寫了一個重要文件《關於中國局勢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The Character of CCP and its Regime)，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分析文件，一個綱領文件，外國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寫了很多文章和訪問，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同志翻譯出來，是明報月刊翻譯出來。香港同志還出版了《嚮導》叢刊，不過不定期，有時幾個月出一次，但是他們繼續工作，還維持了一個組織。他們是不斷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冊子，他們是受壓迫的，雙重壓迫，香港政府壓迫托派組織很厲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壓力。從前大陸的國民黨政治機關、銀行、商舖、產業，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萬人在香港，因為有錢，工會也給他們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壓迫，同香港政府的壓迫合起來，我們的同志簡直就透不過氣來。所以有些同志消極了，少數同志想做，做不出什麼，就是出版文件刊物，從前留下的人越來越少，現在都50歲以上，是替我們做工作，是我們在40年代影響的，經過三十年，那時他們20歲左右，現在變成了50歲以上，也疲倦了。同時他們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經說過：“慷慨殺身易，長期奮鬥難。”我的親身經驗，一個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殺不是很艱難，我們有成千的共產黨員，都是慷慨殺身的，但是要長期抗爭就十分難。因為革命者

也是人。如果在革命過程中被捕，甚至槍斃，沒什麼，我自己就經歷過。在南京準備死，我寫信給父母和陳碧蘭，說是應該做的，最後為運動犧牲，我一點沒有感覺痛苦，因已決心拋出去，後來沒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艱難的。

#### （十四）香港同志的處境和工作

1948年從大陸避難到香港的同志，現在算來，二十六七年了，他們在大陸，差不多都有十年歷史，這些同志都經過了三十五、六年的鬥爭，他們要生活，又要工作，還要想方法弄錢來出版，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跟美國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種艱難困苦！所以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最艱苦的。他們工作堅持到現在是很艱難的，大家認識到，那樣的條件，美國現在的老同志，不過一兩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幾十年了，所以我們是要體諒他們，不過我們總是要工作，這樣會有衝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現在還保存著，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們，鼓勵他們，提出建議。1968年我們到日本旅行，我和碧蘭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見我們，更多知道香港的實際情形和過去十幾年的情況，我們從日本回巴黎，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志，要他們積極工作，現在的世界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建議他們籌一筆款，出版書籍，出版刊物，我們說，香港的青年，請你們活躍起來，因當時歐洲和美加有個青年激進運動潮流。像美國那些年青人反越戰，就是那個時候。他們籌了錢，把每月有的一點錢拿出來，籌了幾千元，準備要辦一個刊物，但很吃力，有錢，還要寫文章。編輯的人，寫文章的人不夠，他們又停下來。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個新的月刊《70年代》，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進化運動，當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這是一個新的青年運動，我們香港的同志很難影響他們，我們建議寫的文章，他們寫，但是不能夠影響他們。例如

王凡西，他接觸他們，還不能夠影響，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們的運動。1972年2月間，香港《70年代》雜誌二個成員到巴黎訪問我們，後來又有一批十幾人到來。他們一來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們是從外國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們就問我許多問題。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寫信給我，說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負責人，我答覆他許多的問題。我同這些年青人大約有一年書信往來。跟他們談話，他們提出蘇聯的問題、中共的問題、全世界的問題，為什麼蘇聯是一個官僚獨裁的專政？為什麼中共又是一個官僚獨裁？所有的問題，我都給他們答覆了，有時談很長久的。最後被我說服了，他們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第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再進一步是托洛茨基主義。所以，這批人1973年回香港，當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的吳仲賢，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膽子大，他們不怕，頂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會遞解出香港，到澳門或大陸去。年青人是生長在香港，英國政府不能迫使他們離開香港，最多關起他們。所以這批年青人反對香港政府，示威遊行。他們敢於公開說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以，從前老同志不敢說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報紙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這班人，報紙常常登載。從1970年開始，我們向他們建議，把托洛茨基以前的書籍重新出版，拿到書店去賣。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書店寄售，它當然想賣，所以我們有一大批書，托洛茨基主義的書再版。像《俄國革命史》，像《中國革命問題》，現在又要再版。這些書籍印出來是公開賣的，所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就擴大了。一年多兩年，他們出版《十月評論》刊物。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派運動在香港等於半公開。香港政府也不像從前的壓迫，共產黨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就不能公開？托派在英國是公開的，在倫敦是公開的，為什麼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開。所以，我們現在的活動比較公開，

半公開的，兩個刊物和書籍出版。我們可以公開地代表托派去演說，由這批年青人去復興托派運動。《十月評論》已經出版了快兩年，知道他們很積極、盡力的做。我們的書現在是公開出版，《十月評論》上有我的名字，將來還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寫的。他們登載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們要出版陳碧蘭的訪問記和回憶錄。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組織有幾十年，從1940年左右，我們香港有組織，但是從來不能這樣的公開，我們出版刊物，從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們的書公開出版，刊物公開賣。這倒是新現象，也可以表現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也是一個發展，香港的組織雖然很小，但是組織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為所有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國家，從蘇聯到東歐、北韓、北越，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香港，我們還有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而且這個組織，最有鬥爭的傳統，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 （十五）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立場

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產生的思想基礎，我們就要檢查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中國大陸所採取的政治立場，對於大的事變，它的政治立場是怎麼樣，才可以判斷托派起了什麼作用。我們可以用幾個大的事件做一個基礎，做一個標準來做判斷。

第一個時期是從1929年到1949年這二十年，托派活動在國民黨最反動的統治底下。第二個時期，就是從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到現在二十六年。我們要分開來講。在國民黨統治底下，有什麼最大的事變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東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都是大事變，對於中國的民族命運有關聯。我們採取什麼態度，中國怎麼辦？我們出版刊物，我們有文件、有宣言，我們的態度是分析日本佔領中國，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結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敗的結果。所以我們宣傳

這個基本觀點。日本侵略，我們要武裝對武裝，應該要武裝人民來對抗日本的侵略。為了這點，要求國民黨應該給人民有自由，沒有自由，怎能夠活動呢？所以我們提出的政綱，就是我們的共同要求，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這種專制獨裁，只有幫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們的自由，所以人們要有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人們要有公開的武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此，農民、受壓迫的人們在一起，幫助農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這是全民族的問題，為了實現這些自由，要有一個國民會議，要有一個普通選舉的有全部權力的國民會議，把這些自由活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共同綱領。我們用這個共同綱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的專制獨裁。這些綱領和宣言等，在當時都是有文件發表或登載在報章上的。

托派的運動也是上述同樣的兩個大時期，在上述第一個時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我們當時採取的立場，是號召全國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抗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們提出由國民會議來解決重大的問題。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全面進攻中國，這是繼續從前佔領東北三省一樣，繼續擴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對中國的國家命運很重大的一個歷史性影響，同時對整個國際也是。托派的政策是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支持抗戰，抵抗日本戰爭，就是在蔣介石領導底下，我們在軍事上，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另一方面，我們批判國民黨的抗戰政策，是錯誤的反動的，它壓迫人民，不許人民自動的武裝，不許人民組織武裝自己，自由組織，不給人民有自由，所以我們提出召開國民會議，以全國人民普選出的國民會議來領導這個抗日戰爭。這就是我們基本的態度。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對的。後來托洛茨基也表示這個意見，與我們完全一致。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托派有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派是陳獨秀，他從監獄出來，



變了。在監牢，我跟他鬥爭，證明他的思想錯誤，在支持抗戰行動上表現出來。他跟我們不同，他也主張支持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這跟我們一樣，但是我們反對國民黨的抗戰政策不徹底，尤其對於人民繼續壓迫，人民沒有自由。陳獨秀跟我們不同，他主張不要批判國民黨，我們也無條件去批判蔣介石。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那時他已經放棄了革命的立場。他害怕批評國民黨。這就是我們的文件表明的，關於陳獨秀的我們有好幾個決議。第二個傾向，就是托派中的鄭超麟，也是個老托派同志和老黨員，他是另一個極端。他因為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他說這個戰爭不是革命的，我們則說有進步性。他說蔣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樣的，兩方面都是反動，所以他主張我們對抗戰應該採取失敗主義。這是極左的。這一傾向很危險，在那時候，如果在客觀上，我們是擁護日本人，贊成日本侵略，因為必須首先要打倒國民黨蔣介石，他已經領導抗戰，這樣就等於做漢奸、做叛徒。所以我們反對，我們反對這兩種傾向，我為此起草的決議案，是絕大多數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確的，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後來，在日美戰爭發生的珍珠港事變後，王凡西又是個失敗主義者，我也批判了，我們批判他，尤其劉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種極左派。因為日本進入了中國，我們怎能夠對日本戰爭我們要採取失敗主義。我們採取失敗主義等於幫助美帝國主義。對這件事情我們是正確的。有很多文件，爭論得很厲害。結果，陳獨秀離開了托派。王凡西和鄭超麟也出來組織一個小組。所以托派分裂了。不過，他們出去的人很少，幾個人。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後，托派對於和平後採取什麼立場？和平後，我們的政治立場是反對國民黨的專政，人民要自由，我們重新提出要有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問題。《求真》同《青年與婦女》都發表這些意見，托派的政治立場是正確的。



最後，是國民黨同共產黨的內戰，引起共產黨後來奪取政權。我們起初批判共產黨機會主義政策，它等於投降，在中日戰爭中，它投向國民黨，它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這個領導，沒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們批判它。和平後，共產黨還想跟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這是機會主義，和平後，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個真正革命的黨，它可以很快的發動全國的工人農民走向政權，但是要跟國民黨合作，直到蔣介石把周恩來這位國共和談代表趕走了，才逼得毛澤東增加反抗，因蔣介石已經發表宣言，要拘捕毛澤東、朱德。我們批判這些。另一方面，我們攻擊國民黨發動內戰，犧牲人民，這就是這時期我們對兩方面的批判。我們主張共產黨應該直接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認為國民黨應該打倒的，這是我們的立場。但是在這時期，我們托派有一錯誤。我們的錯誤就是，因共產黨用這樣純粹的軍事手段，不發動民眾，不能夠得到政權，原則上是對的，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就是第二次大戰後造成的整個國際形勢，特別是中國的局勢，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雖然實行機會主義，

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走上了政權，我們後來檢討，我們對這一點，沒有估計到。這是我們的一個教訓。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說的，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二十年當中，托派對於重大事變的政治態度和政策。我們現在來回顧，我們是對的。共產黨就不同，是機會主義的，一時是冒險主義的，所以，這與我們不同。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托洛茨基主義正確，不能夠成為一個群眾的黨，領導工農走向政權呢？這是一個歷史大問題。我寫了小冊子解釋，就是托派在國民黨底下，被壓迫得非常厲害，例如1932年，陳獨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國的基礎上，我們當時在城市內的基礎，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們可能很快的發展，成為一個大的黨，但是陳獨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幹部30幾人被捕，所以沒有辦法。這解釋了托派不容易發展，是受各個時期統治者的壓迫破壞太厲害。

### (十六) 對中共統治政策的批評和我們的立場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派走上政權後，托派的政治主張，在這點上，我們也要根據那個大的事變來看問題。起初是一般的，我們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我們怎麼樣看法？第一，他是個機會主義者，斯大林派，為什麼能夠奪取政權？什麼樣的客觀原因？什麼是它的主觀原因？以及這個黨當時的政策，它的組織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後，就是我們的態度，這必須要有一種很嚴肅的分析。關於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個很認真的研究，寫出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這是我給第四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贊同的。我在這個文件內就做了分析，認為中共能取得了政權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一是蔣介石政權的絕對腐朽無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後拋棄蔣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內戰，尤其是抗戰中的壯大，四是蘇聯對中共

的援助(詳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3卷)。跟著，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個，多半是東歐國家的道路，就是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這是斯大林主義的表現。事實上，毛澤東是跟著斯大林當時的東歐國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這個前提部份。我們的態度，我的報告後面提到，我們支持毛澤東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正確的措施，同時，我們指出他們的不夠徹底，我們指出應該沒收土地給農民，沒收所有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歸國有。

另一方面我們指出，工人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們主張工人農民兵士都要組織蘇維埃，來管理國家，然後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工農政府，工人和農民的政權，這就是我們的態度。我們這個態度很清楚，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關於這一點，我在1954年給瑞士一份托派的報章寫了一篇文章，我更簡約地敘述了我們托派的政治見解，在這篇給瑞士的托派刊物發表的文章中，我更具體地批判和分析，我們一方面支持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要摧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參加抵抗，這是我們的態度。要有一個真正的工農兵的蘇維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走東歐的道路，將會有一個政治革命，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來，是我們托派的意見。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產黨在1955年開始農業集體化，要農民參加生產合作社。關於農業集體化，我們支持，但是毛澤東的做法，我們反對。因他強迫農民參加。那時香港的托派同志，寫文章批判這件事情。我們表示這是一種列寧對農民的態度。1957年，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運動，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一位同志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這是對的，但是毛澤東不是這樣，他是要利用這個大鳴放來查出那些反對派，引這些反對派連同中共自己的黨員說出他們的真心話，說是「引蛇出洞」，然後加以打擊，當作右

派，拘捕了幾萬人，開除了幾萬黨員，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擊，我們認為這是個陰謀，事實是如此。這是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些是中國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時有5億農民，要他們一下子參加公社，這使全世界都震驚了，全世界的輿論都很驚奇。因為這實在是非常重大，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但在我們托派內也有人贊成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貝克和李福仁，中國有蘇達同志是贊成的。他們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擁護。那時候，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也很煩惱，形成二派，由紐約和洛杉磯兩地的成員所分別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寫一篇文章。我寫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評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我根據列寧、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以及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俄國的歷史事實和經驗，東歐的經驗，我全部的做了一個檢討，批判毛澤東的這種人民公社是一種冒險主義。我從理論上，歷史的經驗上，根據俄國的先例，給毛澤東一個批判，給人民公社批判。這種冒險主義必然會失敗，我預先指出要失敗。例如，公共食堂，我說這是行不通的，這是起碼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懂得的，物質生活落後，怎能夠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飯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國革命以後也辦不到！還要等一段時間。這是非常幼稚的，沒有知識的，一定會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時還沒有取消，當我說這個問題時。後來，沒有公共食堂了。原來公社是一個失敗，後來又恢復到生產合作社。我相信我這篇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對這個問題最精細、最正確的分析。這也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觀點。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分析是有預見。對落後國家，托洛茨基主義應該研究。所以，這篇文章刊出後，把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兩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們的意見，紐約的同志社工黨的領導是完全支持這個見解，而且給他解除了一個麻煩困難。其他的國家，像日本的

Yamayiqi，他就最贊成我這篇文章的分析。當然，沒有人不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意見。第三件，最後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給中共黨員的公開信，在明報月刊刊出，還有許多文章講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一封信》（見同上書）中，提出一個鬥爭綱領，我們的態度非常明顯，我們反對毛澤東用這種辦法排斥異己，排除反對派；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又來了。這就是我們正確的立場，我們批判反對派劉少奇，但是我們指出劉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澤東是有建設性的，代表溫和改良的。我們支持這個溫和派改良派，同時批判他不足夠，這就是我們的態度。像我們對俄國的赫魯曉夫批判，我們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義，但另一方面，我們批判他不夠徹底。最後，我們反對批林批孔運動，我們的《十月評論》有大量文章評論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歷史是很重要的。關於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為，涉及一些中國重大的歷史問題。

對於中共這個政黨和政權的分析，我寫了一篇《關於中共的勝利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見同上書）這是比較全面的分析。雖然不像托洛茨基寫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樣詳細，不過，一般是那樣一個新的分析。這也是因為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寫了文章，他們認為毛的黨，中共，不是斯大林黨，毛的政權不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中國實行了純正的革命。他們是把中共美化了，這就是一種投降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這是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起初在社工黨裡，他們的文發表使得社工黨的領導層很麻煩，因為他們不很懂得中國的情形，不知道怎樣答覆他倆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寫篇文章講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據他們的文件來批判。在托派來說，是對毛派、毛政權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綱領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們現在根據這個綱領，視為對毛派的政治革命綱領。

總而言之，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



因它表示托派對中共的政權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綱，提出政治革命，表現托派是非常有原則的，根據馬克思主義，不是隨便反對和隨便贊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蘇聯要有個政治革命，他是根據理論和事實的分析，從這點上說，我們是一樣的，我們繼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運動在中國所經歷的，這四十六年，托派對於中國問題的政治主張、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寫出的，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托洛茨基派有這麼多的文獻。因中國的事件發展得複雜，完全不同。一個斯大林黨掌握了政權，又是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對整個運動的發展，做出了我們的思想貢獻、正確的貢獻，我認為我們是對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有人能否定我們或是有理據批判我們。此外，中國托派目前對於中國的問題是有有系統的分析，並堅持主張的。

### (十七) 中國托派對幾件世界大事的意見

我們中國托派對於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對於世界大事的意見也有相當的貢獻。例如對古巴問題，我有兩個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羅剛剛走上政權，我對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時又有點危險，因為他國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國主義壓迫下，可能要墮落，尤其在蘇聯的援助底下會官僚主義化。我這個分析，第一次我寫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給國際委員會寫了一個決議草案，我們的分析，到現在還沒失效，事實上卡斯特羅是完全跟蘇聯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爾及利亞，她同法國帝國主義，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我曾經發表過意見，提出阿爾及利亞應該走怎麼樣的道路？我這個政綱性意見包括在《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裡去？》一文內（見十月書屋出版的《彭述之選集》第四

卷）（註）。因這篇文章提到古巴問題，提到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提到統一問題，這是我對國際問題比較重要的問題的文件。我對古巴的意見又重新分析，為什麼古巴走上政權和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我說得更詳細。也說她的缺點。對阿爾及利亞有我提出的政治綱領。因為對阿爾及利亞，我認為，那時白恩斯是極左教派主義，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個綱領性文件，這也許很重要，對於國際問題，阿爾及利亞很重要的。

[註：該文指稱「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者必須團結起來，以現時獲得的政治獨立為基點，製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綱，再進而動員工人群眾及一切貧苦的農民繼續進行鬥爭，為撤退法國駐軍和取消它的經濟特權、為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實現產業國有化、為爭取工農的民主權利，和建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工農政府而鬥爭，以此把阿爾及利亞推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便是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線，並以此為批評本·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標準，和鼓勵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繼續進行鬥爭的方針。」（見該書第242頁）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智利1970年開始的革命，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有個重要的意見。我曾經寫了封信，給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我在1971年就主張智利要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否則，這革命一定會失敗。因為只有成立蘇維埃，才能夠使軍隊兵士，跟軍官隔離起來，才能避免戰爭。我在《導論》中也提到。這是托派對國際運動的貢獻。對於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見。我主張葡萄牙應成立工農兵蘇維埃，不能專靠立憲會議。不過，這事現在還在爭論。中國托派對於國際運動重要事變有其主張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說，中國托派，從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從思想來說，是堅強的支部，我們特別的自豪。當然，我們的組織非常小，這並不是我們的主觀錯誤，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托洛茨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了有系統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蘇聯活動，蘇聯的托派同志們被摧

毀了。所以，我們是可以解釋的。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挫折、失敗，處境是非常艱難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種可以說是最深刻的，最廣泛的意見。政治立場證明是對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運動裡面是不多的。

### (十八) 回顧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

訪問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傳部的組織。當時宣傳部是我負責的。在1924、25年是沒有的，從前宣傳部是有的，雖然沒有機構，也就有個人負責，沒有正式成立一個機構。我回來後，因我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要我負責宣傳部，所以就建立了一個宣傳部的機構。是一種獨立的，單獨的，有一個負責人。我是宣傳部部長。組織了一個宣傳委員會，可以大家討論關於宣傳出版工作。因宣傳部工作很廣泛，要領導出版兩個刊物《新青年》和《嚮導》，我要負責。這些刊物是對外和對內宣傳。還有對內的教育工作和辦黨校。所以要有個宣傳委員會來討論。宣傳委員會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後來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們宣傳委員會有陳喬年秘書，我們開會討論。有兩份報紙和兩刊物，我是主編，陳喬年是助手。所以，我們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黨校組織，很忙，沒時間教育，因革命發展像狂風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黨員，連青年團員一千多些，一年後便一萬多。所以我們人手不足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不過，我們也做了一點宣傳工作。

第二個問題是我和瞿秋白。這問題很複雜，因有許多外國書籍，老是說彭述之與瞿秋白有仇恨、有衝突。我這個人從來不同人爭，我對於同志是採取一個正當的態度，我們同志間工作，政治上意見不同，也沒關係，可以討論。我是依照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我懂得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思想，我自己參加

過。所以我是採取這種態度。我跟任何同志沒有成見，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績表。對瞿秋白也是這樣。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強，但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機會主義思想。1923年回國，和陳獨秀參加第四次國際代表大會一起回來。他回來，黨叫他編輯《新青年》。他寫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個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譯出來算是自己的，寫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認為不忠實，尤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學當教授，他講唯物史觀，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觀翻譯出來，後來，翻譯本印刷出來寫的是瞿秋白著，沒有說是從布哈林的書翻譯的，非常不光彩。

(編按：原有錄音帶說到此為止。憶述和錄音歷時15天，從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



## 蘇聯的外交政策

托洛茨基著 李時譯

1934年6月16日

蘇聯的外交政策已經決定性地採取了反列寧主義的轉向，尤其是繼美國承認蘇聯之後。

首先，美國資本主義是在完全確信第三國際已經不再是為世界革命總體服務的工具，而尤其不是作為激勵美國勞動大眾的革命熱情的工具，才承認蘇聯。其次，斯大林主義官僚為了突顯他們的良好意願而作出正式宣佈，指羅斯福總統代表著美國的和平資本主義，為帝國主義的當前矛盾和衝突誠實地尋求一個民主和平路線的解決方案。

蘇聯駐華盛頓大使亞力山大·A·特羅揚諾夫斯基最近聲稱，蘇聯和美國應該能夠找到“共同基礎”，以“為保障全面或局部性的解除軍備而努力。”他並且說，“蘇聯的外交政策，表明她愈來愈積極爭取和平…。我們從這個角度出發，歡迎對於美國恢復正常關係。我國認為最重要的東西，不是為我們國家帶來物質利益，而是在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中令國際和平得益。”

人們難以質疑特羅揚諾夫斯基對和平的熱愛，尤其是當我們把他的其他聲明放在一起看時，更是如此。他宣佈：“和平的事業是多麼偉大，必須壓倒所有其他問題。”而這些問題中，他列舉了我們這個時代中最重要的經濟矛盾：“所有次要的（！？）問題，如債務、商業競爭、關稅等等，”他解釋說，“必須儘快經由共同協議而讓雙方滿意來解決，愈快愈好，因為這些相對地細小（！？）的問題破壞著國際氣氛，妨礙到鞏固和平的友好努力。”

這位可尊敬的斯大林主義者大使，真的是這樣想嗎？難道他把列寧有關於戰爭的經濟原因的教誨，徹底地完全忘掉了嗎？應該提醒特羅揚諾夫斯基，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用事實證明瞭他，特羅揚諾夫斯基提

到的“次要的”和“細小的”的問題，正就是帝國主義戰爭以致其他所有一般戰爭的根源。又或者這是托洛茨基主義反革命的觀點嗎，大使先生閣下？

斯大林主義者為了配合這個潮流，在境外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出版了全新的詮釋。他們把資本主義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和平、民主及愛好和平的；另一類是好戰，法西斯和富侵略性（這正是第二國際理論）的。在前一類名下的有美國，法國，諒解協定國，也可能包括英國；在後一類名單中，特地標示有德國和日本。

遵循著這套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利特維諾夫正和帝國主義的法國達成“諒解”的討論。《紐約時報》駐柏林的記者弗雷德里克·T·伯查爾寫道：“…伴隨著軍事協定相輔相成而來的，據悉就俄羅斯加入國際聯盟已經達成透徹的諒解。在法國熱烈的支持下，將儘快成事；法國在解除軍備談判為藉口下（好藉口！），會在短期內派遣一支矚目的代表團前往日內瓦。…法國就歡呼俄國人的諒解這點已經準備就緒…以為歐洲和平與法國安全作進一步保證。接下來，法國將準備去談解除軍備談判的問題。”

以馬克思和列寧之名作的這個花招，據斯大林主義者們解釋，是為了確保當蘇聯受到來自法西斯和好戰的資本主義如顧名思義的德國和日本大有可能的襲擊時，蘇聯有盟友（?!）對抗它們。至於蘇聯加入資產階級的國際聯盟就水到渠成。這個國際聯盟，共產國際在第三次大會時已經給予定性，是一個由“戰勝國為了剝削被征服的競爭對手和殖民地人民而組成的國際托勒斯”。

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官方喉舌《真理報》，現時對國際聯盟的政治作了如下解釋：“事實上，



隨著日本和德國退出國際聯盟——這兩個國家甚至無意試圖掩飾它們要通過進一步的備武，包圍圈和戰爭以達成其帝國主義野心的決心——這個問題便應運而生：國際聯盟能否在某種程度上（多麼謹慎啊！）成為聯合力量的中心，以推延用流血來解決糾紛，為和平帶來起碼的一點點助力。”而卡爾·拉傑克補充道：“攻擊蘇聯的戰爭危險不是來自國際聯盟，而是來自聯盟的公開反對者和英國的死硬派。”

共產國際第三屆大會的提綱和決議支持的是另一結論：“新的國際勞工組織是為了組織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而建立，追求這個共同目標：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徹底消除階級和實現社會主義，作為邁向共產主義聯邦的第一步”。

斯大林主義消除了這一切。他用和資本主義國家結成軍事同盟和瘋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來取而代之。第三屆世界大會的馬列主義，現在被稱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而法國帝國主義政府出於支持斯大林的提綱，現時正把托洛茨基同志看為反革命分子般迫害！

這項斯大林主義新政策將會危及到蘇聯，而且不僅這樣，假如帝國主義戰爭一旦爆發，更會危害到世界革命的前景。如果蘇聯被操控加入了國際聯盟，從而自縛在法國及諒解協約國的帝國主義戰車之列，又或者成為了常設的和平會議的成員，在在都會表明她是站在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強盜的一邊。這樣一來，就是放棄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以解放受壓迫者，而蘇聯將成為帝國主義這場遊戲中的抵押品（而最後更是犧牲品）。

這樣的一種政策——目前主要是針對德國——是由斯大林直接指揮下的德國共產黨卑怯地出賣德國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群眾的必然結果。首先是為了和平和信用的利益，德國革命被陰謀破壞。現在，當希特勒的威脅近在眼前，斯大林及其一夥倒向帝國主義的法國，以圖制止希特勒動手，也就是為了打敗希特勒的東進擴張〔東擴〕政策。

斯大林主義官僚一如既往的，沒有計算這條路向對廣大德國群眾造成的影響。斯大林由於對世界革命喪失信念，以及更由於他不屬於在法西斯發動襲擊時向德國群眾提供革命支援，他再一次被希特勒玩弄於股掌之中。戈培爾已經在對淌著血的德國的廣播中，宣傳蘇聯已經與德國上下憎恨的法國組成了一個技術性的軍事同盟來反對德國人民。因此，德國工人就這樣流乾了血管中最後一滴革命的血。這是插在德國工人背後的最後一刀。

解除軍備會議即將來臨的失敗，為蘇聯掀開了危險的前景。英國不能承受讓法國在歐洲大陸增加力量。不會容許德國進一步受辱，受粉碎。英國也支持德國重新軍備的提議，繼續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英國需要德國和日本兩國，至少需要它們作為潛在的盟友，以維持其遐遠的帝國。

蘇聯現行的政策，倘若推行到窮盡，將導致帝國主義紛爭累累，對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施以致命一擊。

很明顯，這種局面需要一個新的政黨，一個新的（第四）國際。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 1934-35年》）



# 外交手腕還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問

托洛茨基著 李時譯

1929年7月1日



你的信倘若主要是針對關乎捷克的特殊問題，或只是僅僅針對屬於捷克的特殊問題，我或許會難以作出回答；因為，遺憾地，在目前這段時間，我對歐洲其他多個國家的局勢，要比捷克的局勢更為熟悉。但你在信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對於已經成為國際間一種意識形態的流派，並且正在成為一個國際派別的整個共產主義反對派，則具有普遍的重大意義。

我們的問題是怎樣產生的？我[曾經促請你]注意到這項事實，你在你的聲明中，與“托洛茨基主義”保持距離。你要是認為反對派保護的觀點是與列寧主義相違背的，又或那些觀點本身就是錯誤的，那麼我們誠然是責無旁貸的要在政治上保持楚河漢界，不需要任何交待。

但就我目前所見，問題完全不是這樣的。你認為，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事實上就是把馬克思和列寧的方法在當代的應用。如你所解釋，你讓自己和托洛茨基主義保持距離，是從戰術性的而非原則性的方面作考慮。用你的話來說，黨的成員被“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弄得迷惘混亂，所以暫時有需要用掩人耳目的手法表達我們的看法，而不要公開地宣佈那些觀點就是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的觀點。

我完全不能同意這種方法。這種方法與我所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有的政治經驗相矛盾。尤有甚的是，這種方法與布林什維主義的整個歷史相矛盾。

事實上，人們是可以認為，中間路線機器之所以對我們發動整場兇狠的鬥爭，是為了打擊我們的名聲，而不是打擊我們的信念。但這樣一來，就是低估了我們的對手。對主導中間主義的政治含義置若罔聞，並且用對待落後兒童的教學手法來取代政治。

共產國際在過去六年來的全部政策，或是走到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左邊，或是走到右邊去；它在原則問題或當前政策方面所作的各項重大決定，我不曾見過有一項正確。就我所理解，你對這點是同意的。我們在所有事例裡，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上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而每一次，這樣的一條路線都在“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下受到譴責。這種情形迄今已經維持六年。也因此，“托洛茨基主義”已經不再是一條無關痛癢的標籤；它的內容充滿共產國際過去六年來的全部生活內容。為了對當前的錯誤提出批評和指正，你已經無法不去闡述被官方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而你即使為了教學方面的理由在言詞上與托洛茨基主義保持距離，但在政治上仍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怎樣對待你和左派反對派這麼一個明確的國際傾向的關係？你正冒著風險，未來淪為自己矛盾立場的受害人。你或是必須每一次都清楚的表明你不同意左派反對派的哪一點，經常要發動派系鬥爭來反對左派反對派；或是你將被迫脫下面具，承認你所以一直在冒充“反托洛茨基主義者”，是為了捍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的見解。我不知道何者更為糟糕。

不，在政治上玩捉迷藏遊戲，是絕對不允許的事情。我曾多次出於不同理由而摘引過一位法國作家的話：“如果你在其他人的面前掩藏自己的靈魂，最終，你連自己的靈魂也找不到。”經驗告訴我，你可能不只出於教育上的考慮而備受制宰（而我已經說過，即使出於這個理由，亦

不能為掩飾身份而自圓其說)。事實上，制宰你的是你仍未準備就緒，挺身而出以與充塞著官僚輿論的黨正面對壘。而之所以缺乏準備，通常是由於沒有充分清晰的理解到各種意見之間分歧的鴻溝，及我們的傾向註定要完成的任務的偉大性。

在今天，或許有好些人會受到斯大林派中間路線的迂回路徑所感染，而想到官方領導層也不至於太糟糕，要是能避免把問題提出得太強硬而引起他們不安，或許便能夠逐步滲透到黨的廣泛成員的意識中去，為自己造就“基地”，從而可以把旗幟舒展開來。

這種觀念基本上是錯誤的，並且十分危險。並不存在有什麼集中組織起來的基地。我們只能夠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逐步建立我們的基地。迫害馬克思主義的根紮得愈深，反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恐怖愈是令人窒息，我們這方面要作的宣傳更愈要堅決、強硬和勇敢。一個沉默，畏縮而誠實的黨員，若是理解整件事情是關乎到無產階級政黨的存亡問題，才會走到我們這一邊來。這便意味到你必須責無旁貸，公開地提出問題，不要害怕“孤立”和官僚機器把恐怖升級。對問題的每一次保留，含糊其詞和掩飾，都會對中間派有利；因為中間派依附在保留，含糊其詞和掩飾之中，賴以生存。

拉傑克一開始的立場是認為我們——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必須接近中間路線，以此把他們推往左方。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拉傑克由把不同意見間的矛盾軟化，令差異縮至最少為開始。最後以承認他們正確而反對派錯誤用四腳匍匐，頸套圈索的走中間路線者們而結束。從表面上看來，拉傑克和我們的不同，只在於怎樣對待黨內的戰術性問題。但事情從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政治的基本路線決定了黨內戰術。事實上，拉傑克始在反對派內一直是個左派中間路線者。這是自然不過的。從1923-27年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都具有右派中間路線的屬性，只除了季諾維也夫那次轉向是例外。而就在那一次，左派中間路線分子無可避免的受到了我們的吸引而走向我們。不過，繼右派中間路線集團分裂和斯大林主義者向左轉之後，在反對派內部的中間路線者看到他們的“最終目標”已經達到，以至開始害怕斯大林會由於左派反對派的壓力而走到更左方面去。所以拉傑克等人便起而保衛官方的中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間路線來對抗左派反對派。日後將證明拉傑克等人會是統治集團這頭馬車右邊的第五個輪子。

由此，我們來到據說令許多捷克同志深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們與中間路線者和右派的關係這個一般性問題。他們說，在布拉格有一個擅長於馬克思主義戰略和戰術的哲人，這個人儘管退出政治舞臺已久，但身在幕後的他仍禁不住以指責反對派為樂，因為在他看來，反對派對付中間路線者過甚，而對付右派卻不足。

還有比這個問題的提法更迂腐，更了無生氣，更可笑的嗎？要是有人說我們過於沉湎在對付右派——也即是對付右派和中間路線者的鬥爭裡，因而對左派的批評不夠多，那我倒是能夠理解；因為不管這種提法是否在任何時候具有真實性，但這個提法具有原則性的根據：在對付右派的鬥爭裡，我們是與極左派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不要忘記與他們要有適當的意識形態的分界線。

但中間路線者和右派一樣，是在我們的右邊。我們作鬥爭以反對中間路線，也就是雙倍地鬥爭以反對右派，因為中間路線只不過是機會主義經過修飾，偽裝和更具欺騙性的形式而已。

而如果我們把任務限制在黨內民主的純粹公式之內，那誠然是有可能和右派結成集團，以向官僚中央作鬥爭。但受到這種危險威脅的不是我們，而卻正是那些把意見分歧含混起來，把矛盾軟化，用軟言細語要求對黨的體制作些“改進”的人。

不錯，捷克權利是不喜歡恭維“托洛茨基主義”。而你知道，他們作為“黨內民主”的支持者，是反對把俄國反對派逮捕和流放的。這是個廉價的立場，而且他們並不能一直維持這個立場的。一般來說，階級鬥爭——特別是在一個革命時代的階級鬥爭——沒有逮捕、流放和鎮壓，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只不過，我們每次有必要記得是由誰來作逮捕，而誰給抓去和為的是什麼。這個問題會由政治路線來解決。我們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需要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獻上民主，以作為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和為革命作準備的武器。

事實是，近年來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各國的所有失敗都是藉著對左派反對派作出新的攻擊來完成的。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反動向蘇維埃共和國施加壓力，令全世界共產黨受挫敗，並通過斯大林主義的機器向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



發出攻擊。反對派在這全盤的政治形勢中是最主要的癥結。在這場對付“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斯大林與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處在同一陣營。雅羅斯拉夫斯基骯髒不堪的誹謗與世界政治活生生的、無可辯駁的事實現時正是互相抵觸。這是無法逃避的事實。反對派是少數，但它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的累積體，是革命前景的發酵劑。

唯有在最困難的條件仍能保持忠於自身的傾向，才能夠贏得革命的大多數。歐洲目前的改良主義和平主義的一翼（社會民主和英國工黨的增長）將會瓦解，無論官方共產主義運用其政策怎樣幫助社會民主黨也是枉然。對具有意識形態背景與革命氣質的幹部的渴求，將會與時俱增。廣大群眾並不需要那些據稱是以廣大群眾之名而左右搖擺、猶豫不決和藏頭露尾的人；革命的基本問題一旦堂堂正正地提出來，廣大群眾便會把那種人拋棄。

扶手椅上的老博物學家們竟然指責我們對中間路線者的攻擊太多而放過右派，這不過是博君一笑的諛語是吧？我們攻擊中間路線的原因，正是由於中間路線全部的無原則的左右搖擺政策不僅會在黨內及其周圍助長和加強右派的傾向，並且還會對工人階級整體造成同樣的影響。

如果工會路線受到進一步的迫害，《真理報》無以復加地充當無知和誹謗的機關報，黨在工人階級政的威望下降而資產階級分子的信心得以增強，則斯大林用官僚手段消滅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可言？

如果共產黨的整個政策是飼養了社會民主主義，損害到工人意識中對共產主義的欽佩，損害到他們對共產主義這面旗幟的信任，則塔爾曼把右派和調和主義者都消滅了，又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可言？

那些雷科夫們、布哈林們和托姆斯基們，還有布蘭德勒們、塔爾海默們、埃雪爾們、科瓦達們、伊金們和紐拉特們\*等人，並不具有獨立的意義。右派在共產主義內部之進一步加強，只不過反映了走向資產階級反動力量的更為深入的進程。這個過程有林林種種的表現形式，包括特爾米多的元素和態度在蘇維埃共和國日漸高漲，第二國際黨派日漸增多，共產主義的影響日漸減少，革命的一翼——共產主義反對派被粉碎等。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 紐拉特一度嘗試好像把自己提升到革命政治的層面上去，但正如季諾維也夫的支持者一樣，承受不了壓力，而他首先向[官僚]機器投降，繼而倒向右派。這個活生生的經驗教訓我們要衡量各種意見、團體和個人。）

世界歷史的路向誠然不是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或共產國際的主席團所決定。此外還有其他因素。然而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共產主義的]悲慘失敗的原因，俱無一例外的直接歸咎到錯誤的領導，這便必須諉責於中間路線了。在黨的內部，中間路線是頭號敵人！右派已經給開除出黨。至於是否把調和主義者的集團也一併開除，這點並無足輕重。黨的領導層是掌握在斯大林主義者——也即是中間路線者的手中。同時，他們繼續破壞著黨，繼續抽空對黨的信任，繼續破壞黨的未來。所以我們才會集中主力來對付中間路線。它是黨內的主要敵人，正是它阻礙了解決革命的基本問題。在蘇聯，中間路線通過其左搖右擺的政策阻礙經濟發展、激怒農民，挫弱無產者。在德國，中間路線是社會民主主義最忠實的心腹。因此，我們對抗中間路線者的全部鬥爭，是由我們在工人階級內部必需履行的基本任務所指導：這項基本任務就是推翻機會主義者組織，把大多數工人糾集到共產主義旗幟的周圍。

正是這些中間路線者們，為了把黨的注意力引離開基本問題——即離開他們所犯的錯誤和失職，他們現在正在言詞上把黨的全部生活縮減到對付“右”的敵人——也就是黨內的右派集團的鬥爭方面去。至於在反對派內部，或接近反對派的左翼中間路線者，則要投到這個潮流去，並且趕快套上保護色彩。事實上，比起由自己來面對把共產國際的綱領、戰略、戰術和組織加以更改的問題，倒不如忘情於是這場廉價的，形式上的，刺激的，乃至是受薪的“打擊右派的鬥爭”去，領導這場鬥爭的人物有諸如那些頑固不化的機會主義者如洛佐夫斯基，彼得羅夫斯基，馬丁諾夫，庫西寧，柯拉羅夫等一夥。不，我們對問題的提法並不相同。在國家內部，主要敵人是帝國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主要敵人是社會民主主義。在黨的內部，主要敵人是中間路線！

你提到，捷克共產黨通過“小心謹慎”地運用迂回的方法和偽裝，建立了一個群眾黨。我相

信你是錯誤的。整件事情是由捷克工人偉大的革命興起而來的，而這場革命興起是由大戰後的狀況以及對獨立的民族共和國的幻滅而產生的。就讓我們承認，是領導層的外交手腕把那些原先不會加入黨的一些額外群眾吸引到黨去吧，但我們仍有必要去問：這到底是勝數還是負數呢？據悉，今年有近 3 萬名工人脫黨。來得容易也去得容易。革命先鋒隊不是由誤解和半真半假建立起來的。

就在英國，我們有一個新近的例子，這個例子以其方式來說並且是典型的。斯大林派中間路線的整個政策，是為了在工會內逐步製造“組織基地”以讓革命旗幟展開，所以不允許共產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對立。你是知道結果是怎樣的。到結算人頭時，共產黨可能糾集到僅僅 5 萬張選票。

列寧曾經被多次指責，他在反對左派中間路線者的鬥爭裡忘記了右派並給右派幫上了忙。我自己曾不止一次的對他作過這種指責。就是在這一點上，而絕對不是在不斷革命論方面，是那人們稱之為“歷史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錯誤之處。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布爾什維克而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允許的布爾什維克，就有必要理解列寧對待中間路線絕不調和的態度的全部含義及其重大意義；沒有這個全盤理解，就不會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

此所以，你應該忠告布拉格那位哲人，請他或是登上舞臺，提出來他本人的中間路線偏見以反對我們反對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或是完全緘默，免得用那些教書先生式的了無生氣的怨言，令年青同志混亂。

我們會是發展迅速或是發展緩慢，這我並不知道。這不單有賴於我們自己。但在正確的政策下，我們必然會發展。我看到我們在捷克的同路思想家的實際任務，大概有如下這些：

1. 立即把國際左派反對派近期最重要的文件用捷克文發佈。
2. 全力以赴，創立一份定期刊物。
3. 著手制定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捷克支部的全國性綱領立場。

4. 設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捷克斯拉夫派的正確組織。

5. 積極參加設立反對派國際機關報的工作，保障反對派在國際範圍內的意思形態的團結。

6. 在所有機會裡現身——如共產黨的聚會，右派反對派的聚會，在工人的公開聚會等場合，不帶任何掩飾，清晰明確地的表達意見。

7. 努力不懈的進行教育工作，即使只對極細小的圈子或單獨個人也不例外。

8. 反對派人士必須在所有群眾性行動中置身前列，要表現出忘我的，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獻身精神。

（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 訪托洛茨基談俄國問題

1938年3月25日

托洛茨基：就蘇聯的社會關係的演變的具體形態和新的狀況作論述，真可是難乎其難，因為近年的資料和統計數字較之以往愈發是捏造和虛構出來的東西。報章方面也如法庭一樣，絕對是堆砌營造出來的東西。就有關於蘇聯的社會陣營方面，報章上的東西是絕對的虛假。最上一次做的人口普查給下令銷毀；我不知道這則新聞是否有傳到美國的報章去；這可是一宗至關重大的消息。



我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批評官方的統計數字和資料懷有著這個目的，就是用以掩飾社會的層級化，掩飾官僚和工人，農業工人和集體農莊的經理的薪酬差異，以及家庭僕人的數量。我估計在集體農莊方面有不下於5百萬戶家庭和官僚貴族擁有家僕，而在城市裡，[每個家庭的]家僕人數甚至有2個，3個或以上，當中包括了司機和看管兒童的保姆。這是一個僕人的社會階級，專為高上階級服務，但這一切並沒有收進人口統計調查的報告裡。

這個人口普查是在1月進行的；接著，全世界

得知官方頒佈了一項特別法令，以把這個人口普查的資料燒毀，因為那些統計數字是由“派托分子，捏造家，人民之敵”等人搞出來的。至於那個至為基本的，用以衡量蘇聯的狀況的最為重要的東西——人口的規模——也沒有予以發表。華爾特·克裡維茨基對此在法國報章上作了充分的解釋，而米柳科夫的報章也刊載了這則解釋。人口是非常大幅度地下降了。每年的人口增長是3百萬人。

沙克曼：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何時做的？

托洛茨基：是在1920年代，當時也顯示出相當的人口增加；那時的人口估計約有1.17—1.18億人。可是克裡維茨基聲稱，去年普查的人口只有1.3億人。這個結果完全是場浩劫，因為它是對人民生活條件的最佳測驗。這個數字顯示出，在1931—1932年，因集體化，流放，成千上萬被暗殺的農民以至因饑荒而損失的人口是數以百萬計。我相信這並且只是事實的一面。它還顯示出人民在平常時期的生活條件是非常的惡劣，死亡率是非常的高，人口的年增長並非以三百萬而卻是1百萬計——這就是五年計劃所宣稱的整個“高度幸福繁榮”的時期的結帳。

我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的資料是來自謝多夫為我保存的地方報章內的資料；這些資料讓砌出局部的真相成為可能。自此以後，便再難從報章裡找到任何稍微貼近現實的東西了。我在米柳科夫在巴黎出版的報章上找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是對一個半托洛茨基分子的訪問錄；這個人的名字沒有發表，但我估計那人就是克裡維茨基——他這個人傾向於資產階級民主。據受訪者表示，農民的形勢有了改善，但工人的形勢是非常惡劣；國民收入的差異性是有步驟地對農民有利，對工人不利。假如我們所說的農民是集體農莊的貴族的話，這種狀況會是真實的——行



政人員的形勢是近乎老闆的局面，是個商人，因為集體農莊農民有權在市場買入和賣出至少一部分物質。行政人員兼是半官吏和半老闆。他的收入非常大，他並且同時也是格柏烏（秘密員警）的代表。人們可以想像到，像這樣的一個行政人員手上集中有多少權力。至於農場工人或工廠工人的局面則是迥然不同；經濟力量的關係是朝向有利於較高的階層即集體農民而變化的。這種形勢標示了社會的社會分層化之惡化。同時並進的是官僚把經濟權力集中到它自己掌上。

莫斯科大審判就是這個過程的表達之一；各種政治矛盾自然的反映著社會的狀況。官僚對人民無比畏懼——它對人民之憎恨，還甚於沙皇——這是由於人民具有兩次革命的傳統，並且不完全是目不識丁。在人民之間也有著互相敵對和互相摩擦。尤為重要的是官僚內部之間的互相敵對；審判就是這種敵對的直接表達：一部分的官僚消滅另一部分的官僚。

沙克曼：為什麼？

托洛茨基：這是由於群眾的不滿甚至乎也令致官僚體內部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部分官僚說：“讓我們作出一些讓步吧。”而另一些則是反對。群眾的壓力令統治層產生分裂，這就和世界各地相同。

很難說官僚的政治分歧是什麼，不過莫斯科的大審訊為此給予了很好的提示。其中有些人是希望恢復資本主義，而另有一些人則是反對。[審訊上的]指控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另一項事件的規模雖然小，但是極其具有啟發性，為我們提示了分歧的所在，那就是和莫斯科決裂的人。在這方面我們有賴斯，在希臘的代表巴爾文，在德國的軍事情報主腦克裡維茨基——這些人中，只有4到5人具有如克裡維茨基的重要性——及從羅馬尼亞逃往義大利的布堅科。我們知道在過去數年裡，外交部人員被選換和清算的不下十次，我們也知道有多少人被召回及謀殺；不過，繼大清算之後有4個人是逃出生天了。這是個十分高的比率，它表明了官僚體內的離心力

是非常的巨大。這些人不是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的最先4個人哩：當中一人是希臘的部長，另一個是在德國主理秘密事務的頭子，而賴斯和克裡維茨基屬於同一級別，具有幾乎相同的重要性。而這些人走到什麼方向呢：萊斯立即宣佈效忠第四國際；巴爾文保持友好；克裡維茨基面向資產階級民主（他是個自由派，和孟什維克有關係——他與我們斷絕聯繫，這尤其在我們的兒子死後更甚，而這點不過是他的口實而已）；布堅科成為了法西斯分子。不過是區區4人，但極具有代表性——這是體現出官僚體系內部各種政治色彩的一道彩虹。它說明了斯大林為什麼會從黨機器過渡到格柏烏去。現在的政治局不是政治局，而卻是斯大林-葉若夫。審訊上隨便一個被告可以點名政治局中人，而那個人就會受到審訊——我們在魯祖塔克身上可以看到這個例證：他曾經是政治局的候選人，而我肯定並無點名這個人；給他點名的是葉若夫。

在此有一個對我們十分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受到俄國白衛隊廣為討論：在俄國政府裡有沒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連維克多·塞爾日也確證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數量誇大得驚人；而斯大林這麼做是有理由的。據來自俄國的人確證，在蘇聯有的只是右翼傾向——沒有左的傾向——至於托洛茨基主義只不過是個幻影。這既真實也不真實。在官僚體內部，右的傾向與時俱增，甚至走向成為法西斯。在群眾裡的社會基礎不相同。要是我們抽出個別一個年輕的官僚分子——這個人會是一個全然的法西斯類型：他沒有十月革命的傳統。他有的只是備受紀律：備受發槍彈的紀律，備受清算的紀律，及備受經受審訊的紀律——而這一切全是為了祖國的光榮。在官僚分子當中像布堅科這種人格非常重要。像賴斯同志之類的比率非常之低。在群眾中的各種傾向是要較為初級的，但都是朝向於反對官僚，反對新的貴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並不是真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們的態度和總的批評本質是不謀而合。只不過於極權政體的障礙使然而無從建立起聯繫而已。

我們在西班牙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相同的

事情。1936年7月工人大眾的行動發展絕對是朝著我們的方向邁進的，可是我們的同志的數量十分之少，其數量少的程度使得那個被稱為派托的POUM組織對於群眾間的動勢之反映甚少，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受到可怕的仇恨。

我相信，個人恐怖主義在俄國是勢無可免的了。他們的審訊激發了恐怖主義，就像沙皇當年。成千上萬宗槍決裡竟然沒有其中一人的兄弟姐妹，把那麼一個官僚槍殺是不可想像的。官僚盡其可能的廢棄馬克思主義反對恐怖主義的傳統；個人走向恐怖主義的傾向是由審判繁殖開來的。他們將要獲得的收成，是由他們用個人恐怖主義的形式撒播的種子而來。由於群眾運動沒有一個黨，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外省各地，恐怖主義的行為數不勝數。謀殺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其人的人格不為人知——或許其中的原因甚是一般，比如涉及女人。國外格柏烏情報局頭子斯盧茨基被克裡維茨基問及尼古拉耶夫行刺的原因時，斯盧茨基對他說：“不要問，那太莫測高深了，最好是不要問。”斯盧茨基接著告訴克裡維茨基，斯大林前往列寧格勒主持這宗暗殺案件的初訊，以便為調查的方向發給指示。

沙克曼：我們之間也多次討論這點：斯大林在前一段時期為什麼不曾被暗殺呢？

托洛茨基：有兩個理由：（1）誠實而又嚴肅的人士並不相信這種行動會達致任何成果；他們會說：“那又由誰來取代他呢？莫洛托夫嗎？難道莫洛托夫會比斯大林好些嗎？”（2）斯大林本人左右護衛森嚴。歷代沙皇中也無一人比他有著更森嚴的護衛。不過，儘管如此，由於從下和從上而來的壓力是如此的利害，致使接著而來的時期必定會興起恐怖主義的狂飆。這類行動能否令事情發生基本的變化，這點是大成疑問的；他們能夠令推翻斯大林集團的勢態加劇，但是較為有意識地贊同資產階級的分子也不曾做好準備。至於在革命分子方面，我們不能期望他們會利用這種行動所帶來的機會，就像我們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所做到的一樣。我們反對社會革命黨人的方法；

但在每次發生恐怖主義行動之後，我們會宣佈我們同情社會革命黨人，把理由交待，並且把反對沙皇的情緒動員起來。而在目前，我們沒有能夠做到這種宣傳的組織。

戰爭在初期時必然會強化斯大林的地位：官僚和人民因自保的精神而將給予克里姆林宮一夥予新的氣象。但到了戰爭期間，事情就會如其他國家一樣的了。政權解體，而戰爭將會標示出政權必然的死亡。政權將由什麼來取代，這是一個總括性的問題的其中一個部分。假如戰爭在資本主義國家造就了一場革命，則斯大林集團一夥的倒臺將不過是戰爭裡一段次要的插曲——假設它的倒臺沒有即時的由工人組織（蘇維埃）所取代的話。我們若是有那麼一刻間接受這項假設，即這場戰爭將標示我們文明的終結，則俄國自然是將要亡國。但這個假設的可能性很低。我們寫道，斯大林的垂死掙扎——而這並非誇大之詞——同時也標示著共產國際的死亡。共產國際將會在蘇聯克里姆林宮一夥肯定地垮臺之前結束它之作為一個生機蓬勃的運動，這點不僅有可能發生，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多半會發生。不過，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端賴於我們本身的政策。

共產國際是什麼？它有3道支流：（1）其機關，它由惡棍和見識淺狹的狂徒構成；（2）在這種時期被吸引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3）工人；其中主要的一大部分人早在這階段之前已為黨吸引過來。前兩道支流——即來自機關和知識份子的部分——有可能投向洛夫斯通分子方面去（他們要投向我們是難乎其難的；而我們希望，我們對機關分子和知識份子不要太客氣——我只能重申，我們必須設立嚴肅的規則對待他們，至少須維持1年的察看期）。

至於第3道支流方面，即是斯大林黨內的工人，他們並非機關人員，而只是基層成員。這類工人倘若留在黨內到現在，那並非由於他支持莫斯科的審判，而是由於工人有著非常深刻的獻身精神和感激情緒，在心理方面更為穩定。無論發生什麼事，他仍然留在黨。他的謙遜使他會說不明白所發生的事情。知識份子可能會比工人先脫離黨。但工人一旦和黨決裂，他們會趕緊加入我

們這一邊來，而非到洛夫斯通分子那一邊。

正因為如此，在斯大林黨內有一個核心小組以向一些分子進行解釋，準備及收集訊息是重要的。我相信我們現在並無這類訊息；而設立參謀部以在斯大林黨內和斯大林主義者作鬥爭是必須的，而這個鬥爭自然的是在我們的黨的領導下。由一些青年同志首先收集訊息，從以下的角度研究整份斯大林主義報章：黨內出現了什麼事情，發生了什麼衝突，逐出黨的事件等等。然後是在黨內有直接的情報員，而這是在良好意義上的情報員。我相信，在他們的辦事處人員之間，在技術人員和顯赫的領導之間的分化必定是非常尖銳的。白勞德是斯大林的滑稽版——技術事務是由絕對無足輕重的人組成的。我們可以首先從清潔工這一類人士入手吧。打字員吧。有些打字員是為白勞德，為格柏烏服務，是擁有特權的打字員；但另有一些人他們完全是從事於技術性的工作，完全為人所忽略。我們必須從這些方面找得我們的情報員，有系統地找出這些人，滲透進去，尋根究底，與共產主義工人進行友善的交往，逐點逐滴地創造出一個訊息網路。

卡農：你會找哪一類型的同志主理這種工作？負責這類工作的同志該擁有什麼特點？

托洛茨基：像阿本這樣的同志是適合的。我不曾會晤過他，也不認識他；但我就是有這個印象。這個同志要能做有系統的工作，必須有年輕的合作者，有獻身精神的女性也能勝任，但必須是聰明的女性。她們自有其他方法以與共產主義工人分子取得聯繫。

沙克曼：你是指派人進入共產黨嗎？

托洛茨基：是的，若是可能的話。你們是知道法國的例子。俄國青年加入到社會主義青年去，目的是把後者爭取過來。他們舉行了秘密會議，但佛裡特·澤勒秘書是我們的同志。我們與她討論了這件事，請她立刻把記錄刊出。我們把會議記錄刊出後，贏得了所有青年人。澤勒仍有疑慮，

但基層立即對我們深表同情，那麼澤勒便隨他們一道投向我們了。

卡農：記錄是在未獲授權下刊出的嗎？

托洛茨基：當然囉。澤勒後來說：“我的秘書比我更聰明。”在反對斯大林派的鬥爭中，戰爭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勒德洛修正案非常重要，是個試金石。這個修正案誠然並不足夠。即使斯大林派贊成勒德洛修正案，這個修正案的重要性更10倍於此。我們最先對待這個修正案的態度，是有點兒教條和宗派性；但最佳的做法是公開地宣佈我們已經改變了路線。實事求是地說出來是最好的。你們可以說我們改變了綱領，並且舉出列寧在農業問題上的改變為例子。我們對工人並不玩弄把戲。我們提倡更為革命性的鬥爭，但我們仍然是個微小的少數派。你們相信勒德洛修正案之作為對大商家和政府的牽制；我們會隨著你們一起走。但全國委員會最近通過的決議案以及麥金尼說我們並沒有作任何改變的聲明卻是不真實，不坦誠的。人們不能做出轉向而又不將之告訴大眾——要是這樣的話，就是沒有轉向了。我們必須說：“是的，我們做出了這個轉向，因為我們希望和你們共進退。”這麼強調地說出來，以至連洛夫斯通分子也沒膽敢來指責你了。而洛夫斯通分子是無足輕重的。這關係到我們與工人階級的關係——這才是舉足輕重之處。

[以下討論，論及到勒德洛修正案假如經過修訂，沖淡後再度提交到大會討論，我們該採取什麼立場。托洛茨基說，他需要在看到新修訂的議案後才能發表意見，但不管如何，我們現在便應該為既有的修正案作鼓動，並且指出原提議人刻下也沒有能力為之鬥爭了。]

沙克曼：你把支持勒德洛修正案一事和支持解除軍備一事兩者區別開來嗎？

托洛茨基：解除軍備絕對是另一回事。這個提法是絕對錯誤的，完全是無中生有。勒德洛修正案則迥然不同，工人希望制衡政府，而這與國際聯



盟，仲裁法庭及談論解除軍備無關。我提議我們把修正案青年年屆18歲須享有投票權的要求兩者聯繫起來。

鄧尼：當戰爭屆臨時，18歲的男孩就會是21歲的了。

托洛茨基：對，對，這是另一個論點。

卡農：你認為斯大林派運動在美國有任何發展前景嗎——會進一步擴張嗎？過去數年來，他們不僅在數量方面大增特增，而且影響面也很廣泛。我會認為他們在美國的影響力已經達到頂點，除非是由於戰爭使然，他們得到政府的允許而作為職業愛國者和無所不能的員警人員以對付我們。總的來說，莫斯科審判所得到的可怕反響，人民陣線政策及他們的外交政策方面普遍的破產，在在都給美國的斯大林主義運動帶來沉重的打擊。現時在美國，反對斯大林主義的來源是較為廣泛的了。就在他們控制過的許多工會，也有強大的反對派發展起來。我們的同志對我們說，仇視斯大林的情緒正與日俱增，例如在斯大林派和最不堪的匪幫分子混成一體的油漆匠工會，就有這種情況。

沙克曼：此外，也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症候。紐約有兩份自由派報紙：《世界電訊》和《晚報》，是由強烈擁戴羅斯福的斯特恩任編輯。可是直到昨天，尤其《晚報》卻對斯大林十分包容，非常友好。

托洛茨基：我讀到梅耶和編輯之間就俄國問題發生的爭執；這很有意思。

沙克曼：是的。現在《晚報》展開了反對莫斯科審訊的運動。至於《世界電訊》則刊登了施托爾貝格的文章，這傷害了工會內的斯大林派。

托洛茨基：我相信西班牙來臨中的失敗——西班牙政府在未來數周內將會潰敗——將會產生浩

大的反應，而這將會指向斯大林派，反對他們。失敗之後，每個組成部分將會互相指責。來自西班牙社會主義者的仇恨很是深重，而志願人士即將復員歸來，那時我們便會有數以百計的貝蒂了，因為內戰是一所偉大的學校。接著就是法國的人民陣線，完全是一敗塗地。今日的電訊顯示，美國的股票交易所又再度神經兮兮，下跌了。這標示了新政及其所有幻想最後的一次痙攣。這二個因素——西班牙的失敗，法國人民陣線的失敗，以及，容許我說，新政的失敗——標示著對民主黨人的致命一擊。這自然也視乎於我們方面的行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二國際似乎完全死亡，而第三國際在初期的年月裡發展不斷。我希望現在……。

卡爾斯納：當時有勝利，所以第三國際有發展。但工人現在不論放眼何處，到處都是失敗。工人不僅對斯大林主義幻滅，並且也對共產主義幻滅。我懷疑那些從西班牙回來的數以百計的人會是加入我們哩，或是離開運動。

托洛茨基：這絕對正確。它給予我們高度困難。在不同的時期內，我們所選取的幹部也有所不同。那時的幹部追隨勝利的國家，現在他們追隨的只是個革命的綱領；我們的發展比起共產國際是更為緩慢許多。另一方面，我們會有新生的一代；我們必須不能忘記，新一代沒有經歷過斯大林主義者。我們的整個問題是要為我們的幹部和工人之間找出聯繫。年輕的一代並不精疲力竭，沒有疲倦下來，此所以我們爭取到共產黨內的年輕人，而共產主義青年開始轉向我們，這是有代表性的。這是朝向我們的首次重要的動勢；我們將會增長。

（《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年》）

## On the Decision of the 6<sup>th</sup>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Zhang Kai

### The Norms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The 6<sup>th</sup>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s held on 25-27 October 2016, which approved the Norms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under Current Situations. The Norms firstly state that “during a long period,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has some serious problems, particularly, some cadres including the high-ranking ones, who do not strongly believe in Communist ideas, pay less loyalty to the Party, and ignore disciplines.....different ways of being obsessive with money, and there are obvious problems such as being indulged in formalities, bureaucracy, Hedonism, and luxuriousness; the bans of appointment by favoritism, buying and selling official posts, bribes in the elections are not at all effective; phenomena like abuses of power, corruption, illegalness are widespread. A very handful of high-ranking officials have political ambitions and are obsessive with power, who attempt to seize power though political conspiracy such as feigning compliance and making cliques. These problems seriously erode the moral values of the Party, seriously destroy the solidarity and unity of the Party, seriously bring harm to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Party and its reputation, serious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is requires us to strengthen continuous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with the spirits of innovation, openness, and reformation, to further regulate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to upgrade the standard of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Therefore, the Committee states that it should stipulate the Norms, with 12 points, which include: (1) to strengthen Communist beliefs; (2) to insist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3) to insist on defen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4) to obey the political regulations of the Party; (5) to keep the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6) to hold on to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oncentration; (7) to carry out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an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8) to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ppointment; (9) to tighten the Party system of organization life; (10) to implement criticisms and self-criticisms; (11)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aints and supervision on power operation; (12) to maintai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integrity. Every norm has its very detailed explanation which requires every party member to comply with.

However,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lways proves t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have policies but the local officials have their countermeasures, and they work in a perfunctory manner. This kind of countermeasure has existed for a long period and is everywhere. Thirty years ago, the CPC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capitalist economy, ironically nam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rty members are crazy for money and run to get large amounts of private properties. Political power becomes strengthened once it is intertwined with money power. Nearly every official is corrupte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give up their interests.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ast. We should learn from history. The past experiences of the CPC prove that, in the third paragraph of the Norms, it confesses that in 1980, the third year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up,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ncluded seriously that because of the less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stipulated the Norms of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which was important to correct the wrongs, and to restore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ts main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s are still effective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it.

This showed that the same norms and regulations had already been announced, however, it could not avoid the so-called “serious problems”, as the Norms mentioned above.

For example, the first norm saying “to strengthen communist beliefs”, and its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Communist great vision and the great common vis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are the mental pillars and political spirit of the CPC, and they are also the thought base of solidarity and unity of the CPC. It should high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st thought should be the first priority of the work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other example: “The Shrinking of Communist Thought is the most dangerous one. The fall of Communist Thought is the most terrible one.” However, in reality, it is precisely the Communist thought of the CPC has

already shrunk and fallen. In 1978, Deng Xiaoping, the leader of the CPC, advocated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up, turned planned economy into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opened the door for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his famous wording: “let some people become rich first”, that meant it allowed the bourgeoisie to develop in China. Afterwards, with the economic boom, the non-public economy quickly developed and took many advantages, meanwhile, the state-run or the public one became smaller. According to *Nangfang Daily* (dated 11 March 2016), quoted from *Wen Wei Po* (dated 12 March 2016), a commentary stated that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up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over 30 years.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of economy has developed from nowhere to everywhere, from small scale to large scale, from weak sector to strong sector. Now, the non-public one already accounts for 90% or above of market subjects, and created over 60% of GDP, over 80% of social employment, over 65%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over 67%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bove figure shows tha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economy that was emphasized by the CPC is longer the so-called “the main subject”, which only accounts for below 10% of the market subjects, and it only creates below 40% of GDP, below 35%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below 20% of social employment. All these prove that public-ownership economy is no longer the main essence of China’s economy. (This is quoted from my paper entitled, “Living Proof of Revival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ublished in *October Review*, No.240). Its shrinking will continue. It is not convincing for the CPC to continue to use the name of “socialism”.

### **The CPC Regulations on Internal Supervision**

The highest ranks of the CPC obviously know that only a very few leaders at different levels, officials, and party members can whole-heartedly implement the Norms. Moreo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unsolved. Therefore, the Committee approved the CPC Regulations on Internal Supervision. Its first article says that “to order to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more strident governance, more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to keep the advancement and purity of the CPC, according to the Charters of the CPC.”

The Regulations have eight chapters and 47 article, particularly with the details of supervision miss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ominant institutes, leaders, party committees, cadres, members, among others. However, it practices only within the Party, so it rejects public supervision and people supervision, strictly controls newspaper and internets to disclose any official scandal, refuse to disclose officials’ private properties. This only makes officials protect each other. If it cannot strengthen inner supervision, there will be no achievement resulting from practicing strict governance.

No 27 of the Regulations confesses that “th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should take the defending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political regulation of the Party as the first priority. It should redress the misbehaviors of the higher authorities announcing policies but the local officials have their countermeasures; making cliques; cheating and confronting the Party, among others.”

Wang Qishan, the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PC as well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Disciplinary Committee of the CPC, points out that the weakening leadership, absence of party construction, no strict governance, loose regulations, and corruption have endangered the base and security of the Party authority. He discloses: since the 18<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ational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s have already dealt with over 1 million cases, and meted out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o one million party members. Lots of suppressions prove how serious the problem is.

### **Xi Jinping be the “Core” of Power**

Before that, Xi Jinping has already been the highest-ranking leader of the Party, the State, the Military, and the Pubic Security. Now he becomes “the core of power”, showing that he wants to be the center of power and the most dominant figure. After taking such immense power, Xi can do personal cul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This Meeting make him further strengthen his powerful position, expel his enemies and get his obedient relatives promoted.

There is a statement “to insist on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 the documents, nonetheless, there is no more trace of words like “against individual authoritarianism” which was written in the Norms of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36 years ago. This proves Xi is practicing 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check.

10/12/2016

十月評論 2016年 第2/3期



**Hong Kong:**

- 2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practice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to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Zheng Yan
- 3 Immediately implement the nation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to reduce serious poverty ! .....Jun Xing
- “Coup” originated from NPCSC interpretation----*Disobedience* against CY Leung’s Coup
- 5 (reprint).....Social Democratic Front
- 6 Review of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2016.....Lau Shan Ching

**China**

- 11 On the Decision of the 6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Zhang Kai
- 13 China paid tremendous cost to join the global game of finance capital.....Qing Yan
- 15 Reflection on the Smog Phenomenon.....Po Mi
- 16 China makes you laugh and cry (reprint).....Mu Rong Xue Cun
- 18 Social disorder makes you further reflect on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reprint).....Zheng Yi

**International**

- 22 Fidel Castro (1926-2016): A page turns.....François Sabado
- 23 Fukushima After Five Years.....Chie Matsumoto
- 25 Against the neocolonial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group - Lessons from Greece for a Europe of social and democratic rights.....Catherine Samary
- 34 Landgrabs and the EU.....Georgi Medarov
- 36 Brazil: the coup d’état.....Michael Löwy
- 37 Russia in Crisis: the Agonies of the Oil Empire.....Ilya Budraitskis
- 39 Lessons for the left from Correa’s presidency.....Patrick Guillaudat, Pierre Mouterde

**Memorial**

- 46 Recounting my life encounters (part 2) .....Peng Shuzhi

**Theory**

- 62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June 16, 1934).....Leon Trotsky
- 64 Foreign Diplomacy or Revolutionary Politics? Letter to a Czech Comrade (July 1, 1929) .....Leon Trotsky
- 68 Discussions with Trotsky III - The Russian Question (March 25, 1938) .....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73 On the Decision of the 6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Zhang Kai

#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3卷第2/3期 (總第241期)

2016年12月31日出版

- 
- 香港 2 港人極需實行真普選選出特首.....振言  
3 須即實行全民退保，延緩嚴重貧窮問題.....軍行  
5 「政變」始於人大釋法——《抗命》反抗梁振英政變(轉載).....社會民主陣線  
6 2016年立法會選舉回顧.....劉山青
- 中國 11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決議評析.....張開  
13 中國加入全球金融資本遊戲的慘痛代價.....青岩  
15 反思霧霾現象.....破謎  
16 中國是讓人哭笑不得的國家(轉載).....慕容雪村  
18 社會的失序更要反思政府的公共政策問題 (轉載).....鄭義
- 國際 22 菲德爾·卡斯特羅(1926-2016): 歷史翻過一頁.....法蘭西域·沙巴多  
23 核災難五年後的福島.....智惠松本  
25 反對歐元區的新殖民主義整合——希臘給一個社會民主權利之歐洲帶來的教訓.....凱薩琳·薩馬利  
34 掠地和歐盟.....格奧爾基·梅達羅夫  
36 巴西政變.....邁克爾·洛伊  
37 危機中的俄羅斯：石油帝國的痛苦.....伊利亞·布德雷茨基  
39 科雷亞的總統任期帶給左派的教訓.....派翠克·圭洛達、皮埃爾·牟特德
- 回憶 46 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二).....彭述之
- 理論 62 蘇聯的外交政策.....托洛茨基  
64 外交手腕還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問.....托洛茨基  
68 訪托洛茨基談俄國問題.....托洛茨基

英譯 73 On the Communiqué of the 6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sup>th</sup> CPC Central Committee.....Zhang Kai

---